

俄罗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专 论

- 3 波波·罗 /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过去、
现在及未来

专题文稿·俄罗斯知识分子

- 11 李小桃 / 也谈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发轫
21 曾媛媛 / 俄国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党政治恐
怖主义路线
35 张建华 / 从政治整肃到行政规训：新经济政
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
49 刘杉杉 / 一劳永逸净化俄罗斯——1922 年
俄共（布）驱逐知识分子运动

政 治

- 62 白千文 / 从“自由民主”到“可控民主”：
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区析与
启示
69 弗·格尔曼 / 中央—地区—地方自治：当代
俄罗斯的中央再集权政策

中俄关系

- 94 黄立弗 / 20 世纪中俄民间组织的合作与中俄
关系
107 朱光强 / 困境与协调：探析中俄能源合作的
博弈——以俄远东输油项目为例

苏联·苏共

- 121 朱秀芳 / 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再
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封3 于 璐 辑 / 俄罗斯大事记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李敏焘

杨 成

封面设计：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2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21X

印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出版日期：2009 年 8 月 23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09 年第 4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Бобо Ло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Западом—прошлое,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презентация в Восточно-китайском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Шанхай, 21 мая 2009 г. (3)

Ли Сяотао

Об истоках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11)

Цэн Юаньюань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пу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социал-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артии..... (21)

Чжан Цзяньхуа

О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чистки к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му порядку: политик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в период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35)

Лю Шаньшань

В1922г. РКП(б) разогнала движени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49)

Бай Цяньвэнь

От «своб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к «управляем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рефор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России..... (62)

Владимир Гельман

Центр-регионы-местн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литика р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69)

Хуан Лифу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20 веке..... (94)

Чжу Гуанцян

Трудности и компромисс: анализ игры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фере энергетики — на примере трубопровод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107)

Чжу Сюфан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ъяснения феномена Горбачева- Новый анализ глубинных причин развала СССР (121)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09 年第 4 期 (双月刊)

Contents

Bobo Lo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presentation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1 May 2009..... (3)

Li Xiaotao

Also on the Origin of Russian Intellectuals..... (11)

Zeng Yuanyuan

Russi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Line of 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s Political Terrorism (21)

Zhang Jianhua

From Political Purge to Administrative Order: the Soviet Regime's Policy towards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Period..... (35)

Liu Shanshan

Purify Russia Once and for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s (Bolsheviks) Campaign in Expelling Intellectuals in 1922..... (49)

Bai Qianwen

From "Free Democracy" to "Controllable Democracy": Economical Analysis and Revelation of Russian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62)

Gel'man V.

Center-Region-Local Autonomy: the Policy of Recentralization in Modern Russia... (69)

Huang Lifu

Chinese and Russian NGOs' Cooperation in 20th Century and Sino-Russian Relations(94)

Zhu Guangqiang

Difficulties and Compromise: Analysis on the Game of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 A Case Study of Russia's Pipeline Project in the Far East (107)

Zhu Xiufang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rbachev Phenomenon — New Analysis of Implicit Reasons for the USSR's Collapse (121)

专 论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过去、现在及未来*

波波·罗**

1、概述——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现状

继俄格冲突以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比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戈尔巴乔夫时期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糟糕。

但是，对新冷战的探讨则又显得夸大其辞，毕竟，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对抗既非全面的，也不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甚或可以说这种对抗其实并不存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是极不可能发生的。

然而，一个新的竞争范式还是出现了，欧俄（或美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变得丧失了信誉。

现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日渐好转。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俄罗斯对自己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奥巴马的当选也排除了莫斯科的一些疑虑。

然而，当前的改善是脆弱的。尽管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风格少了些粗鲁，但最近事态的发展仍表现出其强硬的姿态。

俄罗斯依然持有强烈的战略权利观念和强大的地缘政治心态。

尽管俄罗斯和西方优先考虑的一些事务是相同的，但在某些领域，他们的利益从根本上说仍然是相互背离的，尤其在前苏联空间表现得更为明显。

2、影响当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现状的关键因素

• **过高的期望**——俄罗斯希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不再将俄罗斯看作是一个被击败的前敌人，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共同的获胜者。

* 波波·罗教授于 2009 年 5 月 21 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 波波·罗 (Bobo Lo)，欧洲改革中心俄罗斯和中国项目主任，教授，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西方国家则希望俄罗斯调整自我并适应冷战后的现实，将自己重新塑造为一个现代的、自由民主的、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无法理解它们对于俄罗斯影响力的局限性。

- **彼此对对方感到失望并且缺乏信任**——俄罗斯认为，西方国家通过两种方式背叛了它：（1）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为俄罗斯经济开出的“休克疗法”的处方；（2）西方军事和政治力量向中东欧乃至前苏联空间的扩展。西方国家往往被认为与叶利钦统治时期最糟糕的所谓“自由”的过分行为有关，并在20世纪90年代因俄罗斯的问题而遭到广泛的谴责。西方国家感到失望的是，俄罗斯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西方式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国家。此外，俄罗斯对邻国和西方国家的对抗政策也广受批评。

- **“非黑即白”的观念**——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缺乏平衡的视角和历史的观点，双方均纠缠于无益的成见。俄罗斯认为西方国家要抓住一切机会来削弱俄罗斯；而西方国家则认为俄罗斯‘注定’是一个专制的、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双方都夸大了对方所构成的威胁——俄罗斯认为西方国家和机构的一言一行均居心叵测，而西方国家则认为，无论是从安全利益还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对于西方国家均构成威胁。

- **对俄罗斯重要性的看法存在冲突**——俄罗斯自认为是一个全球大国；西方国家虽然认识到俄罗斯的重要性，但仅认为这种重要性只表现在一些问题上，而且，俄罗斯仅处于决策的次要或边缘的地位；俄罗斯的野心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能力。

- **俄罗斯的“国耻”情结**——莫斯科一直认为西方国家从未真正地将俄罗斯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予以尊重。此外，俄罗斯还怀疑西方国家利用俄罗斯的困难来获取地缘政治优势和经济利益。

- **俄罗斯的侵略—防守心态（“围困-堡垒综合症”）**——当俄罗斯感受到威胁或未得到应有的尊重时，莫斯科倾向于猛烈回击。俄罗斯往往采取显示信心的方式来掩饰它的不安全感。当一切进展顺利时，比如在普京总统任职期间（2000-2008年），俄罗斯的行为竟然会倒退得几乎像一个傲慢地欺负人的恶少——比如，在其使用能源作为地缘政治的筹码方面，或者更一般地说，在它鼓吹俄罗斯重新抬头之时（“俄罗斯正在回归”的论调）。

- **西方的必胜信念**——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其在冷战中所所谓的“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在西方促进其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观方面也曾得到含蓄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国家并非通过一种傲慢的甚至接近于弥赛亚（崇拜西方的‘神’）的态度来达到这个目的。

- **西方的辩护主义（apologism）**——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普京是一个民主主义

者，他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善意的。此前，西方的决策者过于宽容反民主的失误、贪污腐败和叶利钦政府的弊政。而现在，主要的问题则是，有影响力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俄罗斯有权生气，西方国家应对俄罗斯的反西方化、尤其是反美情绪负责。

- **西方国家参与到“颜色”革命中**——俄罗斯一直指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这并非是由于国内抗议的原因，而是因为亲俄罗斯的政权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垮台。

- **伊拉克**——这表明美国从事实质上的单边主义（或“伪多边主义”）国际议程的决心。

- **军控**——美国拒绝缔结最基本的武器控制协议（SORT-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并决定着手中东欧的导弹防御系统，这导致了俄美关系的恶化。

- **普京的独裁主义和西方对俄罗斯内部走向的批判**——俄罗斯和西方对于俄罗斯国内事态的发展的认识存在着一个根本的脱节。莫斯科不满于西方的“干涉”和傲慢；西方国家则担心，俄罗斯国内的专制主义不仅仅是本质上糟糕的问题，而且将日益转化为具有侵犯性的外交政策。

- **能源争端**——天然气危机（包括 2006 年和 2009 年的乌克兰天然气危机以及 2007 年的白俄罗斯天然气危机等）已大大减弱了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作为一个可靠的能源供应商的信任。莫斯科则威胁说要“走向东方”（言下之意，“走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这使得问题更加尖锐。

3、俄罗斯到底想要什么？

- 在这里，我们与其讨论俄罗斯想要什么，还不如讨论其不想要什么。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所关注的就一直是力图阻止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促进本国利益的实现。

-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可归结为对于不熟悉情况的一种反应。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俄罗斯的弱点。也仅仅是在最近，即 2005 年以来，俄罗斯树立起一种自信，开始实行积极的政策。

- 今天，**俄罗斯想要的是以下三点**：（1）将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最大化；（2）建立一种现代的、后冷战时期的身份认同；（3）根据俄罗斯的条件与西方国家结盟。

权力

- 俄罗斯试图**恢复其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作用和地位——一个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不可或缺”的国家，一个在周边区域（前苏联空间）问题上的“区域性超级大国”。

- 与此同时，俄罗斯还希望成为一个多向度且具有建设性的“**现代化大国**”，不仅对他国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为他国所广泛接受。

- 俄罗斯希望出现一个“**世界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美国和其他主要大国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也担心中国的崛起，并且担心自己可能在国际决策中的地位被边缘化。俄罗斯过分的自信掩饰着其真正的不安全感和薄弱环节。

身份认同

- 俄罗斯渴望以下三点：首先，成为“一个共同的欧洲基督教文明”中的一员；其次，积极参与到大国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再次，成为与美国“平等”或“接近平等”的国家。

- 然而，最重要的是，俄罗斯试图重新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西方国家”，这种“西方国家”更包容俄罗斯，并更多地将俄罗斯的利益纳入考虑范围。

- 这种共识将取代当今的一些规范性的机构，比如欧盟、北约和欧安组织等。俄罗斯试图**重新解读**“普世的”价值观，例如，从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欧洲—大西洋安全架构”可以看出。

- 尽管有关于“世界新秩序”和东方崛起的讨论，但**莫斯科的世界观依然有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 但是，由于俄罗斯自认为是一个全球大国，因此它并不想被完全定型。俄罗斯自认为主要是一个欧洲国家，但却也坚持思想上的“亚洲性”和欧亚主义，因为这些特点可以**使它的全球身份合法化并促进这种全球身份的形成**。

- 俄罗斯依旧希望成为一座架通东西、沟通南北的**桥梁**。俄罗斯志在成为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国家。同时，它也**担心在战略上被孤立**，沦为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的国家，抑或不够强大，不足以成为多极世界中独立的“一极”。

伙伴关系

- 俄罗斯希望与西方国家建立起建设性的关系，**但条件是必须按照俄罗斯自己的方式**。俄罗斯不能容忍西方以恩人的姿态自居。

- 莫斯科并不认为其与中国（或与其他金砖四国之一）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能够替代其与西方之间的伙伴关系。

- 对于与西方国家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的渴望，增强了梅德韦杰夫建立一个“新欧洲/欧洲—大西洋安全结构”和诸如“一个共同的欧洲文明”的信念。

- 俄罗斯**害怕一个统一的西方的出现**，因此，它总是期待着欧洲与美国的分离，以及欧洲内部的分裂。

- 但是，俄罗斯**无意与西方作长期的战略对抗**，因为在这种对抗中俄罗斯将是

最大的输家。

4、俄罗斯与西方交恶的可能性分析

- **格鲁吉亚**——尽管自去年以来，格鲁吉亚的局势已经不再那么严重，但关键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并且，冲突有可能继续升级。俄罗斯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军事存在的扩大，将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难以跨过的坎。

- **乌克兰**——与去年相比，今年对乌克兰的争议明显减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球经济衰退使乌克兰走向政策的边缘，其中所谓“乌克兰疲劳症”（Ukraine fatigue）的现象在西方国家不断强化。然而，紧张局势可能再次出现，特别是在乌克兰政府认真承诺要融入欧洲的情况下，更易发生。俄罗斯黑海舰队及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其他方面存在的分歧和失望，很容易使乌克兰再一次成为对抗的焦点。

- **在共同区域存在的利益冲突**——尽管北约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崩溃均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从更长期来看，他们对于乌克兰的兴趣则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俄罗斯感兴趣的是一个政治上软弱（尽管不是太不稳定）、经济上有依赖性的乌克兰。虽然俄罗斯并不希望重建苏联帝国，但却认为乌克兰的主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莫斯科来说，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感兴趣的则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享有充分主权和面向西方的乌克兰。大部分北约成员国不承认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 **北约扩大**——毋庸置疑，从多年以来的历史看，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获得北约成员国身份已不太可能，但是北约扩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一些前苏联共和国（例如白俄罗斯）表现出成为其成员国的兴趣，那么一些冲突可能就会出现。更笼统地说，莫斯科将继续认为北约是一个“冷战遗产”，是一个主要针对俄罗斯的组织，俄罗斯将努力抓住破坏该联盟的每一个机会，包括通过一些举措，比如梅德韦杰夫的“新的欧洲安全架构”的方式。俄罗斯将继续对欧洲分裂及欧美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大做文章。

- **前苏联国家加入欧盟**——虽然这一点不及北约东扩问题敏感，但这却有可能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摩擦的根源之一。俄罗斯对于新出现的东欧伙伴关系的反应并不乐观。

- **伊朗**——莫斯科主张施加影响来调整德黑兰的行为（特别是在发展核武器技术方面），然而，事实上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俄罗斯向伊朗出售武器可能会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 **阿富汗**——俄罗斯将努力说服美国和西方让莫斯科参与其中，而不是通过中亚诸国。否则，俄罗斯将可能成为一股阻力。尽管俄罗斯与西方在阿富汗问题上有合作的可能性，但从更长远来看，俄罗斯不希望北约或西方国家更为普遍地成为盘踞在中亚地区的力量。

- **战略性军控协商**——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许多分歧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解决。

- **导弹防御**——华盛顿已经（非正式地）推迟部署其在中东欧的导弹防御系统，但这是以伊朗局势为前提的。而且，如果伊朗的导弹威胁或核威胁变大，那么美国将可能恢复其计划，这将激起莫斯科非常强烈的负面反应。

- **能源关系**——俄罗斯和欧洲均需要寻找一种将能源关系去政治化的方式。与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相比，这种去政治化的能源关系与地缘政治力量更为相关。过境国的问题（尤其是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以及其他可替代管道（如北溪管道，南溪管道，纳布科管道）问题，依旧难以处理。

- **美国积极的外交政策**——奥巴马已着手推动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复兴，并使新的西方政治和规范共识出现光明的前景。尽管莫斯科欢迎美国在战略武器控制、伊朗、北约和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灵活性，但莫斯科还是担心西方共识的再次出现，担心俄罗斯将处于靠边站的不利处境。此外，俄罗斯还担心，与美国并列两极的地位将仅是昙花一现并限于少数领域。

- **俄罗斯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角色和地位**——俄罗斯仍然自认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全球性大国；继续认为前苏联空间理所当然地是它的势力范围；依旧对北约心存疑虑；认为整个世界充满竞争同时也条件恶劣。俄罗斯坚持认为，西方国家应把它作为一个在所有重大国际问题上举足轻重的全球性大国，即使是在它的影响力最小的领域（例如，努力构建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秩序方面）也是如此。对于俄罗斯的大国“权利”的主张是导致俄罗斯与那些不认为俄罗斯很重要、也不认为俄罗斯有能力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之一。

- **国际关系处理**——俄罗斯旨在通过双边渠道（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主要大国如德国和法国）来处理主要的国际关系，而不是通过多边机构，比如北约或欧盟。西方国家一直反对这一点，但却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这些分歧加剧了俄罗斯和一些西方国家和机构的紧张局势。

5、俄罗斯与西方结好的可能性分析

- 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提醒莫斯科意识到，**俄罗斯的未来与它跟西方之间的**

合作密切相关。目前，已经很清楚的一点是，俄罗斯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

- 全球金融危机也迫使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从争议性的问题如北约东扩、导弹防御、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事务中脱身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毕竟，现在有更迫切的事务需要优先处理。

-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最为利益攸关的，是出现一个可预测的、合作的俄罗斯。西方所希望出现的俄罗斯未必一定是民主的，但一定是一个令自己和国际社会放心的国家。

- 与莫斯科的合作对于主要的西方安全 and 经济优先事项而言至关重要：战略性和常规性军控，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打击恐怖主义，能源安全，区域冲突治理。在其中一些问题上的进展至少可以及时地创造出一个更加积极的气氛以便解决或缓和这些具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北约东扩、导弹防御系统、俄罗斯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军事存在等等。

- 俄罗斯和西方均可以做一些相对容易的妥协，以便改善双方的关系。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在伊朗和阿富汗问题上可以与西方加强合作（例如，武器销售和核技术转让）；削减并最终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撤军；抑制乌克兰（尤其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减少使用对抗性的语言；淡化民族主义言论；再次参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从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可以借助以下方式：在战略军控上做出让步；抑制导弹防御系统；对北约东扩的标准放宽，包括放弃正式的 MAP（成员行动计划）的进程；更加平等地对待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强调加入欧盟，而非北约东扩；推动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废除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等等。

6、展 望

- 从更长期的前景来看，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改善尚难预测。

- 俄罗斯将继续对西方介入前苏联空间的问题高度敏感；而西方国家将拒绝俄罗斯构建充满“特权”领域的企图。

- 只要俄罗斯的国内局势依旧困难，那么它的外交政策将继续尴尬，甚至采取不合作的姿态。

- 无论如何，俄罗斯将保持强烈的战略主导权 (strategic entitlement)。而且，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地区事务中，俄罗斯将不遗余力地证明这一点。俄罗斯将继续在很多问题上（例如，伊朗问题上）发挥破坏作用，而这将显然影响它与西方的关系。

- 长期来看，相较于中国而言，俄罗斯所具有的劣势极可能推动它在更大程度

上寻求建立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战略孤立的恐惧将使俄罗斯别无选择。而且，普京理想中的俄罗斯作为一个“现代大国”的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但是，俄罗斯向西方的转向则将是一个漫长的、不平衡的过程。

- 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俄罗斯和西方在双方的互动中**对于积极面强调**的能力和意愿。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彼此的信任。无可避免地，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会出现**波折甚至危机**。双方将避免过分乐观或过分悲观的情绪，而显示出**战略性的耐心**。

（张红译，译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讲师）

（责任编辑 常喆）

专题文稿·俄罗斯知识分子

也谈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发轫

李小桃*

【内容提要】 俄罗斯知识分子问世的问题关系到如何看待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本质和特征, 怎样评价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中的作用, 知识分子的民族特征、类型及其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等问题。俄学界之所以对此争论不休, 很大程度上与其对知识分子界定标准的多元化有关: 或以社会结构为依据, 或以知识分子的特点为出发点, 或从知识分子的功能角度。实际上上述种种观点互为补充, 应加以综合分析研究。

【关键词】 俄罗斯 知识分子 标准

【中图分类号】 K512.3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4-0011-(10)

俄罗斯知识分子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 身兼“知识精英”和“社会良心”之职责。作为知识精英, 他们是民族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批评家和理论家, 他们已经与自己的民族文化水乳交融, 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中心和体现。而作为社会良心的承担者, 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是非、公理、正义的守护人。

回顾俄国文化历史发展之路,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民族思考的器官和民族意识的宣传者和承载者, 其诞生和发展历程与俄罗斯社会及文化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因此, 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起源, 怎样定义这种文化现象的精神来源及其形成, 是能否解读俄罗斯历史的关键。这一点, 对全面了解18世纪以后的俄罗斯文化历史进程尤为重要。

要研究俄罗斯知识分子, 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究竟诞生于何时。对此, 俄罗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 各持己见, 至今也没有达成

* 李小桃, 四川外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 博士。

一致的结论。

我国学界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诞生时间也存有分歧：有学者认为：以拉季谢夫（А. Н. Радищев）为代表的知识阶层出现在彼得改革之后；也有学者视 19 世纪 30-40 年代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展开论争的时间为其发端。^①

俄罗斯知识分子究竟是何时产生的，这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关系着如何看待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本质和特征，怎样评价知识分子在俄罗斯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知识分子的民族特征及其类型，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高潮和低落、昌盛和危机时期形成的内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等重要问题。正如当代俄罗斯著名的文化理论研究者孔达科夫（И.В. Кондаков）所说：“俄罗斯知识分子起源这个问题，其本质涉及到民族的特征、原则、价值观的确立，关系到知识分子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活动的形式和方法以及在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强化程度；它触及到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决定其命运和世界性意义的最重要的特点和俄罗斯文化的意义，其中也包含着在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现象和概念在东西方文化中的普及、传播等一系列问题”。^②

为了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我们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把俄罗斯学界颇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作一综述。

长期以来，在俄罗斯关于知识分子发端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③

第一种观点是以著名理论家米哈依洛夫斯基（Н.К.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为首的民粹派提出的，并得到普列汉诺夫（Г.В. Плеханов）和列宁（В.И. Ленин）等人的认同。他们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发轫是在平民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 19 世纪 40 年代，其代表人物就是两位巨擘——别林斯基（В. Г. Белинский）和赫尔岑（А. И. Герцен）。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杜布罗留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皮萨列夫（Д.И. Писарев）等几代平民知识分子只是继承并弘扬了前者对真理、公正、理性的积极探索精神，继承了他们对民族之魂、纯洁思想的热烈追求的传统。

实际上，尽管列宁也曾把十二月党人、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等称为知识分子，但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标准来衡量，唯有以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才能真正被视为俄罗斯知识分子，而前者只能算是贵族中的先进分子而已。因为在列宁看来，知识分子之所以被称为知识分子，是由于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能够最有意识、最坚决、最准确地反映并体现出无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

① 张建华：《俄国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05 页。

②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в XX веке». в 2 т. Т. 1. СПб., 1998, С.258 .

③ Там же. С.254-263.

的利益和思想，这一点唯有平民知识分子最能胜任。

与此观点相接近的是 19—20 世纪之交著名的俄国理论家司徒卢威（П.Б.Струве）等人的看法：“俄国先进的思想家对西欧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加以接受——这标志着俄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诞生。在这种意义上，巴枯宁（М.А.Бакунин）是第一位俄国知识分子”。^①

这个观点在国内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者中有不少支持者。^②如以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列瓦达（Ю. А. Левада）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发轫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从彼得改革到农奴制改革这一时期是其胚胎状态（前知识分子）。^③

他们的这一观点是依据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征——极端的激进主义为标准得出的。激进主义在俄国文化和俄国知识分子中有着深厚的社会和思想根源。俄国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生长在一个有着浓郁宗教氛围的国度，而一部分知识分子本身就来自神职人员家庭，东正教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已经深入到他们的血液中，进入到他们的思想深处，成为一种集体性的下意识。他们虽然接受了无神论，但在内心深处却把信仰与宗教意识融为一体。同时，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加剧也与知识分子的平民化有极大的关系。年轻的知识分子本希望通过上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他们来说，学习是通往幸福的阳关大道。然而，当他们花掉了所有的积蓄完成学业后却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艰难的处境——生活无着，精神无靠：他们找不到施展才华的位置。19 世纪的俄国由于刚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之路，还不能满足他们的全部需求，况且那时国家需要的也多是能不折不扣执行上面意志的官员，并不需要他们自下而上的“合作与创造”；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与自己观念相吻合的职业——因为出身和贫穷的原因，他们只能当医生、教师、最底层的文职人员，薪水微薄，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更不能从军、做官或者经商。这样一来，进，他们无法加入到其他的阶层；退，又无法再回到自己以前的阶层中去。这种两难的尴尬境地使他们陷入了“无根”的地步，被边缘化了。于是，他们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一腔热血化为满腹不满。他们的思想因而充满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虚无主义思想又进一步强化了知识分子的激进倾向。

我们知道，19 世纪 60 年代在俄国知识分子中虚无主义思想极为盛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虚无主义反映了当时激进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批判和破坏倾向”。^④“虚

① Вехи. Из глубины. М., 1991, С.156.

② Меметов В. С. К дискуссии о времени появления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Некоторые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опросы анализ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Иваново, 1997, С. 8-15.

③ Левада Ю.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50/50. Опыт словаря нов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 М. Ферро и Ю. Афанасьева. М.: Прогресс., 1989, С.129.

④ 姚海：“19 世纪俄国革命激进主义及其根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 年第 3 期。

无主义反对历史的虚假，反对文明的谎言，要求结束历史以开始一种全新的、超历史的或者超逾历史的生活。它要求解放、要从自己身上卸下全部文明的外衣，把全部历史传统化为虚无，解放自然的人，使之不受任何束缚”。^①进入到 70 年代，虚无主义发展为轰轰烈烈的革命民粹主义运动。知识分子将“心灵的烈火、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全部力量都集中于破坏之上——破坏恶的根源，即现存制度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②

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知识分子作为俄国社会的精神领袖，在俄罗斯文化中已经开始被看成是一个特殊的、智力发达的小团体了。而巴枯宁之所以被视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第一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个人经历正符合后人为 19 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概念所赋予的内涵：出生贵族，是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朋友；也是欧洲三次著名起义（1848 年的布拉格起义、1849 年的德累斯顿起义和 1870 年的里昂起义）的领导人。他被流放，甚至两次被国外法庭判处死刑，历尽磨难却始终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提倡要采取积极和激进的方法来传播先进思想以改变社会。他的《国家主义与无政府状态》在 19 世纪下半叶被俄国革命青年奉为圭臬，视作理论与行动的指导纲领。他的无政府主义和激进思想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影响尤其在 19 世纪的后半叶达到顶峰，甚至直到今天还留存着。

第二种看法是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和当代著名的文化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ев）提出的。他们俩人所处的时代虽相隔数十年，但根据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独特之处——由于知识分子所处社会的历史、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他们的生活道路一般都历经坎坷，自登上历史舞台就几乎是与“牺牲、苦难、监狱和流放相伴而行”，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一致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发端是在俄罗斯自由思想（“伏尔泰派思想”、“共济会”、“宗教和政治的批判思想”）出现的 18 世纪中后期，其先驱者就是诺维科夫（Н. И. Новиков）和《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作者拉季谢夫。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季谢夫，他预见并确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当他在《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说道‘看看我四周——我的灵魂因为人类的苦难而伤悲’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③由于“……对于自己的时代来说，拉季谢夫具备足够的勇气和激进的观点，是革命知识分子和俄罗斯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之一”，^④“从诺维科夫和拉季谢夫的受迫害开始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殉难史”。^⑤利哈乔夫坚持认为：“第一批真正

① Бердяев Н. А. 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ы.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 1997, С.281.

② 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北京：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6 页。

③ Бердяев Н. 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Харьков-Москва, 2001, С.56.

④ Бердяев Н. А. 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ы...С.260.

⑤ Бердяев Н. А. Русская идея...С.28.

典型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出现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苏马罗科夫（А. П. Сумароков）、克尼日宁（Я. Б. Княжнин）、诺维科夫、拉季谢夫、卡拉姆津（Н. М. Карамзин）。即使是杰尔查文（Г. Р. Державин）也不能列入他们之中，因为他过于受政权的支配”。^①

不难看出，别尔嘉耶夫和利哈乔夫之所以把拉季谢夫视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先驱，是因为在拉季谢夫身上，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性、独立性已表现得十分充分。按这一标准，他们还认为：“古代俄罗斯的第一位知识分子是生活在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的马克西姆·格雷克，他受过意大利和希腊文化的熏陶。……在俄罗斯，他备受迫害，曾被监禁，死后才被列为圣修士。他以自己在古罗斯的生活，勾画出了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道路”。^②

在别尔嘉耶夫和利哈乔夫看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产生首先是与文化的欧化、启蒙运动的普及、科学、艺术的发展、文化的特有形式的全面确立和其从业者的职业化联系在一起。其次，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诞生和掌握思想、一定的话语权及出版的技能息息相关，它也和宗教、政治思想、言论及出版的自由化密不可分，而这一切，在俄罗斯是在政治专制、保守主义和宗教教条主义的高压与钳制之下，在书刊检查的种种忌讳和驱赶中，在缺乏公民思想和传统的社会国家里（即与西方的自由有原则性区别的另一种社会文化条件下），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获得的。

这一观点受到著名的文学家奥夫夏尼科·库里科夫斯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的支持。他也认同知识分子的起源是在民族文化被欧化、在自由等思想的影响之下产生的，但他把恰达耶夫（П.Я.Чаадаев）发表《哲学书简》的 1836 年视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发端。在奥夫夏尼科·库里科夫斯基看来，恰达耶夫对在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俄罗斯民族文化、俄罗斯文明的尖锐批评，激起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几乎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争论，围绕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自我认同问题，催生出许多原创性的假说和俄罗斯文化及文明的特殊性的概念。恰达耶夫的批评还导致了与俄国弥赛亚思想相对立的民族虚无主义的产生，而这正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明证。

这一观点其实进一步论证了知识分子的问世离不开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影响。18 世纪，来自西方的启蒙运动和哲学思想打开了俄国受教育人士的眼界。在接受和消化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俄国的一些受教育人士的自我意识不断被强化，渐渐地在文学、美学及社会、哲学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观念，也由此确定了社会文化现象

① Д·利哈乔夫：“谈谈俄罗斯知识分子”，陆人豪译，《俄罗斯文艺》，2002 年第 3 期。

② 同上。

的时代特征。这些人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不同的活动领域，他们的活动也反映出俄国自由思想和独立文化形成的历程。

持第三种观点的是以白银时期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梅列日科夫斯基（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和路标派的格尔申宗（М.О.Гершензон）等为代表的一批人。他们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产生于彼得改革时期，彼得就是俄国第一位知识分子。梅列日科夫斯基坚信：“彼得把自己的面貌就像模铸在铜钱上一样模铸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血肉之中。彼得唯一合法的继承者，彼得的孩子，就是我们大家——俄罗斯知识分子。我们中有他，他中有我们”。^①格尔申宗则宣称：“我们的知识分子从彼得改革伊始就公正地继承了自己的家谱”。^②19—20 世纪之交的宗教哲学家布尔加科夫也曾说：“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灵魂是彼得塑造的，同时，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灵魂也是理解俄罗斯国家与社会未来之命运的关键。是好抑或是坏，但彼得的俄国之命运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他们就是彼得开启的通往欧洲的那扇窗户，……是欧洲文化传入千百万民众的主要通道”。^③

当代著名的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者卡根（М. С. Каган）也支持这一理论，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出现以及随后的发展历程都是彼得大帝改革的直接产物，这在欧洲是没有类似现象的”。^④

美国学者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旧体制下的俄罗斯》一书中，把俄国知识分子诞生的时间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贵族、贵族权力、自由和特权诏书》（1785 年）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由于叶卡捷琳娜二世向贵族阶层敞开了通往自由教育、创造性活动之路，才有了贵族知识分子问世和后来 60 年代的改革以及平民青年的大量涌现。^⑤

有一批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到十八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人数不多的俄国知识分子——聚集在罗蒙诺索夫周围的进步学者”。^⑥

但也有学者如利哈乔夫等人，不同意知识分子的彼得时代出生说。利哈乔夫的理由是：“彼得时代不存在知识界。知识界的形成需要大学知识与自由思维和自由的处世态度的结合”。^⑦

① 梅列日科夫斯基：《重病的俄罗斯》，李莉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5 页。

② Вехи. Из глубины... С. 81.

③ Вехи. Из глубины... С. 33.

④ Каган М. С.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и природ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1, С.8.

⑤ Пайпс Ричард. Россия при старом режиме. М., 1993, С. 325-266.

⑥ Н·А·康斯坦丁诺夫等编：《苏联教育史》，吴式颖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203 页。

⑦ Д·利哈乔夫：“谈谈俄罗斯知识分子”，陆人豪译，《俄罗斯文艺》，2002 年第 3 期。

这一观点的基础依据于俄国世俗教育发展史，因为俄国受教育阶层最初的形成就始于彼得时代，但其真正的完成则应该是在 18 世纪下半叶。不可否认，是彼得的改革大大促进了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他实施的世俗化教育方针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为人们打开了认识世界及自我的新天地。此外，彼得时代解除了教会对宗教生活的垄断，加强了世俗知识、唯理论的科学思想的传播及发展；俄罗斯与西欧的科学和文化接触，促进了西方新思想对俄罗斯文明社会的渗透，也促成了许多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的提出并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与此同时，表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专用名词“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也在 18 世纪由俄国学者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引入到了俄国。

10 世纪，随着宗教和神职人员，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编书人、医生、教师、翻译者来到了俄国。他们为俄罗斯带来了文字，也带来了古罗斯的教会制度，不仅为俄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的问世播下了种子。所以第四种看法就是到古罗斯时代去探寻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之源。著名思想家费多托夫就宣称：俄国第一批知识分子就诞生在古罗斯。他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人，即古罗斯时期的东正教的教士、修士、誊写抄书的司书，而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主要来自贵族阶层和神职人员阶层，早在封建时代即已开始形成。历史学家维尔纳茨基（Вернадский Г. В.）也强调：“早在基辅时代，古罗斯就已经出现了与拜占庭和西方知识人水平旗鼓相当的俄罗斯精英”。^①

当代著名的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者梅麦托夫（Меметов В. С.）也是知识分子古罗斯起源说的支持者。他的研究表明，如果在古代罗斯没有一批识文断字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努力，就不可能“有古罗斯 11—13 世纪的文化繁荣，也更谈不上 14—17 世纪民族意识的高涨”。^②

但我们认为，严格地说，古罗斯时期的知识人还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原因在于：

首先，他们还没有完全在经济上、思想上取得独立：那时还没有报刊、杂志和学校，他们没有机会选择，只能或者加入政权或者接受大公的赏赐和馈赠来维持生存。而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根本就谈不上人格的独立，更遑论思想上的自由。这使得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根本无法超逾自己的职业范围和社会等级，因而教会人士要以“为上帝服务”为己任，政界人士如沙皇履行着自己“上帝代言人”的职责，而其他人士则做“沙皇的奴仆”。就像利哈乔夫院士所指出的那样：“假如弗拉基米

① Вернадский Г.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Киевская Русь. Тверь-М., 1996, С. 302-309.

② Меметов В. С. Указ. Соч. С.8.

尔·莫诺马赫没有写那本主要是为公侯们用的《家训》的话，他的良知和通晓五种语言的本领有可能成为把他列入第一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理由。但是，他的行为并不总是符合永恒的普遍的道德准则。他的良知局限于他作为大公所操心的事。安德烈·库尔勃斯基公爵若不是身为军队统帅而‘离开’伊凡雷帝的话，可说是一位知识分子。作为公爵，他有权选择宗主；但是，作为指挥军队的军人，他的逃跑是于心有愧的”。^①

其次，他们的数量极为有限，尚未构成一个能对社会有所影响的团体。那时的教育体系尚未健全，更遑论培养出一大批关心社会并有相当能力可以就其所关心的问题评判或解答的人。

何况，古罗斯时期少数受教育的人士主要以教会和政界精英人士为主，其主要构成是个别受过教育的贵族和行使文化及启蒙使命的神职人员，还有少数商人（如《特里法恩·科罗别伊尼科夫东方之行》的作者等等），他们分处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加上那时的书籍等传媒也极为有限，不能把他们的言论广泛地传达给大众，因而他们的影响甚微。

现在我国和俄罗斯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在18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19世纪中叶出现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完成了这一特殊阶层的形成。而在此之前的中世纪，甚至更久远的时期，知识分子的活动仅限于个别现象，他们应该被归入到“前知识分子”的行列。在这些时期，前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编撰各种书籍来宣传知识，传播思想。他们不仅是拜占庭文化对古罗斯文化影响的中介，也是早期古罗斯文化与周围中、西欧国家文化交流的使者。各种文化、文明、不同民族、国家交流对话、交流的媒介——这一传统的使命从他们开始，并一直沿袭下来，今天仍是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之一。

从上述简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俄罗斯学界关于知识分子来源的四种说法：一个与平民知识分子有关，一个与西方启蒙思想有关，第三个与彼得大帝的改革有联系，最后一个的根源在古罗斯。而俄罗斯学者们之所以对此问题争论不休，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对知识分子界定标准的多元化有关，他们每一派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界定，有自己对知识分子独特的评判标准。他们或者以社会结构为依据，或者以知识分子的特点为出发点，或者从知识分子的功能作用角度来判定知识分子的起源时间。而俄罗斯学界对知识分子传统的也是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即主要把知识分子按学历和所从事的职业为标准进行区分，把知识分子视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教育不断普及并提高的情况下，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脑力劳

① Д·利哈乔夫：《谈谈俄罗斯知识分子》，陆人豪译，《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3期。

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日趋变小的今天，这种划分标准显然范围过大，而且也没能充分把握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这只能使对知识分子的理解更趋复杂。另一种是文化学的界定。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学历加职业”的传统模式，强调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理性阶层和道义“良知”的积极作用。但这样的划分明显地过于主观化和伦理化，忽视了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多样性。在我们看来，这两种界定实际上都只是把研究对象的某一组特征与性质抽象和概括出来，并未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内涵。因而难以达成一致。他们的种种观点也是互为补充的，我们应综合加以分析研究。

近年来研究者强调要从更多的角度来研究知识分子，因为生活在科学多元论的今天，虽然不同的学科展现的是不同的现实，有时它们甚至相互矛盾，但每门学科呈现的是现实的不同侧面，而这些矛盾也不会和总的现实相矛盾。比如，从社会学角度看，知识分子是受过中高等教育、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一个社会群体。从哲学角度看，这是人类社会一种精神和道德伦理的标准。从心理学角度看，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是其心灵不断的自我发展（саморазвитие）和自我改造（само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等等。这一切为我们客观、全面地研究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加多样的视角。

需要指出的是，各个阶段，如古罗斯和俄帝国时期以及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并不是由于时间，而是因社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上以及历史因素造成的。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也绝非完全迥异，他们身上仍有一些共同的、相似的地方。

通过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我们更赞同著名的 19-20 世纪之交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米留科夫的分析和论证：真正的、最初的俄国知识分子确实是在彼得大帝时期形成的，但知识分子的雏形却“不是从彼得开始的，而是始于 14 世纪末、甚至 13 世纪末的诺夫哥罗德”，^①产生于贵族和僧侣之中。

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问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0 世纪时，古罗斯接受拜占廷的基督教，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问世奠定了基础——东正教为俄罗斯文字、教育的发展撒下了种子。彼得向西方学习而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尤其是他施行的强行欧化政策和兴办世俗教育，教会了俄国人识字，为知识分子的形成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即培育出一个受教育的阶层，使之具有了思考社会问题和批评的能力。把这些人从社会层面上剥离开来——他的后继者们对贵族阶级实施的种种优待政策，为受教育者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产生也离不开外来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不仅打开了受教育者的眼界，而且西方文明还成为俄国知识人研究俄国社会、民族历史及文化的参照物——来自西方的影响、俄国

^① Милуков П. Н. Русская культу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В кругу писателей и мыслителей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М., 1994, Т.2, С.46.

的启蒙运动更为知识分子的出生营造出了适宜的温度。可以说，是彼得教会了俄国人识字，西方的思想擦亮了俄罗斯受教育阶层的眼睛，19世纪伊始，面对国内严酷的现实，其中的一部分先进人士认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落后，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开始了自己的思索和寻求，在政治、经济、教育、出版、科学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设想。从而催生出第一批优秀的贵族知识分子。此后，又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俄国终于培养出了一大批自己的优秀知识分子：普希金、罗蒙诺索夫、洛巴切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等等。

【Abstract】 The advent of Russian intellectuals is an issue which relates to how to view the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intellectuals, how to evaluate intellectuals' role in Russian culture, and problems regarding intellectuals' national features, genres and their intrinsic law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as well. The controversy over this issue in the Russian academic circle mainly results from their divers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towards intellectuals. They can't come to an agreement because they are based on either social structure or characteristics or functions of intellectuals. However, their views are actually complementary, and should be analyzed synthetically.

【Key Words】 Russia, intellectuals, standards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стандарт

（责任编辑 温刚）

俄国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党政治恐怖主义路线

曾媛媛*

【内容提要】知识分子是俄国社会革命党领导阶层的重要组织部分，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事业，但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和政治思维出现的偏差，他们片面而偏激地宣传政治恐怖主义。正是这种政治思维所导致的错误惯性断送了社会革命党的政治生命。

【关键词】知识分子 社会革命党 政治恐怖主义

【中图分类号】K512.4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4-0021-(14)

知识分子作为近代俄国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独特的公共肖像。他们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命运，具有强烈的公共精神和意识；他们同情劳动人民，怀有“为民请命”的永恒情结；他们善于总结和反思，具有难得的批判精神。这些知识分子的公共特质深刻影响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维。在漫长的俄国现代化进程中，他们为了改善俄国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推动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提出过许多深刻而有价值的命题，对沙皇专制制度和近代俄国社会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思想。政治恐怖主义是近代俄国激进主义政治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粹派知识分子探索俄国现代化道路的一次失败的理论探索和行动尝试。社会革命党是近代俄国主要的民粹主义团体，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在策略上继承了民意党的恐怖主义手段。政治恐怖是社会革命党政治策略的主要特征。本文以社会革命党的政治恐怖主义为切入点，根据原始档案资料考察近代俄国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对政治恐怖主义理论的思考和恐怖活动实践；探讨政治恐怖主义作为一种非常革命手段的效能问题；从政治文化视角，对近代俄国政治恐怖主义的失败进行探源。

* 曾媛媛，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知识分子与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政治恐怖主义路线选择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一批代表农民利益的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并于1873-1874年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хождение в народ）。他们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鼓动农民发动革命推翻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民粹派的名称由此而来。这是民粹派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拉甫罗夫（П.Л.Лавров）作为这次运动的领导者，将这次运动的精神概括为：“人们不仅在努力实现某个实际目标，同时还在努力满足个人道德净化的深层需求。”^①热情的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这次运动，到农村亲眼看到一直以来同情和感谢的人民，亲身体验农民的生活和劳动。他们以小组形式进行活动，通过印发传单，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揭露社会的不平等，鼓动农民发动革命推翻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由于当时俄国革命的基础薄弱，民粹主义者并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响应，再加上沙皇政府的镇压，“到民间去运动”以失败告终。此后，民粹主义者放弃宣传鼓动的活动方式，为尽快实现社会革命转而选择了激进的革命方式，慷慨激昂地走上了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道路。

1876年10月，“土地与自由社”（Земля и воля）成立。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米哈依洛夫（А.Д.Михайлов）、纳坦松（А.А. Натансон）等人成为该组织领导人。他们组织了各种宣传及罢工活动。“土地与自由社”提出明确的斗争纲领，主张把全部土地平分给农民，村社应有完全的自主权。由于在斗争策略上的分歧，“土地与自由社”于1879年分裂成“黑土平分社”（Черный передел）和“民意党”（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二者继承“土地与自由社”的纲领，并在内容上进一步完善。“黑土平分社”主张进行宣传，民意党则转向了恐怖。

民意党将恐怖手段视为最重要的斗争形式，发展了“土地与自由社”所奠定的“集中制”组织原则——秘密、集中、互相监督、少数服从多数、严守纪律。民意党将推翻专制制度、将政权还给人民确立为自己的政治使命，在1878-1879年间组织了一系列的恐怖活动^②。1881年3月13日（俄历3月1日），经过半年的密谋和跟踪，民意党成功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此举非但没有实现民意党人唤起人民觉醒和推翻沙皇制度的愿望，反而带来沙皇政府更加残酷的镇压，民意党组织遭到极大削弱，党的主要活动家先后被捕甚至被处死，执行委员会遭到严重摧残。1884年10月，民意党停止活动，俄国革命民粹主义运动至此陷入沉寂。

19世纪90年代初期，民粹派运动复兴肇始。侨居国外的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开始

^① Ричард Стайтс. Женское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Феминизм, нигилизм и большевизм 1860-1930. М., 2004. С. 199.

^② 其中包括：女革命家查苏利奇（В.И.Засулич）刺杀彼得堡市市长特列波夫（Ф.Ф.Трепов），克拉夫钦斯基（С.М.Кравичинский）刺杀宪兵队长梅津佐夫（Н.И.Мезенцов）等事件。

反思民意党的失败原因，总结民意党时期留下来的思想遗产和活动经验，宣传民粹主义中的激进思想和政治恐怖主义。曾被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В.М.Чернов）视为自己的老师、后来加入社会革命党并成为社会革命党国外组织领导人之一的日特罗夫斯基（Х.О.Житловский）认为，“恐怖是民意党所有的纲领、目标、创举中最伟大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它使民意党名声大振、强大并富有感召力”。^①“民意党的恐怖之所以没有成效，是因为它没能成为工人政党的政治恐怖主义。”^②民粹派元老布尔采夫（В.Л.Бурцев）^③认为，1879-1881年民意党的纲领已不合时宜，但民意党却留下了不变的信条——政治恐怖。“政治恐怖对于我们的国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它的影响是如此深远，革命者所有的意见分歧在恐怖面前都应该消失。重要的是，政治恐怖应成为确立和调整各小组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各小组应一致认可政治恐怖的重大意义。所有的政治恐怖卫士应不顾在其他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将自己视为一个家庭的成员——无论如何要联合成一个政治恐怖同盟。”^④

随着民粹派运动的复兴，一些宣称自己是民意党继承人的秘密民粹派小组逐渐涌现出来^⑤。“社会革命者联盟”^⑥是俄国第一个正式使用“社会革命”这一名称的秘密民粹派组织。该联盟的纲领《我们的任务》^⑦（Наши задачи）在最后一部分“革命斗争手段：恐怖活动与群众革命斗争”中（Средств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ы:

① Григорович С. (Житловский Х.О.). Социализм и борьба за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вободу. Лондон, 1898, С. 58. Цит. по: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этик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XX в.). М., 2000, С. 113.

② Григорович С. (Житловский Х.О.). Указ. соч. С. 62. Цит. по: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этик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XX в.). М., 2000, С. 116.

③ 布尔采夫是首批后民粹派小组（пост-народовольческие группы）之一——“社会联邦制拥护者”（социалисты-федералисты）成员。

④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этик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XX в.). М., 2000, С. 125.

⑤ 当时出现的秘密民粹派小组有：“旧民意党人小组”（Группа старых народовольцев）、“社会革命者联盟”（Союз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南方社会革命党（Южная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俄国政治解放工党（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 России）、农业社会主义同盟（Аграрно-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лига）、社会革命党农业联盟（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союз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等。

⑥ “俄国社会革命者联盟”1894-1896年成立于萨拉托夫，随后其重心转移至莫斯科。在彼得堡、雅罗斯拉夫、波尔塔瓦、托木斯克等地有其分支机构和派驻代表。联盟以《我们的任务》（Наши задачи）为纲领，以《革命俄罗斯》（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报为理论刊物。成员由知识分子构成，人数少。主要领导人阿尔古诺夫（А.А.Аргунов）、谢柳克（М.Ф.Селюк）等。1901年9月，第三期《革命俄罗斯》出版后，社会革命者联盟在托木斯克的印刷厂被查封。同年12月，莫斯科的中央小组以及其他城市的大多数联盟代表均遭逮捕。

⑦ 《我们的任务》于1896年初完成，由联盟创始人和领导者、后来成为社会革命党著名活动家的阿尔古诺夫（1866-1939）起草，胶版印刷，原名《社会革命者联盟纲领基本原则》（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программы Союза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1898年，由阿尔古诺夫作序，纲领以《我们的任务》之名在莫斯科油印出版，此后，莫斯科成为社会革命者联盟中心。1900年，《我们的任务》在伦敦由侨民中的“俄国社会革命者联盟”印刷，联盟领导日特罗夫斯基（Х.О.Житловский）以格里高洛维奇（С.Григорович）之名为纲领作后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 и масс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орьба) 集中论述了革命政党在争取政治自由斗争中的特殊作用。纲领指出, 专制制度有百万军队保护, 在这样的条件下, 无法创建群众性的社会革命政党。因此, “应当先摧毁现存的政治制度, 这一任务只能以‘社会革命党’之名完成”^①。关于政治恐怖的作用, 纲领是这样总结的: “政治恐怖是该政党最有力的斗争武器之一, 也是指导过去和现今革命的有效手段。政治恐怖可以归结为消灭当下最反动、最有影响力的俄国专制制度的代表人物。系统的恐怖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ррор) 联合其他的群众斗争方式 (工厂的、农业的暴动、游行等) 瓦解敌人, 这些斗争方式只有在恐怖中才能获得重大的决定性意义。只有在战胜专制制度并获得完全的政治自由后, 恐怖活动方可停止。恐怖活动除了具有涣散和瓦解敌人的主要作用, 还具有宣传鼓动的作用。……最后, 恐怖活动还是所有地下革命政党保护和捍卫组织、防止奸细叛变破坏的手段。”^②

1901 年夏, 在巴黎的俄国旧民粹派小组出版了第一期《俄国革命通报》(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这正是后来的社会革命党机关报《革命俄罗斯》(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 的前身。《俄国革命通报》的纲领开篇写道: “我们自认为是民意党思想上的继承者。”^③对于恐怖的态度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忠实于执行委员会的传统, 我们将恐怖视为必要手段。……我们认为, 只有在党组织领导下的系统的恐怖才是合理的。我们铭记, 民意党的恐怖活动符合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 能够完成尚未完成的推翻专制统治的历史任务, 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④

1902 年 1 月, 《革命俄罗斯》^⑤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 第 3 期刊登通告, 宣布社会革命党成立。这一期《革命俄罗斯》刊登了一篇题为《紧急任务》(Неотложная задача) 的文章。文中关于恐怖的措辞十分含糊: “关于恐怖这一点, 可以并应该以某种表达方式列入党的共同纲领……在承认恐怖斗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原则下, 当周围的条件成熟时, 党保留自己着手进行恐怖斗争的权利。”^⑥三个月后, 即 1902

① Наши задачи //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т. / Т. 1. 1900-1907 гг. М., 1996, С. 24.

② Там же, С. 25.

③ 由民粹派侨民在巴黎创办, 在日内瓦出版。1901-1905 年不定期发行了 4 期。第一期间世于 1901 年夏, 主编卢萨诺夫 (Н.С.Русанов)。1902 年 2 月, 从第二期开始, 该杂志成为社会革命党的恐怖宣传喉舌, 由切尔诺夫 (В.М.Чернов)、郭茨 (М.Р.Гоц)、卢萨诺夫、卢巴诺维奇 (И.А.Рубанович) 集体编辑发行。

④ Наша программа // Вестник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01. № 1.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т. / Т. 1. 1900-1907 гг. М., 1996, С. 51.

⑤ Там же, С. 58.

⑥ 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 1901-1905 年共发行 77 期。由社会革命者联盟 (Союз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创办并出版头两期, 最后一期由切尔诺夫 (В.М.Чернов)、郭茨 (М.Р.Гоц) 和希施科 (Л.Э.Шишко) 编辑, 以文章单行本形式发行。

⑦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С. 125, 134.

年4月2日，战斗队成员巴尔马舍夫（С.В.Балмашев）刺杀了内务大臣西皮雅金（Д.С.Сипягин）。此后，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革命俄罗斯》刊登了切尔诺夫写的题为《我们纲领中的恐怖因素》（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элемент в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е）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无论党的教条主义者有多怀疑、多反对这一斗争方式，恐怖的生命力都将战胜他们对恐怖的成见。实际上，恐怖活动并不是简单的‘需要’或‘合理’，而是必要和必然。”^①。《我们纲领中的恐怖因素》在社会革命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社会革命党将政治恐怖主义纳入党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革命党的政治恐怖主义动员

社会革命党将政治恐怖作为争取政治自由、实现社会公平的政治斗争工具，必然需要一定的理论依托和精神道义上的支撑。社会革命党的理论思想家在实践中创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学说，为政治恐怖活动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宣传鼓动。他们首先需对政治恐怖策略和一系列政治恐怖活动进行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辩护，一方面强调作为政治工具的暗杀不同于一般的杀戮行为，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将革命者的自我牺牲上升到革命英雄主义的高度，消除社会民众对政治恐怖的心理恐惧和排斥，唤起革命者对政治恐怖的向往。

1、以武抗暴强调政治恐怖的合理性

社会革命党认为，在沙皇专制制度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并残酷镇压群众运动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恐怖是人民自卫的武器和安全防御体系。为了强化政治暗杀的特殊性，社会革命党理论家以“武力”（сила）和“暴力”（насилие）的语义辨析作为切入点，回避了政治恐怖主义的破坏性本质，宣传政治恐怖作为政治工具的合理性。

社会革命党理论家认为，政府对人民和革命者的残酷镇压是“暴力”，革命者和被压迫人民反抗专制统治是“武力”，二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武力是对个人及其权利的正当捍卫；而暴力是对个人及其权利的侵犯。武力完全是同恶势力斗争的手段；暴力则永远支持并服务于恶势力；应该以武力对抗暴力。1904年，第46期《革命俄罗斯》上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关于革命斗争中的武力和暴力的问题》（К вопросу о силе и насилии 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борьбе）。该文章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便是：以武

^① Чернов В.М.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элемент в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е //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3-х тт. Т. 1. 1900-1907 гг. М., 1996, С. 78.

力对抗暴力^①。社会革命党的主要恐怖组织——“战斗队”的领导格尔舒尼（Г. А. Гершуни）宣称，“党难以忍受政府对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动用暴力，在这种压力下，党不得不以暴抗暴。……在社会舆论高涨的时代，反动势力的打击只会导致个人的绝望的顺从。坚定不移的反抗是必然的……”^②

社会革命党理论家企图除去政治恐怖的“破坏性”和“非法性”标签，用“合理性”和“必要性”来粉饰政治恐怖主义。这种粉饰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可以用来激发民众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革命激情。但是片刻激情过后，尤其是当革命的力量被专制势力打压削弱之后，人们看到的是这种理论对于改变现实的无助以及对于民众日常生活和心灵的持续破坏。粉饰的外衣终究会脱落，理论的光环注定会消散。没有了粉饰的政治恐怖主义终将彻底丧失民心，退出历史舞台。

2、以“使命”强化的革命正义

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认为，政治恐怖担负着执行人民和社会审判的使命。切尔诺夫在给尼古拉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恐怖的一切意义在于，它要执行一个不成文的但却无可争议的人民和社会良心的审判。”^③

1907年2月，社会革命党召开第二次临时会议。政治恐怖策略的存废问题成为此次会议的争论焦点。格尔舒尼在这次临时会议上阐释了政治恐怖的意义。具体发言内容如下：“社会革命党的恐怖活动不是对掌权者肉体上的杀戮和清除。恐怖对我们而言有另外的意义……当社会的愤怒和仇恨集中到某一类的政府代理人头上，不论职位的高低，当这些代理人成为独裁和暴力的象征，当他的行为对社会财富构成危害，在任用期间没有任何办法排除他所造成的危害，当他的存在成为对社会良心的侮辱，最后一扇门向恐怖打开，它为忧心忡忡的自觉的公民执行判决。当炸弹爆炸时，人们长出一口气。那时，所有人将明白，人民的审判终结了！无需任何解释，任何传单。国家期盼着这一审判，……只有杀戮能解救百姓。”^④

格尔舒尼认为，当权者是独裁和暴力的象征，是对社会良心的侮辱，暗杀当权者的政治恐怖行为是在执行人民的审判，是在解救百姓。这种以“使命”装饰政治恐怖主义、遮掩恐怖主义的破坏性本质的理论，为革命者的心理塑造了强烈的正义感。但是，这种丧失科学性的非理性宣传势必导致政治恐怖活动的失控，逐渐偏离党最初设定的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革命党自身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极其

①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С. 156.

②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Россия. 1904. № 46. 5.05. С. 5-6. Цит. по: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этик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XX в.). М., 2000, С. 156.

③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С. 167.

④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С. 173.

消极的影响。

3、以革命英雄主义动员革命者

社会革命党认为，执行政治恐怖任务的革命者必须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必须勇于承担恐怖行为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他们借助道德哲学、宗教哲学将革命者的自我牺牲上升到革命英雄主义的高度，为政治恐怖制造特殊的光环。

津齐诺夫（В.М.Зензинов）既是社会革命党的著名理论家，也是“战斗队”的成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是年轻的康德（Kant）哲学的信徒，我们认为人是最终目的，社会性的服务造就了个人的自我价值，对我们而言，恐怖问题是最危险、最悲惨、最折磨人的。……我们去暗杀是因为政府没有给我们任何可能让我们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政治纲领，为国为民造福。倘若在某种程度不能为暗杀辩解，那么唯一可行的就是主动地救赎，这必然会导致个人牺牲。从道德哲学的观点看，暗杀行为同时也应该是自我牺牲的行为。”^①津齐诺夫认识到恐怖的一些负面效应，但却从人生观的角度用道德哲学论证了革命者自我牺牲的必然性和崇高性。

在赋予革命者自我牺牲的荣誉感和政治复仇的神圣使命感的同时，社会革命党还极力营造对政治恐怖顶礼膜拜的神秘氛围。社会革命党关于政治恐怖斗争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纲领中的恐怖因素》中的一段文字渗透着一种宗教式的痴迷。“恐怖斗争能够提高周围人眼中的革命政党的威信，证明革命的社会主义拥有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尤其满怀奋不顾身的热情，渴望建立功勋，从而提升了这些真正的伟大烈士们的正义，使他们能够高兴地为（政治恐怖的）胜利献出自己的生命。”^②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在给尼古拉耶夫斯基（Б.И.Николаевский）的大量信件中越来越多地提到“英雄的个人”（героические одиночки）和“英雄突击队”（героические ударные группы）^③。1907年2月，社会革命党召开第二次临时会议，格尔舒尼在阐释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观时公开宣称“‘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убийца —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героем）^④。

《革命思想》（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мысль）^⑤第5期刊登了一篇题为“死亡的象征”

① Зензинова В.М. Пережитое. Нью-Йорк, 1953, С.108. Цит. по: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этик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XX в.). М., 2000, С. 158.

② Чернов В.М.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элемент в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е... С. 84.

③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С. 167.

④ Там же. С. 173.

⑤ 1908年—1909年由尤杰列夫斯基（Я.Л.Юделевский）和阿加福诺维（В.К.Агафоновый）在巴黎创办的报纸。总共出版了6期。《革命思想》报编者认为，首先应该争取政治自由，然后才能解决社会问题。对全民公开武装起义的想法给予否定评价。认为恐怖是俄国社会政治解放的唯一途径。社会革命党的守旧派认为《革命思想》中的观点带有“恐怖立宪主义”（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детзм）的特点；列宁巧妙地将该报纸更名为“不成熟的革命思想”（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едомыслие）。

(Memento mori) 的文章，文中写道：“俄国的命运掌握在俄国革命者手中……只有英雄的行动，只有壮士死前所唱的歌颂永垂不朽的理想之曲能够鼓舞群众参加战斗。这些令人敬畏的复仇者是即将出现的新人类雏形。对他们而言，‘我想’和‘我创造’是融合的。‘我’的涵义就是创造新的价值。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我’与世界是融合的。人们是带着对这种英雄的价值观就义的”^①。

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将政治恐怖视为政府残酷镇压下合理的政治复仇；自我牺牲是革命者执行政治恐怖任务后自我救赎的途径，是神圣而光荣的；革命者在政治恐怖活动中体现了自我的社会价值。这种理论思想渗透着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和宗教式的痴迷，缺乏科学理性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社会革命党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4、以群众运动为政治恐怖主义造势

受无产阶级工农运动的影响，社会革命党理论家将群众运动纳入到党的工作范围，提出群众运动与政治恐怖相结合的理论，并着重强调：政治恐怖并不是要取代群众运动，而是要以服务为目的，对群众运动进行“补充”和“强化”，从而保护群众自身的权利，争取更多的政治自由。

在《我们纲领中的恐怖因素》中，切尔诺夫论证了政治恐怖与群众运动的关系：“恐怖不是一种能独立存在的斗争体系，并非借助自己内部的力量就会必然冲破敌人的阻抗，使其投降……对我们而言，恐怖只是我们的部分革命武装所掌握的众多斗争方式之一。……恐怖应该与所有爱国主义群众斗争方式重新组织成一个体系，自然而合理地政府对政府施加压力。恐怖只是一种手段形式，只是一种斗争的技术方法，只有和其他斗争方式相互配合、协同运作发挥效用，才能产生我们所期望的影响”^②。恐怖与其他斗争方式相互配合、协同运作，但“绝对不是替代，我们只是想通过战斗先锋队的勇敢出击和对敌人心腹的有力打击补充和强化群众斗争……我们反对一切片面的恐怖主义特殊论。”^③

“战斗队”成员杜列波夫（Егор Дулебов）暗杀乌法省长博格丹诺维奇（Н.М.Богданович）之后，切尔诺夫撰写《恐怖与群众运动》（Террор и массовое движение），专门探讨恐怖主义与群众运动的关系。这篇文章发表在《革命俄罗斯》上，文中提到，“恐怖应该成为，甚至不可能不成为一种辅助的斗争方式；……恐怖行动应该与群众运动联得更加紧密，以群众运动的需要为基础并对其进行补充，在

①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С. 186.

② Чернов В.М.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элемент в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е... С.84.

③ Чернов В.М.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й элемент в нашей программе...С. 84,85.

群众中唤起革命情绪，从而推动群众斗争。”^①切尔诺夫认为，民意党时代的恐怖主义者的不幸在于没有支持大量的工人运动，但对社会革命党而言，工人运动“现在就有并日益高涨”^②。

1905年革命爆发之后，社会革命党理论家们重新审视新的革命形势，提出了新形势下政治恐怖的新任务，即：全面开展群众性的恐怖主义游击战（*массовая партизанск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1905年10月出版的《革命俄罗斯》（第59期）的社论《战斗时刻》（*Боевой момент*）明确指出：可以集合大批手中有武器的民众发动进攻，可以调动勇士对反动势力的台柱进行恐怖袭击，可以开展全线的群众性的恐怖主义游击战。1907年7月，民粹派元老柴科夫斯基（*Н.В.Чайковский*）写信给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提议由埋伏在山间丛林中的流动的“匪帮”（*банды*）开展游击战^③。

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企图在政治恐怖与群众运动之间建立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政治恐怖发展群众运动，补充并加强革命力量；工农群众反过来积极参与政治恐怖活动促进政治恐怖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政治恐怖活动的成功实施，最终实现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目标。这一理论的实质在于以群众运动作幌子，为政治恐怖主义造势，扩大其社会影响。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没有认识到政治恐怖作为一种革命手段的特殊性和政治效能的有限性，造成党在发展路线的制定中出现偏差，与党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严重误导了党的政治发展方向。

三、俄国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的政治恐怖主义实践

在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的大力鼓吹和动员之下，“个人恐怖”（*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й террор*）成为社会革命党策略的主要特征。社会革命党继承了民意党的恐怖主义手段，宣称政治暗杀是有效的革命手段，不仅可以威胁沙皇政府，迫使其进行改革；而且可以鼓动和唤醒社会、动员革命力量。1902年4月末，恐怖策略被正式列入党纲。同年，社会革命党还成立了恐怖主义组织——“战斗队”（*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该组织购买武器，组建有针对性的战斗小分队，其行动不受党中央的指挥，独立执行暗杀决定。在1902-1907年间，社会革命党以暗杀（*покушения*）、爆炸（*бомбометания*）、政治性剥夺（*грабежа п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мотивам*）、武装进攻

① Чернов В.М. Террор и массовое движение //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рограммы и тактики. Женева. 1903. С.122. Цит. по: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идеология, этик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начало XX в.). М., 2000, С. 140.

② Там же. С. 142.

③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Терроризм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м движении... С. 125.

(вооруженные нападения) 和敲诈勒索 (похищения, вымогательства и шантажа) 为手段, 制造了大量恐怖事件。他们特别推崇暗杀把持重权、极端反动的国务活动家的中央恐怖活动 (центральный террор), 并在实践中秘密策划并成功实施了多起对彼得堡和莫斯科政府领导的暗杀, 掀起了俄国政治恐怖活动的高潮。据统计, 1905-1907 年间发生的恐怖行动中, 有 78.2% 是由社会革命党完成的^①。社会革命党实施的政治恐怖活动的涉及面之广、死伤人数之多,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社会革命党 1911 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从 1902 年到 1911 年 (包括 1911 年), 总共实施了 213 次恐怖活动^②。

在众多从事政治恐怖活动的革命者当中, 不乏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革命家。首先是大名鼎鼎的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创始者, 被称为社会革命党恐怖主义“红色教父”^③的格尔舒尼 (Г.А.Гершуни)。

格尔舒尼 (1870-1908), 犹太人, 化学家、细菌学家, 社会革命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是社会革命党恐怖小组先锋队“战斗队” (Бое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的创建者。在警察局眼中, 格尔舒尼是“恐怖艺术家” (артист террора)。在激进派眼中, 格尔舒尼是“革命猛虎” (тигр революции)^④。他在组织政治恐怖活动和挑选干部方面, 对“战斗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02 年 5 月, “战斗队”正式成为社会革命党的机构。“战斗队”在格尔舒尼领导期间共进行了 5 次恐怖活动: 1902 年 2 次, 1903 年 3 次^⑤。

1902 年 4 月 2 日, 格尔舒尼成功策划了对内务大臣西皮雅金的暗杀。这是“战斗队”首次公开进行的政治恐怖活动。此次恐怖活动取得成功后, 格尔舒尼迅速着手准备下一个政治恐怖活动计划: 在西皮雅金的葬礼期间暗杀极端保守和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东正教事务管理总局局长波别多诺斯采夫 (К.П.Победоносцев)。由于执行者的临时失误, 此次恐怖行动以失败告终。同年 7 月 20 日, 由切尔诺夫挑选的木工卡丘拉 (Фома Качура) 实施了对哈尔科夫省长奥博连斯基的暗杀。此次行动虽然没有击毙省长, 但省长和身边的警察局局长均被射伤^⑥。1903 年 3 月 10 日, 乌法省长博格丹诺维奇下令在兹拉托乌斯托 (Златоусто) 对不满工厂制度的工人进行扫射, 打死 69 人, 打伤 250 人。1903 年 5 月 6 日, 格尔舒尼安排铁路工人杜列波夫

① Леонов М.И.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в 1905-1907гг. Самара, 1992, С.23-24.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 1900-1925 гг. В 3-х тт. Т. 2. Июнь 1907 г.—февраль 1917 г. М., 2001.

③ Городницкий Р.А. Г.А.Гершуни «Красный отец» эсеровского терроризма// Будницкий О.В. Евреи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1999, С. 233~266.

④ Гейфман А.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террор в России: 1894-1917гг. М., 1997, С. 73.

⑤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С. 379.

⑥ Гейфман А. Указ. соч. С. 74.

成功完成了对博格丹诺维奇（Н.М.Богданович）的暗杀。

继格尔舒尼之后，又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充当了战斗组织的领导。萨文科夫（1879–1925）是社会革命党著名理论家、活动家，同时也是作家，著有中篇小说《白马》（Конь бледный）和长篇小说《未曾发生的事》（То, чего не было）。萨文科夫出身世袭贵族，父亲是波兰的法官。在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就读期间，因参加学生动乱被开除。1903年5月，萨文科夫负责组织和领导战斗组织。上任后，他更换了一套全新的组织成员，在对具体恐怖行动的周密部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亲自参与了对内务大臣普列维、谢尔盖·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Сергей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大公、内务大臣杜尔诺夫（П.Н.Дурнов）、莫斯科省长杜巴索夫（Ф.В.Дубасов）等重要人物的暗杀行动。

1905年2月4日，萨文科夫派其密友卡里亚耶夫执行了对莫斯科省长谢尔盖·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的暗杀计划。萨文科夫认为大公应对1905年1月9日的“流血星期日”（Кровавое воскресенье）事件负主要责任。按照萨文科夫部署的行动计划，卡里亚耶夫向大公乘坐的马车投掷炸弹，大公当场被炸死，马车夫和“战斗队”成员身负重伤^①。同年5月10日，卡里亚耶夫被执行绞刑^②。

值得注意的是，1914年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1902–1911年间社会革命党所从事恐怖活动27人中，有20人是女性，均来自知识分子阶层^③。社会革命党的44名女性革命家当中，11人受过高等教育，23人受过中等教育，6人只受过家庭教育，3人只受过初等教育。这些女性革命家中有9名老师，8名大学生^④。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为她们提供了难得的受教育机会；贵族出身又能够使她们在接触穷苦的农民之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社会的不平等，强烈地向往社会公平；而较高的教育水平为他们阅读和理解激进主义、社会主义著作中蕴含的革命思想，为她们革命理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有助于形成更高的政治觉悟。

社会革命党战斗队的女性成员伊万诺夫斯卡娅·沃洛申科（Ивановская-Волошенко）（1853–1935），出生在图拉州一个穷苦的乡村牧师的家庭，幼年丧母。在一位十二月党人的资助下，她和妹妹得以就读于图拉州的一所宗教学校。1871–1873年，伊万诺夫斯卡娅去彼得堡，在著名的阿拉钦斯基女子讲习班学习，梦想成为一名教师。她曾试图进行革命宣传，但迫于沙皇政府的抓捕浪潮，最终转而从事地下工作，后来积极加入民意党。她先是在彼得堡一处秘密活动寓所扮演“女

① Там же. С. 80.

② 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С. 379.

③ Будницкий О. В. Введение // Женщины-террористки в России. Бескорыстные убийцы.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1996. 本文引自电子版全文 <http://www.a-z.ru/women/texts/budniz1r-e.htm>

④ Там же.

主人”的角色，以掩护革命活动，后来又到民意党印刷厂工作。1883年，民意党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17人诉讼案受审，伊万诺夫斯卡娅被判死刑，后改服终身苦役。1904年7月15日，伊万诺夫斯卡娅参加了社会革命党对内务大臣普列维（В.К.Плеве）实施的暗杀行动。一名恐怖分子跑向普列维乘坐的轿式马车投掷炸弹，普列维当场殒命。

亚历山德拉·阿多丽福弗娜·伊兹马依洛维奇（Александра Адольфовна Измайлович）（1878-1941）出身贵族，1901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在实施对明斯克警察局局长的暗杀活动中，她当场将恐怖袭击对象射伤，被判11年监禁。

另一位社会革命党史上的传奇女性是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斯皮里多诺娃（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пиридонова，1884-1941）。她出身贵族，中学辍学，曾担任省贵族会议的管理员。1905年加入社会革命党的恐怖组织战斗队，1月16日在鲍里索格列布斯克（Борисоглебск）车站射伤省参赞卢热诺夫斯基（Г.Н. Луженовский）。此人曾因残酷镇压农民骚动成为社会革命党等组织袭击的目标。斯皮里多诺娃最终被莫斯科军事法院判处绞刑，后以终身苦役代替，被关押在坦波夫（Тамбов）市的一所监狱。十月革命后，她于1918年7月6日因积极参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一系列破坏活动被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法庭判处斯皮里多诺娃一年监禁，不久获特赦。此后伴随她的便是无休止的抓捕和流放。斯皮里多诺娃曾被流放萨马拉和乌法。后来，她放弃政治活动，成为计划经济专家。1937年斯皮里多诺娃和自己的丈夫马伊奥罗夫（И.А. Майоров）再次被捕，1938年1月，被军事法院判处25年监禁。1941年9月夫妇二人被执行枪决。

有“社会革命党恐怖之星”之称 of 阿纳斯塔西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比岑科（Анастасия Алексеевна Биценко）（1875-1938）在社会革命党中也有很高的地位。比岑科出身农民，中学毕业后在师范训练班学习。1902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先后在斯摩棱斯克（1902-1903年）、彼得堡（1903-1904年）和莫斯科（1905年）工作。1922年加入战斗队。同年11月22日，她在一次恐怖行动中将残酷镇压萨拉托夫省农民骚动的省长萨哈罗夫（В. В. Сахаров）当场击毙。比岑科被判死刑，后执行无期苦役。

四、知识分子情结与社会革命党政治恐怖主义路线的失败

知识分子作为俄国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忠诚地扮演着“民族良心”的角色，对俄国人民怀有特殊情结。他们同情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热爱改变人民命运的解放事业，甚至不惜为人民自我牺牲。在一些革命者心中，人民和上帝具有同等

地位。大批的知识分子放弃了自己美好的前程，不惜牺牲个人幸福和利益，完成了从社会上层到极端激进的社会革命者的“社会位移”。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革命事业，以“为民请命”和“自我牺牲”的态度试图代替人民与沙皇专制制度斗争，甚至从事最危险的、但在他们看来可以作为革命事业的政治恐怖主义。

然而在近代俄国，政治恐怖是一种暴力革命的非常手段。当社会处于无秩序的动荡时期，革命者通过刺杀、爆炸等极端手段制造恐惧，以相对来说最小的人力物力为代价，直接打击镇压革命的反动势力代表，从而引起社会的震动和恐慌，威胁统治者。从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角度看，社会革命党的政治恐怖活动只是借助革命力量的高涨迫使沙皇专制政府作出暂时而有限的政治妥协。这种行为不但没能缓解沙皇专制政府对革命的镇压，反而使其变本加厉，结果适得其反。因此，社会革命党的政治恐怖主义是沙皇专制制度下俄国革命政党和激进主义知识分子面对俄国落后的政治和经济现状，探索俄国现代化道路的一次失败的尝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社会革命党的理论家没有认识到恐怖主义反人性、反社会的本质，企图以革命和正义来粉饰政治恐怖主义的非法性、犯罪性、暴力性、破坏性等特点，片面而偏激地宣传政治恐怖主义，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类文明的向善耻恶的自然法。在理论上出现的认识偏差和局限导致社会革命党选择了错误的革命手段，并严重颠倒了政治恐怖与革命的关系，将本为革命非常手段的政治恐怖视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变成了为恐怖而恐怖，甚至不顾时局的变化和民心所向，坚持政治恐怖策略。社会革命党采取的革命手段本身与革命目标南辕北辙，又错误地将革命手段当成目的强行推行，这是政治恐怖主义失败的最根本原因。

其次，俄国 300 余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得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得以成型并且逐步稳定。在这个权力构架中，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受到严格控制，致使俄国社会结构发展缓慢。广大农奴处于社会等级的最下层，他们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最大，但在政治、经济、司法上处于根本无权的地位。专制制度的长期运行和知识文化水平的低下，使得广大农民形成了稳定的顺从型政治心理。他们热爱沙皇，从不反对沙皇，对于自己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剥削和压迫中的责任毫无认识。这种“政治自觉”的缺失，从根本上决定了广大农民无法担当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领导者。而城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直到 19 世纪 70、80 年代才伴随着迟到的工业现代化而出现，年轻的政治力量尚不足以独立地诉诸本阶级的政治要求。长期封建专制统治形成的稳定的顺从型政治文化和有能力组织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抗争的社会阶层的缺失，促使激进的知识分子以“为民请命”和“自我牺牲”的态度试图代替人民与专制制度斗争。这是俄国知识分子走政治恐怖主义路线的社会驱使力量，同时也是近代俄

国革命在斗争主体的选择上遭遇的困境。

再次，激进的俄国知识分子没有认清当时的俄国国情，过低地估计了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根基，过高地估计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素养和革命力量，以及政治恐怖主义的历史功效。社会革命党的革命理论家将沙皇专制政府的重要政治人物、皇族后裔、政府的奸细、以及所有专制政府的同谋者、帮凶统统列入政治恐怖打击的对象范围之内，幻想只要惩治和铲除沙皇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就能引起政府的组织混乱，消灭专制制度。但是，专制主义在俄国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推翻根深蒂固的沙皇专制制度并不是只需对其统治者进行肉体上的消灭那么简单。人民对于自己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政治角色、决策过程等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社会各阶层对于自己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剥削和压迫中的责任亦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政治恐怖可以消灭沙皇专制政府反动代表人物的肉体，却无法根除落后的沙皇专制制度本身；可以暂时满足人们的复仇和宣泄愿望，却无法激发人们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自觉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民头脑中的非理性和宗教式的狂热退去之后，在沙皇专制政治文化的强力作用之下，人民自然又回到专制制度的既定轨道中来。

尽管传统的知识分子情结催生了近代俄国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美好的革命动机，但是由于他们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和政治思维出现的偏差，造成社会革命党在政治路线选择和执行上出现错误。正是这种错误的政治思维所导致的错误惯性断送了社会革命党的政治生命。但是，一种政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失败并未使革命停下脚步，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仍在曲折中不断前进。

【Abstract】 Intellectual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s leadership. They devoted to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with great enthusiasm, but due to their limitations in recognition and deviations in political thinking, they publicized political terrorism unilaterally and radically. It is just this kind of political thinking that ruined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

【Key Words】 Intellectuals, 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 Political Terrorism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социал-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пар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террор

（责任编辑 郭金月）

从政治整肃到行政规训：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

张建华**

【内容提要】十月革命既是伟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以及更为艰巨的“文化革命”。新经济政策既是苏维埃政权在经济领域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其在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变化。出于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苏维埃政权对部分反共反苏知识分子采取了政治整肃、司法镇压乃至驱逐出境的手段，这在当时曾在相当大的程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遗留下了历史隐患。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 知识分子 政治整肃 苏维埃政权

【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4-0035-(14)

1921年春，俄共（布）十大的召开标志着新经济政策（НЭП）的实施。随后，军事共产主义（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时期的许多限制被取消，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相对的“真空”和“自由”的状态，客观上为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为知识分子公共空间^①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便利了知识分子以文字或语言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和社会理想。为数甚众的反对“突然而至”的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专政的知识分子，更是利用这一特殊条件，利用手中控制的讲坛、沙龙、教堂、团体以及杂志等出版物，对苏维埃政权及其政策施以大规模的责难，从根本上危及到了苏维埃政权和新国家的安全。

* 本文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资助”（NCET）项目“苏联政治文化谱系研究”的阶段成果。

** 张建华，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世界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① 参见张建华：“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达”，《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1922年3月至8月是反苏知识分子活动最为激烈的时期，从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特别全权代表阿格拉诺夫（Я.Агранов）1922年7月1日提交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关于知识分子中间反苏维埃集团》（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группировках сред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报告可以略见一斑。

该报告在导言中强调：“新经济政策导致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团体力量的联合和共谋的危险性。反苏维埃知识分子广泛地利用了苏维埃创造的和平环境，以及惩罚机构活动削弱的机会，公开组织和积累自己的力量。自然形成的大量的私人社会团体（学术的、经济的和宗教的，等等），私人出版社，围绕这些团体构成了反苏维埃的因素，它们成为未来联合的反革命阵线的可怕的因素。反苏维埃知识分子他们的联合团体的力量得到加强。与反苏维埃知识分子斗争的主要场所是：高等学校、各种学会、出版物、各种机关代表会议、剧院、合作社、托拉斯、贸易机构，近期还有教会等。”^①

报告在“高校的反苏维埃知识分子活动”一节中写道，高校（主要是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反革命活动主要表现在争取学校自治和提高教授与大学生物质待遇方面。前者“实质上表现了反对共产党和以阶级原则对高校施加的政治目的”，“在最近时间里，高校中争取教授领导权的活动表现得极为猖獗”“高校的反革命因素成为培养大学生反共和反苏精神的有利基础”，高校的红色教授甚少，而“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的基层组织却在高校中建立并得以巩固”。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得到最新情报，即莫斯科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的“教授联合会”（объединенный совет профессоров）正在组织罢课并已经得到彼得格勒大学的响应。报告建议：“高校的状况要求采取一系列的断然措施制止和警告某些教授的反革命演说”。

报告在“各种协会中的反苏知识分子活动”中反映，在近期“科学协会”（научное общество）、“贸易工业协会”（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的活动中存在着隐藏着的反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因素。报告特别提到“馅饼协会”（Пирогов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以半官方的形式存在，在反苏活动中扮演着特殊作用。报告在“私人出版社的活动”中反映，“政权批准私人出版社和期刊，为反苏知识分子提供了强大的斗争武器，他们绝不放过在首都和外省大量出版并表达反苏观点，如《经济学家》杂志、《经济复兴》（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杂志、《文学之家编年》（Летопись дома литераторов）和馅饼协会杂志等。”民族社会主义者党（народные социалисты）成员梅里古诺夫（Мельгунов）、缅高金（Мякотин）和别什霍诺夫（Пешехонов）、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基泽维杰尔，以“大家族”（Задруга）

^①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175. Л. 8–12. Подлинник. Машинопись.

出版社纠集在一起。刚刚获得自由的“策略中心”(Тактическое центр)“民族中心”(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центр)、社会活动家联合会(Совет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деятелей)的成员,立宪民主党中央一些委员,联合在“岸”(Берег)出版社周围。“书籍”(Книга)出版社在孟什维克中央控制之下。报告认为,私人出版社和出版物起到了联合反苏力量的作用;其次,出版大量的反共产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和色情的出版物,扰乱了图书市场。报告在“各种机关代表会议中的反苏知识分子活动”一节中指出,这些代表会议变成了反共宣传的政治舞台,如“农业合作社代表大会”(съезд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被社会革命党用于召集该党的第20次代表会议。“全俄医生代表大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врачей)变成了所有反苏医生的集会。相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全俄农业局代表大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земотделов)之中。报告在“合作社、托拉斯和贸易机构里的反苏知识分子活动”中反映,这些机构中共产党员人数太少,使得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和民族社会主义者在这些机构中活动频繁,而且这些机构直接为反苏活动提供经济上的资助。报告在“宗教问题上的反苏知识分子活动”中反映,“黑色百人团知识分子”(черносот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利用东正教和一切形式疯狂反对无神论(атеизм)。^①

报告最后强调:“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发展过程,反苏的团体和组织在走向联合。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团体将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危险的力量。国家总的形势要求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措施预防可能的政治威胁。”^②

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条件和危急的环境之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以行政手段对反苏反共的知识分子采取了政治整肃措施,在当时,其政治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同样值得深入思考。

一、政治整肃与“清洁政策”

苏维埃政权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统治地位。

1919年创办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培养意识形态工作干部的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1920年建立了党史委员会。1921年建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西部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1923年建立了列宁研究院(1928年同党史委员会合并)。1924年将1918年创办的社会主义科学院更名为共产主义科学院,其肩负的任务就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迫切问题。20年代出版了大量

^①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175. Л. 8-12. Подлинник. Машинопись.

^② Там же.

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列宁全集也得到广泛出版。创办新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1922年1月至1944年6月出版）作为党的理论喉舌，其主要任务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宣传无神论。此外，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高校的社会学科教学体制也随之进行了改革。1921年颁布高校法，废除了高校的自治权。从这一年起，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被列为高校必修课。

在对意识形态进行整顿的同时，苏维埃政权开始研究查封刊登反苏维埃言论的刊物。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以1926年为例，全年共禁止发行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还停止了975部作品的出版发行。^①1927年以后，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出版物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出版物平均达23%。^②1922年夏天关闭了彼得格勒的杂志《思想》（Мысль）和《经济学家》（Экономист）。1921年4月取缔了“莫斯科科学家联盟”（Московский союз научных деятелей）。1922年取缔了“自由哲学协会”（Общество свобод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劳动知识分子代表联合会”（Обществ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трудовых интеллигентов）、“全俄教师协会”（Общество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х учителей）、彼得格勒的“科研机构 and 高等学校联合会”（Объединенный союз науч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и высш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和“莫斯科科学家联盟”（Московский союз научных деятелей）等。

针对各地大学频繁发生的教授和大学生为争取“学校自治”而兴起的“罢教”“罢课”事件，苏维埃政权立即推行了大学中的“清洁（чистка）政策”。

1921年4月，根据“大学生——共产主义者”组织的密报，在莫斯科大学取消了该校校长和历史学家留巴夫斯基（М.К.Любавский）、历史学家基泽维杰尔（А.А.Кизеветтер）、经济学家普罗科波维奇（С.Н.Прокопович）教授的课程。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工人系的同时，“为高等学校无产阶级化而斗争”的口号成为一个政治目标。在彼尔姆大学展开的对大学生的政治清理运动中，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子女被“清理”，如农学家的儿子扬切夫斯基（Янчевский），神父的儿子谢列布列尼科夫（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和斯捷潘诺夫（Степанов）。根克林（М.А.Генкель）回忆：“大学生执委局（студенческое исполбюро）主席瓦西里·基乌诺夫（Василий Тиунов）在清理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后来他在1951—1961年担任大学校长职务。他可能一生都认为‘从资产阶级手中清理大学’是他的功绩。在‘清理’时期，律师的女儿扎瓦雷金娜（Евгения Ардревна Заварыгина）得以幸免，这是因为基乌诺夫怜悯

① Жирков Г.В. История 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XIX—XX вв. М., 2001, С. 274.

② Блюм. А.В. 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эпоху тотального террора 1929—1953. СПб. 2000, С. 125.

她……被开除的大学生痛苦地经历这个不公正的结果。一些人试图自杀。斯捷潘诺夫精神失常了。大学生小组（12人）给克鲁斯卡娅（Н.К.Крупская）写信并且很快地得以恢复学业。在这些人有夏洛托娃（С.С.Колотова），后来她成为生物学副博士、彼尔姆国立大学自然科学学院的科学研究员”。^①1928年列宁格勒大学开除学生712人，其中有75人是因为自己的出身。^②

科学院是主要的知识分子聚集的场所。苏维埃政权认为有大量的科学家（包括院士）持反苏立场。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设的审查苏联科学院财政的专门委员会成员加尔布诺夫（Н.П.Горбунов）在出席1927年6月30日的联共（布）中央会议时，将科学院院士分成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包括“潜在敌视态度的院士”，如卡尔斯基（Е.Ф.Карский）、拉甫罗夫（М.Н.Лавров）、尼柯里斯基（М.Н.Никольский）。这一类型还包括“左翼的”变种，如维尔纳茨基（В.И.Вернадский），普拉托诺夫（С.Ф.Платонов），科斯德切夫（С.П.Костычев）；第二种类型是思想和政治“沼泽”（危险）类型，这些院士仍然在苏联国内工作，但是已经与苏维埃政权离心离德而不可信任，包括莫斯科的院士巴甫洛夫（И.П.Павлов）、皮萨列夫（И.Писарев）和拉扎列夫（Н.Р.Лазарев）；第三种类型是“或多或少尽职尽责的人”，其代表人物是马勒（Н.Я.Март）、卡尔皮斯基（А.П.Карпинский）、费尔斯曼（А.Е.Ферсман）和奥里杰别格（С.Ф.Ольденберг）院士，苏维埃政权应该在政治上对他们充分信任，他们可以自由地在苏联和国外工作。^③于是，苏维埃政权在苏联科学院系统经常进行“清洁”工作，清除“黑色百人团成员”（черносотенный）和其他“不干净”因素。苏维埃政权提拔身为党员的上层学者，努力使科学院的机构适应“科学共产主义”的需要。只是到了1929年，政权才顺利地将“自己的”院士，如政治家兼学者的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克日热诺夫斯基（Г.М.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哲学家梁赞诺夫（Д.Г.Рязанов）和哲学家德波林（А.М.Деборин）等人安排到科学院。整个20年代，苏联科学院被解除职务的学者达到全部编制的11%。^④

对于借出国演出或学术交流为名滞留国外不归并发表反苏言论的知识分子采取

① Ветлугина Е.В. Рабочие факультеты как путь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на материалах рабоче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Пер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19-1920-х гг. //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1, С.36.

② Шинкарук С.А. Отраж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и // 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 1921-1941 гг.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СПб., 1995, С.33.

③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8429, оп.3, д.1, л.33, л.34.

④ Levin A.E. Expedient Catastrophe,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1929 Crisis at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 *Slavic Review*, 1988, vol.47, n.2, p.276. 转引：Павлюченков С.А., и др. Россия эпохская. М., 2002, С.264.

了取消苏联国籍和政治荣誉的措施。

俄国著名歌唱家和导演夏里亚宾（Ф.И.Шаляпин）以积极态度迎接革命，十月革命后留在俄国继续从事歌剧事业，曾经成功地扮演了“鲍里斯·戈东诺夫”、“鲁斯兰”、“苏萨宁”等俄国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的形象，在1918年获得了俄罗斯联邦授予的“共和国人民演员”称号（звание народного артис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1921年他向教育人民委员部提出申请，准备应巴黎歌剧院的邀请到法国作巡回演出。1921年5月1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歌唱家出国的决议。“批准组织部决议并且允许夏里亚宾在契卡取得其回国保证的前提下出国。如果契卡不予批准，问题再审。”^①1921年5月31日，根据卢那察尔斯基的申请，政治局批准夏里亚宾出国。在法国演出期间，根据与美国音乐厅委员会代表尤罗科（С.Юрок）的合同，夏里亚宾于1921年8月去美国，并一直逗留到1922年3月。在国外期间，夏里亚宾曾向巴黎的俄国东正教神父捐款，以帮助饥饿的俄国侨民儿童。但这被苏联当局视为“资助与苏维埃政权斗争白卫军”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夏里亚宾作出了不回国的决定。1927年6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一次讨论了夏里亚宾滞留不归和“反苏活动”问题，会上工会领导人托姆斯基和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副委员雅科夫列夫（В.Н.Яковлев）作了有关报告。同年8月22日，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剥夺夏里亚宾“共和国人民演员”称号的决议。

枪毙作为法律惩戒的极端方式，也在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中予以采用并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20年底，列宁写信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克列斯金斯基（Н.Н.Крестинский），指示：“秘密准备恐怖行动：迅速和刻不容缓地”。1922年3月22日，列宁提交给俄共（布）11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加强镇压。4月12日，苏维埃政府授予人民司法委员会（Наркомюст）行动时开枪射击的决定权。^②工会领导人托姆斯基（М.П.Томский）在同一时期也表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三个或者四个政党共存，但只有在一种条件里才能可能，即一个政党掌握政权，其他政党留在监狱里。”^③官方报纸宣布：“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来自头号资产阶级界的侨民、以前积极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有仁慈心。他们现在正藏身于教会机构之中，发动居民中最无知和道德败坏的分子与自己国外的白卫军同党结盟反对工农政权。”^④

①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61.Л.2.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Андрей Артизов и Олег Наумов.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ВЧК-ОГР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гг.М.,1999, С.17.

② Лагышев А.Г.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й Ленин. М.1996, С.27.

③ Первая 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област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КП(б).15-19.ноябрь.1927.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1927, С.28.

④ Красиков П.А.Седан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Известие. 1922.13 авг.

许多城市进行了司法审判。仅在莫斯科就审判了 54 人，在彼得格勒审判了 287 人。但是苏维埃政权还不敢大规模地推行死刑，因为国内存在着不同意见。最终枪毙 9 人，其中包括彼得格勒大学著名的刑法学教授诺维茨基(Ю.П.Новицкий)。^①1922 年春天，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诺夫哥罗德、图拉、雷宾斯克、舒依(Шуй)、老鲁斯(старой Русс)等地对教会知识分子发起大规模的镇压运动，2700 多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没收的价值 25 亿金卢布中只有 100 万用于因饥饿购买食品，其余全部用于世界革命。^②

社会革命党曾经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个“同路人”。1922 年 2 月 28 日公布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将社会革命党人提交给由中央委员会成员和党的积极分子组成的高等革命法庭审判的决议。1922 年 6 月 8 日至 8 月 7 日，在莫斯科进行了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在 34 名被提起诉讼者中有 12 人被处以极刑。侨居意大利的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听到这个消息后，于 1922 年 7 月 1 日给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李可夫(А.И.Рыков)写信：“如果对社会革命党的审讯过程是以死刑结束，那这将是事先经过深思熟虑谋划的死刑，是卑鄙的死刑(гнусное убийство)。我请求您把我的意见转告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我的观点不会令您惊诧，或者您知道，在革命的所有时间里，我上千次警告苏维埃政权避免犯在我们这个文盲的和野蛮的国家里消灭知识分子的罪行和丧失理智。现在我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处死的话，这个罪行必将引发来自欧洲社会主义力量对俄国的道德讨伐。”^③

1922 年 7 月 20 日根据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的建议，政治局通过下列决议：“1、责成社会革命党案件三人小组审查未发表的文章，高尔基和阿纳托里·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请求对于苏维埃俄国来说将没有任何意义。2、通知宾塔科夫(Г.Л.Пятаков)同志，政治局认为 8 月 1 日结束审讯过程完全是必要的。”^④1922 年 8 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上发表了嘲笑高尔基革命性的讲话。^⑤

鉴于大学生中存在着较明显的反苏情绪，1922 年 6 月 8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

① “Дело” митрополита Вениамина(Петроград, 1922г) М.,1991. Рокитянский Я.Г. Судебная расправа 1922 года: академик Рязанов против карательный практик большевиков // Вестн.РАН.1992.№4.С.103-113.

②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1917-1941.Документы и фотоматериалы.М.,1996.

③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1.С.243.

④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304.Л.4.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Андрей Артизов и Олег Наумов.Власть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ВЧК-ОГР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 1917-1953 гг.М.,1999, С.736.

⑤ Галушкин А.Ю. Еще раз о письме Горького в газету «Накануне».Горький и его эпох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материалы.Вып.2.М.,1989, С.256-261.

局听取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乌什利赫特“关于知识分子中反苏团体”的报告，并决定建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对策，过滤大学生，限制大学生中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面孔，考察大学生政治上的可靠性，取消不服从党的领导的大学生组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从此获得了大规模逮捕和驱逐知识分子的权力，以及对大学生进行政治甄别的权力。所有协会和联盟要重新向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ГПУ）登记，格伯乌监督各种代表会议，审查出版物。1922年6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ЦИК）通过决议，所有大学生组织必须到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Д）登记。监督事务掌握在捷尔仁斯基手中，他的副手仔细准备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乌克兰的要驱逐的知识分子的名单，最终送由乌什利赫特、加米涅夫（Л.Б.Каменев）、库尔斯基、马采夫（В.И.Манцев）、列什托夫（А.Л.Решетов）组成的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确认。这其中除了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反对者和大学中罢教罢课的积极参与者外，还有一些不明确表明自己政治和哲学观点的教授。

阿格拉诺夫（Я.С.Агранов）、阿列克谢耶夫（Н.Н.Алексеев）、雅戈达（Г.Г.Ягода）在1926年7月3日提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明仁斯基（В.Р. Минженский）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向》的报告中，称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反动力量，因此要经常采取措施，“不允许专家们有任何的联合，变成不受控制的力量”。^①在20年代，不止一次地逮捕从事教会史和教会法研究的通讯院士别涅什维奇（В.Н.Бенешевич）和哈拉姆波维奇（К.В.Харлампович），1927年逮捕语言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通讯院士阿布拉莫维奇（Д.И.Абрамович），并将其流放到索洛夫卡（Соловка）。

二、“哲学船事件”与驱逐政策

到1922年，列宁对反苏知识分子实行惩戒措施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3月15日写给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Д.И.Курский）的信中提出将“枪毙”变成“驱逐国外”。^②第二天列宁作出新的指示：“公正提出原则性的、政治上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法律上的狭义的）、说清恐怖的实质和理由，其必要性和界限的章程”。^③

列宁考虑采取司法起诉和行政驱逐的手段解决规模越来越大、影响愈来愈严重的知识界的政治反对派活动。

1922年5月19日，列宁致信契卡主席捷尔仁斯基（Ф.Э.Дзерженский）：“谈谈

①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С. 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периода НЭПа в обзорах ГПУ—ОГПУ//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ереломе.С.144.

② Высылка за границу. Ленин В.И.Полн.собр.соч.Т.45.С.189.

③ Там же. С.190.

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这件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不准备好我们会干出蠢事。请讨论一下准备措施，召集马采夫和其他一些人在莫斯科开个会。责成政治局委员每周抽两三个小时审阅一些报刊和书籍，并检查执行情况，要求提出书面意见，要求把所有非共产主义出版物毫不拖延地寄到莫斯科来。还要征求一下一些党员作家（斯切克洛夫、奥里明斯基、斯克沃尔佐夫、布哈林等）的意见。系统地搜集一下教授和作家们的政治经历、工作和写作活动的情况。所有这些工作要委托给国家政治保卫局中一个精明的、有学问的、办事认真的人去完成。关于彼得格勒的两个刊物，我的意见如下：《新俄罗斯》（Новая Россия）（第二期），该杂志已被彼得格勒的同志们查封。查封是否过早？应当把刊物分送给政治局委员并仔细加以讨论。这个刊物的主编列什涅夫是个什么人？是《日报》（День）社的吗？能否搜集一下他的情况？显然，不是该杂志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应驱逐出境。但是，俄罗斯技术协会第 11 部在彼得格勒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看，它是白卫分子公开的中心。第三期（仅仅第三期!!! 要注意这一点）封面上刊登了工作人员的名单。我认为，他们几乎全部都是最应该被驱逐出境的。他们全是赤裸裸的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是协约国的一群仆从和间谍，一群毒害青年学生的教唆犯。这事应当这样处理：把这些‘军事间谍’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封信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然后退还给您和我，并请把他们的意见和您考虑的结果告诉我。”“在我看来，《经济学家》是明显的白卫者据点。在第三期封面上刊登出的所有的编辑人员和作者都是驱逐出境最合格的候选人。”^① 受索罗金案件牵累，有 53 人被列入驱逐名单。1922 年 9 月 26 日苏俄国家政策保卫局（ГПУ）将索罗金和他的妻子巴拉登斯卡娅（Е.П. Баратынская）驱逐出境。1922 年夏天关闭了彼得格勒的杂志《思想》（Мысль）和《经济学家》。

1922 年 7 月 16 日，列宁再次给时任俄共（布）中央首任总书记的斯大林写信：“关于从俄国驱逐孟什维克派、立宪民主党人和人民社会主义者，我想提出几个问题，因为这次行动是从我休假前开始的，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已经决定彻底清除所有社会革命党人吗？别什霍诺夫、缅高金、戈尔菲里达、彼德里舍夫等人怎么办？按我的想法，全部都赶走。因为所有的社会革命党都是祸害，或者是陷阱。至于说到巴特列索夫、伊兹高耶夫和所有《经济学家》的同伙（奥杰列夫和其他人），孟什维克派，还有罗扎诺夫（狡猾的医生），维格多奇科（米古罗或者这类人），柳巴·尼古拉耶夫娜·拉德琴和她年轻的女儿（据说是布尔什维克恶毒的敌人）；罗什科夫（应

^① РГАСПИ. Ф. 2. Оп. 1. Д. 23211. Л. 2-2 об.

该把他赶走)；弗兰科(《方法论》作者)等等，应当列入名单，并且应当无情地把他们赶出境外，离俄国远远的地方。”^①

1922年8月的俄共(布)12次会议上通过了列宁的建议。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ЦИК)通过《关于行政驱逐》法令。据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有权不经审判把参与反革命的人驱逐出境或流放到国内指定的地区。契卡副主席乌什里赫特1922年8月2日提交给斯大林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准备驱逐的各地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名单共有110人，其中莫斯科大学教授2名，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Московский высший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училищ)4名，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农业经济学院(Петровско-Разумовская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академия)教授2名，交通工程师学院(Институт инженеров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教授3名，其他高校教授10名，“岸”出版社反苏人士2名，“813案件”(阿布里科索夫小组案)(группа Абрикосова)成员4名，反苏农学家和合作社工作者12名，反苏医生3名，莫斯科反苏工程师6名，反苏作家12名，其中哲学家弗兰科(С.Л.Франк)、历史学家基泽维杰尔(А.А.Кизеветтер)、哲学家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榜上有名。还列出了彼得格勒反苏知识分子名单共50名，来自彼得格勒大学、彼得格勒教授联合会(объединенный совет профессоров г. Петрограда)、彼得格勒医生群体(врачи. Петрограда)、彼得格勒文学家群体(питерские литераторы Петрограда)和被卷入“塔甘采夫案件”(Дело В.Н.Таганцева)的人员^②，其中包括社会学家索罗金(П.А.Сорокин)、出版家科冈(А.С.Каган)、作家扎米亚京(Е.И.Замятин)、哲学家布尔加科夫(С.Н.Булгаков)、哲学家和彼得格勒大学校长卡尔萨文(Карсавин)、哲学家洛斯基(Лосский)等著名学者。^③

1922年8月22日，列宁签署命令，将“从事反苏和反共活动”的知识分子161人，其中包括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弗兰科、洛斯基、维什斯拉夫采夫，莫斯科大学校长、动物学家诺维科夫，彼得堡大学校长、哲学家卡尔萨文，历史学家基泽维杰尔、弗罗洛夫斯基、缅高金、波戈列波夫，社会学家索罗金，经济学家布鲁茨库斯、罗德仁斯基、普罗科波维奇，以及以莫斯科大学数学系主任斯特拉托诺夫教授为首的数学家小组等著名学者逮捕后集中在“普鲁士号”

① РГАСПИ. Ф. 2. Оп. 2. Д. 1338. Л. 1 Автограф.

② 1921年契卡破获以塔甘采夫(В.Н.Таганцев)为首的彼得格勒军事组织，历史证明这个组织是契卡捏造的，目的在于打击知识分子反苏活动。参见：Хроника террора: обзор наиболее крупных групповых дел, упоминаемых в тексте // Просим освободить из тюремного заключения. Письма в защиту репрессированных. М., 1998, С. 161–165.

③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175. Л. 35–44. Препроводительная – подлинник, приложения – копии. Машинопись.

(Пруссия)和“哈根市长号”(Бургомистр Хаген)客船上,驱逐出境。因上述知识界人士中有相当多的哲学家和拥有哲学教育背景的学者,因此该事件也被称为“哲学船事件”(философский пароход)。^①

“哈根市长号”和“普鲁士号”轮船将被驱逐的知识分子运送到克里木和奥德萨,其他人通过火车被押送到这里集结,然而从塞瓦斯托波尔驱逐到君士坦丁堡。无法准确统计被驱逐的人数,大约在200人左右,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为300人,这里不包括1923年被驱逐的62个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②

1922年8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表示:“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工人阶级不允许某些人,甚至最好的专家,骑在自己的脖子上。”^③8月31日的《真理报》(Правда)发表题为《第一次警告》(первое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的文章,认为在高等学校、出版界、哲学界、文艺界存在着反苏维埃活动的“据点”。同时宣布将“思想上的弗兰格尔分子和高尔察克分子”从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城市驱逐到北部省份。当局将这些人强制押上列车,将其驱逐出境,史称“哲学列车事件”(философские эшелоны)。这篇文章最后宣布,这是“苏维埃政权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警告。”^④人民委员会通过法令,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属下设立图书出版管理总局,由该局统一对私营的出版物进行监督,实行书报检查,查封了《思想》、《经济学家》等杂志。解散了一些从事反苏维埃活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学术团体。

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宾塔科夫(Г.Л.Пятаков)回答了社会学家索罗金关于为什么要驱逐这些知识分子的提问。他说,在俄国正在进行着两个进程,其一是“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其二是“适应这个苏维埃政权”。“我们的任务是延缓第一个进程的发展速度,而您和其他被我们所驱逐的人却想加快这个进程。”^⑤

9月4日,捷尔仁斯基去哥尔克村向列宁汇报,在得到列宁首肯后,第二天捷尔仁斯基指示乌什利赫特“继续驱逐反苏知识分子”^⑥。

此次大规模驱逐行动引反了国内外的巨大的反响。首先是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乘“普鲁士”号被驱逐的哲学家伊兹高耶夫(А.С.Изгоев)在1922年11月16日说:“所有有知识的人,要么在监狱,要么在西伯利亚,要么在国外,而留在俄国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不言而喻,没有文化的庄稼汉们,为的是他们俯首

① Главацкий М.Е.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пароход: 1922-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этюды.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2002, С.1.

② Геллер М.С. Первое 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е—удар хлыстом(К истории высылки из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еятелей культуры в 1922г//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0..№9.С.60.

③ Латышев А.Г. Указ.соч. С.202.

④ Правда.19.август.1922.

⑤ Сорокин П.А. Дальняя дорога.М.,1991,С.144.

⑥ Латышев А.Г. Указ.соч. С.216-217.

听命。”“没有人知道，谁的结局更坏，不论是被驱逐的人，还是留下来的人。”^①。在此压力下，随后有几十万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逃离俄国。随后，在莫斯科、彼得格勒、乌克兰等地采取了驱逐行动。1922 年被驱逐知识分子的总数无据可查，根据这一年公布的有关资料，从 8 月到 12 月，有 300-400 名俄国科学和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被分批驱逐出境。^②

三、几点思考

如果从20世纪初以来俄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十月革命是该国19世纪以来一系列政治变革的继续，并且将其推向了最高潮。十月革命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治巨变，它将俄国旧有的政权体系、法律制度、生活方式、社会等级、经济关系、文化结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基本打碎，因而给各阶层的人们心灵和肉体上带来的冲击都是巨大的。由于无法认同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苏维埃新政权，从新政权建立之日起，俄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就试图以各种方式（军事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反抗苏维埃政权或试图改变它的发展方向。

因此，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在新政权和新国家建立之初，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于反政权者采取政治整肃乃至政治镇压的手段，不能不说是必要的，并且在当时效果也是明显的，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

值得一提的是，苏维埃政权对于主动转向革命和亲近政权的知识分子给予大量的组织上、生活上和学术上的关怀。列宁认为给专家较高的工资“不仅值得，而且是应当的，在理论上也是必要的”。^③1919年12月23日通过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改善科学家状况》的命令。按照这个命令的规定，供给科学家的口粮增加到500份，专家可以免去与自己业务无关的各种义务（如义务劳动和服兵役等）。按照人民委员会的命令，从1921年11月10日起，成立了中央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1921-1922年凡是有大学的城市几乎都成立了地方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④在首任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的领导下，成立了改善教师生活条件委员会。当得知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И. П. Павлов）生活窘迫，研究工作难以继续时，列

① Изгоев А.С. Пять лет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Архив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22 т. М., 1991, С.5,10.

②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卷，第188页。

③ 《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卷，第768页。

④ 别利亚耶夫等著：《苏联科学机构网的形成和发展》，陈仲实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1年，第43页。

宁亲自写信给人民委员会说，“这件事很丢人。”^①1921年1月25日，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责成工人供应委员会发给巴甫洛夫院士和他的妻子特殊的口粮，其数量按热量计算，应当等于两份院士的口粮，责成彼得格勒苏维埃保证巴甫洛夫教授及其妻子的住宅归他们终身使用，并且为该住宅以及巴甫洛夫院士的实验室安装最好的设备。

因此当代俄罗斯学者巴赞诺夫(А.М.Базанков)评价道：“那些在创作领域拥有人民承认和尊敬，拥有物质保障、全俄知名度，拥有与首都杂志和出版社、协会及创作团体联系的人具有更稳定的创作和生活状况。这些人宁愿工作‘在桌子旁’，而不考虑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地位以及艺术风格。不服务于具体的因素，而创造、保存和增加俄罗斯文化的精神价值被他们看成是自己基本的目的。”^②

然而从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来看，从这一政策的历史影响角度来看，苏维埃政权在处理与具有独立个性和特殊认识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关系方面，在区分乃至分化看似铁板一块的知识分子群体时，出现了明显的简单化和缺乏耐心的失误。

就当时的负面影响而言，苏维埃政权的极端措施的作用是双重的，既保卫了国家安全，消除了潜在的威胁，也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严重恐慌。巴甫洛夫回忆道：“我遇到了我的一位同事——教授，我向他表达了在这件事上的愤怒。应该补充一句，他是一个拥有非常正派人的名誉的人。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你想干什么？难道你不知道，现在任何的反对意见就等于自杀吗？’”^③

此外，苏维埃政权的这一举动在外交和道义方面变得极为被动，遭到了国际社会的非议。托洛茨基在1922年8月30日接受美国记者路易斯·勃兰特(Louis Brandt)采访时不得不将这一行动解释为，“由于新的军事形势……我们将不得不依据战争法则枪毙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现在和平时期预先把他们赶走。并且我希望，你不拒绝承认我们的行动的人道主义(гуманизм акции)，并且在社会舆论面前维护它。”^④

就更长远的历史影响而言，十月革命后，大量的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随着200多万俄国人移居国外，它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俄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后，第一次发生的如此大规模的国家分裂和民族分裂。美国著名俄国史专家派普斯认为：

① 《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0卷，第262页。

② Базанков А.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провинции : традиции и новаторство.// Провинция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фактор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динамики. 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 I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дратьев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 Москва-Кострома, 1998

③ ПФА.РАН.Ф.2.Оп.1-1928.Д.95.Л.37.об-38

④ Огонек.М.,1990.№.24.

“20 年代初俄国侨民的规模给人的感觉是庞大的，但是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它的质量。在俄国侨民中有为数甚多的著名作家、学者、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为了证明俄国侨民的普遍水平，开列出一系列流亡国外的著名文学和艺术活动家的名字绰绰有余。”^①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流亡国外，无论是对于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还是对于苏联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一大无法挽回的损失。

【Abstract】 October Revolution is not only a great political revolution, but also a profound “ideological revolution” and even a more difficult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economic policy shows both major adjustments by the Soviet regime in the economic sphere and tremendous changes in its cultural policy and ideology. Considering its national security, the Soviet regime has adopted means including political purge, judicial repression and even expulsion against some anti-communist and anti-Soviet Union intellectuals, which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to a great extent, but left behind problems as well.

【Key Words】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tellectual, Political Purge, Soviet Regime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чистка, советский режим

（责任编辑 温刚）

^① Пайпс Р.Струве:правый либерал.1905-1944. Москва,2001,С.408.

一劳永逸净化俄罗斯

——1922年俄共（布）驱逐知识分子运动

刘杉杉*

【内容提要】 1922年，俄共（布）经过精心准备，发起了一场驱逐旧知识分子的运动。这场运动是布尔什维克党镇压反对派行动的必然延续，是苏维埃意识形态建设的组成部分，对布尔什维克党与知识分子正常关系的建立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驱逐运动以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为主要打击对象，70余名俄罗斯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优秀代表被迫离开祖国，而俄共（布）期望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并没有出现。政治上的不信任和长期的意识形态钳制，制造了苏联特有的“夜间人”现象。

【关键词】 驱逐知识分子运动 俄共（布）

【中图分类号】 K512.53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09)04-0049-(13)

1922年夏秋之际，俄共（布）发起了一场驱逐国内知识分子运动，由于被驱逐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其中绝大多数人乘坐从德国租来的轮船离开俄罗斯，俄罗斯学术界称其为“哲学船事件”^①。驱逐行动的直接原因是俄共（布）对俄罗斯旧知识分子^②的不信任。这是俄共（布）夺取政权后为创建苏维埃意识形态采取的系列行动之一，对当时和日后的苏联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刘杉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70余名俄罗斯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杰出代表，例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索罗金、罗斯基等著名学者都在被驱逐人员之列，因此这次驱逐事件也被称作哲学船事件。

② 旧知识分子是相对于苏联时期培养的知识分子而言，特指沙俄时期的知识分子。



十月革命之初，俄共（布）虽然夺取了政权，但势单力薄，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并没有得到社会各阶层的一致认可。解散立宪会议，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使本已对十月革命没有好感的知识分子更加排斥布尔什维克党，工人和士兵在经历了革命高潮后对没有改善的物质生活条件感到失望，而广大农民还不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分子也不甘于沦为历史的配角，竭力扩大各自的影响。正如当时人们所回忆的，“1917年二月革命到1918年8月间，是革命的蜜月期，人们可以享受最广泛最充分的自由……时刻准备着为保卫胜利果实作出牺牲……”。^①残酷的内战极大地破坏了人民生活，布尔什维克党缺乏执政经验和执政技巧，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雅罗斯拉夫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起义、坦波夫农民起义。为了稳固执政基础，俄共（布）不得不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随着内战的结束，社会空气趋于缓和，象征着白银时代文化繁荣的各种社会思潮重新活跃起来，各种非政府组织、团体和私人出版物不断涌现。

摆脱内战泥沼的俄共（布）为巩固胜利果实，着手社会主义建设，力图以苏维埃意识形态取代国内所有的意识形态。党的领导层认为，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允许经济领域出现市场关系和私人所有制，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活，从而引发资产阶级复辟的妄想，这是对社会主义体制最直接的威胁。因此，在暂时放宽经济政策的同时，必须提高政治“警惕性”，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非布尔什维克思潮。在与旧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得出结论，“拥有足够多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才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②旧知识分子是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等一切非布尔什维克思潮孕育的温床，必须予以铲除。

俄共（布）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以阶级立场为前提的。早在1905年，列宁就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中提出，“一些创作人员竭力‘超越’或‘不介入’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实现的……生活在社会中却要脱离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③ 1922

①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ессора М. Е. Главацкого. В жёрновах революц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между белыми и красными в п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годы-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М., 2008, С.54-56.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ктивиста троцкистской студенче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в. Павлова»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вузах (не ранее 1919 г.)

② Там же.

③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И Ленина., т. 41, С. 104.

年8月,《真理报》社论“第一次警告”明确阐释了俄共(布)的知识分子政策。“……驱逐猖獗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苏维埃政权对这一阶层的第一次警告。苏维埃政权将一如既往地高度评价并全力支持那些衷心地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旧知识分子代表。但苏维埃政权也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打击任何利用苏维埃政权提供的工作机会,从事公开的和秘密的反工农政权、复辟资产阶级地主体制的阴谋”。^①

以阶级属性来划分知识分子的原则招致高尔基的强烈不满。他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知识分子)留下来不是为阴谋,而是真诚地希望苏维埃体制给予他们宽广的工作空间。他们正在工作,凭良心工作,真的!……梅奇尼科夫(Мечников)、巴甫洛夫(Павлов)、费奥多罗夫(Фёдоров)是世界上最有天赋的学者,是世界的智库……俄罗斯太缺乏智者了,我们太缺乏才华横溢的人了,太缺乏了!——倒是骗子、坏蛋和冒险家比比皆是。这场革命是我们的革命——要持续几十年,但保证革命合理、充满活力力量在哪儿?真正的工人阶级正在消亡——依靠农民吗?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您想想,他们会吗?我是不会相信庄稼汉的,他们是工人和文化不可调和的敌人……请不要把政客化的知识分子与具有学术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混为一谈。”^②高尔基的意见对俄共(布)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在布尔什维克党看来,旧知识分子要想为祖国俄罗斯效力,就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要么与工人阶级结合,完全接受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要么离开苏维埃俄国,去为资本家效劳。旧知识分子想以旁观者的身份保持人身和独立创作的自由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中间道路可选。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授意下,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哥尔布诺夫(Н. П. Горбунов)给教育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发去密函,询问部分学者的学术影响和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虽然卢纳察尔斯基在回函中对学者们作出了肯定的评价,^③但抛弃旧知识分子的工作已经箭在弦上了。

二

在建设苏维埃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俄共(布)从组织建设、立法管理、宣传引导等方面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消除异己、钳制思想的体系。1922年被驱逐的

^①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А. Н. Артизов и т.д.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Материк». Москва, 2008, С.321. Передовая статья «Правда» «Первое 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е».

^② В жёрновах революц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между белыми и красными в п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годы. С.67-70. Письмо А. М. Горького В. И. Ленину (не ранее 16- не позднее 19 сентября 1919 г.).

^③ Там же. С.89-93. Письмо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ого Н. П. Горбунову об учёных (от 9 марта 1921 г.).

旧知识分子成为这个体系的第一批牺牲者。

建立书刊检查机关，加强思想控制。俄共（布）一方面在文化出版领域大张旗鼓地宣传、建设苏维埃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政治监查手段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加强思想控制。1918年2月10日发布的《关于革命出版法庭的决议》规定，“革命出版法庭可以作出……剥夺自由，驱逐出首都、某些地区或俄罗斯共和国国境，剥夺犯罪者一切或某些政治权利等处罚”。^①1922年6月6日，人民委员会决定组建文化与出版事务总局，“以便将全俄境内所有从事出版政治监查的机构统一管理”，由其负责对“所有出版事务，文艺作品、期刊和不定期出版物、宣传册等的发行与传播进行预审”，颁发出版许可，编制禁书目录，制订“与印刷、图书馆和图书贸易相关的政策”。^②书刊检查制度就此确立。12月，全俄非常委员会又在秘密行动局下增设了政治监查处，从事邮政通讯监查工作。除根据秘密名册对通信进行暗中检查和抽查外，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还要对印刷厂、书店进行监控，查看出入境的出版物、印刷和电影制品，监督剧院、电影院的演出。到1922年秋，全俄已有120个城市的邮政机关实施了政治监查制度。与文化生活相关的一切活动都处在俄共（布）的掌控之中。

建立情报网络，臆造“人民敌人”。随着社会矛盾的缓和，重组后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行动相对受到限制，“这就给敌人创造了方便条件。因此，我们的党员在本职工作中全力协助国家政治保卫局是极为必要的。他们应当在情报和信息工作方面提供帮助……为此，在所有国有、全民、集体、私营机构和企业，以及大学和一切有共产党员的单位里组建协助处（Бюро содействия）。协助处由3人组成。成员由所在单位负责人与国家政治保卫局协商任命。协助处成员必须是共产党员，且党龄不得少于3年。协助处负责系统地搜集各类反苏信息，了解本单位员工的政治倾向和政治面貌，对反苏政党成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进行审核，逐一建立专门的秘密卷宗。协助处每月不少于两次汇报本单位的政治动态”。^③协作处的材料完全保密，由保密处第8科集中处理。

驱逐取代枪决，以法制取代红色恐怖。内战结束后，国家建设转上和平轨道。特别是世界革命的希望破灭后，苏俄政府开始寻求与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为了争

① 《人民委员会关于革命出版法庭的决议》（1918年2月10日），见赵仲元等编：《列宁与全俄肃反委员会（1917-1919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49-50页。

②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 С.129-131. Положение о Главн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по делам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Главлит).

③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С.93-96. Циркулярное письмо № 21 Секретно-операти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ПУ «Об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Бюро содействия органам ГПУ на местах».

取国际社会的认可，布尔什维克党放弃了内战时期的红色恐怖政策，以相对缓和的法令镇压反对派。1922年5月23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向斯大林提交报告，“为执行交予国家保卫局的新任务，请求授予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从事反苏活动的人员处以国内行政流放或驱逐出境的权力。期限为2年”。^①8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关于行政流放的命令》。5月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九届大会第三次会议批准颁布了新的《刑法》。第70条规定，宣传、鼓动支援国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为，处以驱逐出境或剥夺自由不少于三年的刑罚；第71条规定，被判有期或无期驱逐出境人员，如擅自返回俄罗斯，处以极刑。这几项法规为驱逐旧知识分子奠定了法律基础。

开动宣传机器，营造社会舆论。1922年初，以反对苏维埃高等教育改革和争取学校自治为核心内容的教授罢工已持续了一年多，并呈蔓延之势。针对罢工要求，莫斯科地区的46名共产党员教授、教师和科技人员召开会议，发表公开信提出招生权归苏维埃工会机构独有……保证职业教育总局对高校活动的监督权和学校理事会中苏维埃少数派的权力等要求。^②3月12日列宁撰写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发表。文中明确表示：“……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去了”。^③驱逐旧知识分子的构想初见端倪。6月2日，《真理报》以“专政，你的鞭子在哪里？”的文章吹响了向旧知识分子开战的号角。托洛茨基表示，“是该发挥专政的威力，让艾罕瓦利德（Ю. Айхенвальд）之流见鬼去的时候了”。^④8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会议讨论了反苏政党和思潮活动日趋活跃的问题。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共（布）对旧知识分子作出“终审判决”，“对那些玩弄政治的，伪装的无党派人士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带头人绝不能放弃镇压，为了达到反革命目的，他们滥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根本利益。他们宣称，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科学、技术、教育、合作社的真正利益。这一切都是空话，是掩盖政治目的的外衣”。^⑤驱逐实施之前，面对西方记者，托洛茨基为布尔什维克党的行动进行辩护。《消息报》登载道，“被驱逐和我们将要驱逐的那些人并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

①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С.111. Записка И. С. Уншлихта И. В. Сталину о дополнениях в положение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управлении.

② В жёрновах революци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между белыми и красными в п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годы, С.119.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113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16 марта 1922 г.).

③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页。

④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С. 124. Статья Л. Д. Троцкого «Диктатура, где твой хлыст?».

⑤ Там же. С. 264. Резолюция XI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РКП (Б) по докладу Г. Е. Зиновьева.

但他们却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的潜在武器。一旦出现新的军事紧张局面……所有这些不可调和不肯改正的分子就会成为敌人的军事和政治间谍。而我们不得不根据战时法令对他们处以极刑。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和平时期我们预先将他们驱逐出境的原因”。^①托洛茨基的辩护之词变相印证了苏俄以驱逐代替枪决反对派取悦西方国家的动机。

外部条件就绪，但没有被驱逐人员的“罪行”，仍然无法实施行动。为此，国家政治保卫局向被关押的学者们分别询问了对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共和国、知识分子、路标转换派、社会革命党人案、教授罢工等问题的态度。学者们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特鲁别兹科伊(С. Е. Трубецкой)回答道，“我视苏联政权体制和以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当今世界全新的一种历史现象，对其抱有极大的兴趣。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先知，因此并不清楚这种社会发展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但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一直生存到现在让我确信，显然，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②别尔嘉耶夫(Н. А. Бердяев)回答道，“我无法认同阶级斗争的观点。我认为，无论是贵族的、农民的，还是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的、有局限性的和自私自利的。所有阶级和党派局限性应当服从于人和全人类的需要……我不支持苏维埃政权的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它破坏了教学与科研的自由，限制了哲学方面的自由辩论”。^③绝大多数被驱逐的学者持有同样的观点。俄共(布)视这些言论为旧知识分子不肯与苏维埃政权合作的体现。旧知识分子“仅仅不反对苏维埃政权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仅仅承认苏维埃政权是事实存在，是一种政治力量是不够的；党需要他们发自内心地接受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要承认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是为真理和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先进政党”。^④这对旧知识分子来说比登天还要难，因此便注定了旧知识分子被驱逐和流放的命运。

三

1922年初，以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的教授罢工为代表的罢工风潮愈演愈烈。高校问题成为2月政治局会议的议题之一。得知索罗金(П. А. Сорокин)在彼得格勒大学103周年校庆上的讲话内容后，列宁给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写信道：“……必须

①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 С.317. Известия. 1922. 30 августа.

② 转引自 Л. А. Коган. Выслать за границу безжалостно. ЦА ФСБ РФ. Д. Н-206. Т. 2. Л. 166-169. <http://www.ihst.ru/projects/sohist/papers/kog93vf.htm>.

③ 转引同上,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БРФ. Дело МН-206, Л. 28.

④ Степун Ф. А. Мысли о России. Очерк II // Соч. М., 2000. С.224. 转引自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 С. 14.

开除 20–40 名教授。他们在愚弄我们。我们要深思熟虑，精心准备，有力打击”。^① 5 月 19 日，列宁给捷尔任斯基发去密信，指示国家政治保卫局着手准备驱逐“反革命”作家和教授的工作。“要仔细地准备这项工作，没有准备，我们就会干些蠢事……责成政治局委员每周拿出 2–3 小时的时间来浏览图书和出版物，做出书面的评价，将所有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版物送到莫斯科，不得有误……系统地搜集教授、作家们的政治经历、教学和文学创作方面的信息……系统地将所有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协约国的仆从和间谍组织以及毒害青年学生的坏分子驱逐出境。”^②

5 月，列宁收到了卫生医疗人民委员谢马什科（Семашко Н. А.）的来信。信中称第二届全俄医生大会通过了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保持医生组织独立的决议，“这是我们生活中很致命很危险的倾向……这种思潮被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有效利用，不仅在医生群体中，在其他领域（农艺师、工程师、技术人员、律师等）也广有影响……建议与国家政治保卫局进行协调，对医生的‘领袖们’实施隔离”。列宁在信上批示道，“请斯大林同志阅。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将此信传捷尔任斯基和全体政治局委员阅。下达命令，‘请谢马什科协助捷尔任斯基（国家政治保卫局）制订相应措施报政治局审议’（两周内）”。^③政治局接受了列宁的提议，责成捷尔任斯基在一周内提交方案。

6 月 3 日，捷尔任斯基向政治局提交了由阿格拉诺夫（Я. Агранов）起草的《关于反苏知识分子集团的报告》。报告写道：“反苏知识分子选择高校、各类社团、出版物、各部门代表大会、剧院、合作社、托拉斯、商贸机构，近期还有宗教团体等作为反苏的主要舞台。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大学生与反苏教授团体的反革命活动主要有两个方向：争取高校‘自治’；争取改善教授和大学生物质生活条件。争取‘自治’的实质，是出于政治目的，抵制共产党和阶级原则在学校中的影响……围绕苏维埃政权的生存问题，高校中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暗战。最近，为争夺高校的控制权，那些教授们已经不择手段，（由于缺少红色教授）反共产主义和反苏的氛围为反革命分子教唆大学生创造了有利条件……至于要求改善物质条件，不过是高校的反苏分子用作政治对抗的武器而已。不久前的高校罢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国家政治保卫局得到消息，在‘教授联合委员会’的领导下，莫斯科的教授们正准备在社会革命党人案件开始审理的当天举行新的罢课行动。他们还计划鼓动高校的技术人员和大学生参与罢课。彼得格勒也在准备同样的行动。高校里的形势要求我们采

①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 С. 43. Из записки В. И. Ленина Л. Б. Каменеву и И. В. Сталину 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от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а статью «Миллюков тольк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② Там же. С. 109. Письмо В. И. Ленина Ф. Э. Дзержинскому.

③ Там же. С. 110, Письмо Н. А. Семашко В. И. Ленину и членам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取一系列果断的措施，制止和预防教授们的反革命活动”。^① 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下达了《关于反苏知识分子集团问题》的决定：1. 为保证高校秩序，组建由教育总工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代表组成的专项委员会制订有关的措施：A. 新学年开学前，对大学生群体进行过滤；B. 严格限制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入学；C. 审查没有得到工作单位和党组织推荐的和自费学习的大学生的政治可靠性。2. 委员会负责制订学生会和教授委员会章程和会议规定。责成国家出版局政治处与国家政治保卫局仔细审查所有出版机构。3. 未经内务人民委员部批准，不得召开任何代表大会和全俄规模的行业会议。地方代表大会和行业会议需由各省执委会预先征询各省国家政治保卫处的意见后，方可决定是否批准召开。4. 从6月10日起，所有社团和工会组织需重新注册，未经国家政治保卫局登记注册，不得组建新的社团和工会。5. 命令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不得批准新组行业工会。重点审查已有的行业工会，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参与下重审其章程。只有在国家政治保卫局认可的情况下，方可在全俄工会下组建新的行业工会。6. 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建特别会议，授予其实施行政流放或驱逐出境的权力。7. 由加米涅夫、库尔斯基和温什利赫特组成“驱逐和流放反苏知识分子委员会”，负责准备异己知识分子名单，关闭违背苏维埃政策的出版社和印刷机构。^② 实施流放的主要准备工作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负责。

7月16日，在哥尔克养病的列宁给斯大林发来口述信，“关于将孟什维克、民粹分子和立宪民主党分子等驱逐出俄罗斯的问题，是在我休假前启动的，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办完，就此我想提几个问题。是否已决定要‘果断地’消灭所有的民粹分子？别舍霍诺夫（А. В. Пешехонов）、米亚科津（Мякотин）、格林菲尔德（Горенфельд）、彼得利舍夫（Петрищев）等人，在我看来，都一律驱逐。他们比社会革命党更有害，因为他们更狡猾。还有巴特列索夫（А. И. Потресов）、伊斯加耶夫（Изгоев）和《经济学家》杂志的所有工作人员、孟什维克洛扎诺夫（Розанов，狡猾的敌人）、维格达尔奇克（Вигдарчик）、米古罗（Мигуло）或者其他此类人——柳鲍芙·尼古拉耶夫娜·拉德琴科（Любовь Николаевна Радченко）和她年轻的女儿（听说是布尔什维主义最恶毒的敌人），罗日科夫（Н. А. Рожков，应当驱逐，不能妥协），弗兰克（С. Л. Франк《方法论》的作者）。曼采夫、明辛格及其他同志监管的委员会负责提供名单，应当无情地将几百位这种人驱逐出境，一劳永逸地净化俄

①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 С.118.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ГПУ 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 «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группировках сред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1 июня 1922 г.

② Там же. С.131.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б) «об 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группировках сред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8 июня 1922 г.

罗斯……对彼得格勒的学究们和私人出版物也要加以注意……建议立即着手实施，逮捕他们……不用说理由——滚吧，先生们！”^①

7月20日，第一次审阅名单并没有让政治局满意。^②直到8月10日，最终名单才确定，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共计110人。^③16日夜，行动开始。名单所列人员大多数被捕。所有被驱逐人员都要签字确认不返回苏俄。如果擅自回国，将根据苏联刑法第71条，被处以极刑。

第一批被驱逐的旧知识分子分乘开往里加和柏林的火车离开俄罗斯。9月29日和11月16日，来自莫斯科、喀山和彼得格勒的学者及其家人约110余人分两批由彼得格勒乘从德国租来的轮船前往什切青。被驱逐的人员中有著名学者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特鲁别兹科伊、伊利因(П. А. Ильин)、奥萨尔金(М. А. Осоргин)、诺维科夫(М. М. Новиков)、巴卡尔(И. Ю. Бакал)、卡尔萨文(Л. П. Карсавин)、罗斯基(Н. О. Лоский)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押船到喀琅施塔得后离开。据斯杰布恩(Степун Ф. А.)回忆，被驱逐人员“获准携带冬、夏大衣各一件，外衣一件，各类内衣各两件，两件日间衬衫，两件晚装衬衫，两条长衬裤，两双长袜。除结婚纪念物外，金器和宝石等一律不准带出境，甚至脖子上带的十字架也要摘下来。除了上述允许带走的物品外，每人还可以带20美元”。^④

驱逐旧知识分子的行动在乌克兰也得到贯彻执行。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列了77人的驱逐名单。但当得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热情地迎接了乌克兰的教授们，并愿意为他们在布拉格大学，尤其是在为乌克兰移民开办的乌克兰大学中开设教研室”^⑤后，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致信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建议重审将乌克兰反苏知识分子驱逐出境的决定。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就这一问题征求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意见。1922年12月12日，温什利赫特写信给斯大林，“国家政治保卫局认为，将乌克兰反苏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分子驱逐出境，从政治上来讲是不稳妥的，因为这一行动有可能影响业已出现的境外乌克兰移民的分化，从而使乌克兰移民至今没有停止的暴动和土匪活动更加猖獗。国家政治保卫局不反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将反苏知识分子流放至国内偏远省份以取代驱逐出

①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С.162. Письмо В. И. Ленина И. В. Сталину об ускорении высылк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16 июля 1922 г.

② Там же.С.169.Поста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о ходе подготовки к высылк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③ Там же.С.276.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списка высылаемых из России интеллигенов.

④ Там же.С.13. Степун Ф. А. Бывшее и несбывшееся.СПб., 2000, С.621-622.

⑤ Там же.С.416.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 (У) о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сти высылки за границу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украин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境的建议”。^①1923年1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为避免被驱逐的乌克兰反苏知识分子加强境外乌克兰移民的民族主义运动力量，批准乌克兰共产党的建议，将乌克兰反苏知识分子驱逐出境改为国内流放。^②

据不完全统计，1922年的驱逐旧知识分子行动波及270余人，其中78人被驱逐出境（不含家属），23人命运不详（没有任何有关被驱逐或国内流放的信息），其余人等被国内流放。^③

驱逐前夕，一些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党内人士为部分被驱逐人员求情担保。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波格丹诺夫为库卡列夫斯基(И. И. Куколевский)求情写道：“库卡列夫斯基教授是目前俄罗斯境内少有的两三位液压发动机和液压技术设备领域的专家之一，在未来俄罗斯电气化和水力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具有重要价值”。^④针对求情，政治局授权捷尔任斯基对被驱逐人员名单作出更改，19人得以免遭驱逐。除库卡列夫斯基免遭驱逐外，奥泽洛夫(И. X. Озеров)因承担专项财经任务而暂不驱逐，工程师帕尔申(Н. Е. Паршин)由矿山工业管理总局担保，财政专家尤洛夫斯基(Л. Н. Юровский)由财政人民委员部担保，工程师萨哈罗夫(А. В. Сахаров)则“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秘密考虑予以释放”。^⑤

四

1922年苏维埃政权驱逐旧知识分子的行动是苏维埃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布尔什维克党镇压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等反对派的行动的必然延续。抓住历史机遇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由于立足未稳，在各界反对派和外国武装干涉力量面前处于明显的劣势。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使命感和执政经验的缺乏，使布尔什维克党在捍卫胜利果实、夺取全国政权的内战中，采取了最简单但可能是最有效的斗争方法，以红色恐怖应对白色恐怖。布尔什维克党

①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С.437. 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И. С. Уншлихта 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о замене высылки украин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за границу высылки в отдалённые районы РСФСР.

② Там же.С.467.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о высылк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отдалённые районы РСФСР.

③ 所列数据由作者根据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一书所列档案统计得出。

④ Там же.С.303, Ходатайство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президиума ВСНХ П. А. Богданова 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с просьбой отменить высылку за границу профессор И. И. Куколевского.

⑤ Там же.С.321, Выписка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1 заседания комиссии под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ством Ф. Э. Держенского «По пересмотру ходатайств об отмене высылки лиц, о которых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учреждениями делались заявления об остановлении на местах».

也公开承认，“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在内战中必须采取这么多的恐怖手段”。^① 驱逐旧知识分子是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的苏俄为实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战略作出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是在当时主客观情况下作出的无奈之举。

旧知识分子成为俄共（布）打击的对象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从拉吉舍夫开始，俄罗斯知识分子就被君主专制的国家机构所窒息，因而寻找社会生活的自由和真理”。^② 追求自由，反抗奴役是历代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奉行的行为准则，无论是贵族知识分子还是平民知识分子，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斗争中。革命与斗争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标志。然而，旧知识分子虽然有济世救民的强烈愿望，在行动上却是个矮子。当他们遇到了在革命方面比自己更激进、在斗争方面比自己更果决的布尔什维克党时，就成了保守派，不自觉地走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对立面。特别是路标转换派的出现，是否接受十月革命，是否接受苏维埃政权，成为旧知识分子的必答题。旧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可悲的。他们以民众代表自居，却又脱离主体是农民的人民大众，正如布哈林所说，“他们都是非常可爱的人，都是些心地善良的知识分子，甘愿为人民付出一切，只是不懂得什么是人民……”，^③ 得不到“无知无识的下层人民”的理解。因此，在苏维埃宣传机器的鼓动下，在驱逐行动实施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来自人民大众的声援。

驱逐虽然以旧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为行动的标准，但却有其实用主义的一面。在沙皇专制制度下，旧知识分子从事政治活动的可能微乎其微，只能借助文学、哲学和艺术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客观环境使他们成为社会和政治运动的领袖。他们的言行与苏维埃的意识形态不可调和，成为苏维埃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障碍。因此，代表着俄罗斯思想和精神的人文学者成为俄共（布）的重点打击对象。正如布哈林所讲的，“……我们允许的是我们制度框框内的研究自由……当一位卓有建树的教授说我们与世事无关，我们远离政治，请让我们自由讲授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是怎么也不行的……”。^④

而国家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急需的旧专家们还是得到了区别对待。1922年7月31日第一次编定的118人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地区被驱逐人员名单中，近半数是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学者，而工程师、工科和自然科学教授为12人，医生11名。乌克兰的77名被驱逐人员中，工程师和工科、自然科学教授为5人，医生和医学教授24

① C. L. 莫瓦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2卷，第566页

② H. A.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43页

③ H. И. 布哈林：《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命运》，黄登学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4年第3期，第32页

④ 同上

人。除 2 名医生被驱逐，3 名命运不详外，其余医生都改为国内流放，到偏远的灾荒省份，在那里救助奄奄一息的饥民，抗御流行病蔓延。^①

在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没有成长起来之前，列宁对旧专家格外看重。在内战时期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多次过问旧专家的生活。他曾谈道，“没有工程师，没有专家，我们会失败……来我们这里工作的旧专家，我们会比资产阶级对他们更好。今后他们会明白，他们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②他相信，“科技和工人代表的合作将消灭所有的贫困、疾病和落后。我们将实现这种合作。由科学、无产阶级和技术代表组成的联盟将战胜一切反动势力”，^③因此，在驱逐前的最后一刻，大部分旧专家得到了“赦免”，留下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接受改造。他们在苏联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 1929 年“一五”计划开始之前，苏维埃工业领域的行政技术人员中，旧专家的比例达到 62.6%。^④十月革命迫使俄罗斯知识分子出现分化，免遭驱逐的旧知识分子出于对祖国俄罗斯的爱，对俄罗斯复兴的渴望，与苏维埃意识形态相调和，投身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部分经历残酷的政治洗礼幸存下来的人，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功勋科学家、功勋医生等。在苏联世界强国地位确立的过程中，他们的个人价值得到了极大的实现。

在抛弃旧知识分子的同时，俄共（布）也加快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培养速度。除了依靠工农速成学校（Рабфак）对苏维埃和党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外，俄共（布）还对高校进行了清洗，制订了新的大学入学标准以提高大学生中无产阶级的成分。^⑤但是，布尔什维克党期望通过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并没有实现。驱逐行动对苏维埃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建立正常关系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捷尔任斯基不无忧虑地写道：“宁可在自由主义方面犯错一百次，也比放逐那些并没有积极反苏的知识分子要好——当 they 从流放地回来后，或许会成为反苏的积极分子，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指责将被敌人用来攻击我们”。^⑥1925 年 2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呈报斯大林的“全国知识界动态简报”印

① 所列数据由作者根据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一书所列档案统计得出。

② Волков В. А., В. И. Ленин и развитие химиче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СССР. М., 1975. С. 125. 转引自 Ю. П. Шарапов. Первая «оттепель» Нэповская Россия в 1921-1928 гг.: вопросы идеолог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2006, С. 169.

③ 转引同上书。

④ 转引同上书，第 186 页。

⑤ Россия XX века: Очистим Россию надолго...С. 154.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о правилах приёма студентов в высшие учебные заведения.

⑥ Там же.С. 519. Письмо Ф. Э. Дзержинский И. С. Уншлихту и В. Р. Менжинскому о недопустимости массовых высылок.

证了这一点：“……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对苏维埃政权抱敌对的态度，这种敌对态度已经几近与苏维埃政权决裂，……一些知识分子组织和团体表面忠诚，背地里却干着非法的勾当……由于反苏教授日益活跃，在高校中组织左翼教授团体的努力没有成功……清洗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高校的无产阶级化，但是，……高校里的氛围依旧是反苏的，常常还带有白卫军的性质……在农村，富农阶级常常通过经济和意识形态手段俘获农村知识分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有大量的艰苦工作要做……”。^①随着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提出，沙赫特案、工业党案、科学院案等带有党内斗争背景的政治案件，再次使知识分子处于政治迫害的漩涡之中。直到战后斯大林逝世，直接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迫害才有所减轻。政治上的不信任决定了知识分子在苏联政治中没有话语权，多年的意识形态控制限制了知识分子的创作自由，精神上的压抑和政治上的诉求终于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以“夜间人”形式存在于苏联社会生活之中的普通知识分子，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公开性”政策的鼓动下，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参与到“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中，成为苏维埃意识形态的掘墓人。

【Abstract】 In 1922,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launched a campaign to expel old intellectuals after careful preparation. This campaign is a natural extension of the Bolshevik Party to suppress the opposition, and a part of the Bolshevik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t has a tremendou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orm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Bolshevik Party and intellectuals. The campaign mainly aimed at expelli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mong whom more than 70 excellent representatives in Russian 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culture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ir motherland, and actually the proletarianization of intellectuals did not appear as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had expected. Political mistrust and long-term control of ideology led to a unique “night people” phenomenon in the Soviet Union.

【Key Words】 Campaign in Expelling Intellectuals,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высылка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й, РКП(б)

（责任编辑 温刚）

^①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Н. М. Перемышленникова и т. д.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Лубянка – 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 гг.). Т. 2. 1924 г.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цен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М., 2001, С. 391. Приложение № 17 доклад по интеллигентции 15 февраля 1925 г.

政治

从“自由民主”到“可控民主”： 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学解析与启示*

白千文**

【内容提要】从“自由民主”到“可控民主”俄罗斯的民主政治改革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在梳理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曲折历程的基础上，力图运用放宽了假定条件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解读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文章认为，关于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制度原因的诸多分析中，历史传统回归论是正确的，所以“可控民主”在俄罗斯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关键词】自由民主 可控民主 俄罗斯 政治体制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4-0062-(7)

一、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苏联解体后，自由主义一度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主流。基于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美妙梦想，俄罗斯开始于1992年初实行以总统设置、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多党政治和自由选举为基本原则的西方民主政治。然而，西方民主政治不但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繁荣和发展，反而使俄罗斯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动荡和权利纷争之中。其中，总统、议会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学者形象地将当时的俄罗斯政权称为“双重政权”。在“双重政权”局面下，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执行，于是爆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经济转型深化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研究”（项目批准号08AJL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 白千文，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发了1993年10月“炮打白宫”的流血事件。

通过“十月事件”，叶利钦摧毁了议会，镇压了反对派。叶利钦通过发布总统令，把立法机关更名为“国家杜马”，并宣布举行新杜马选举，目的是排挤议会中的反对派。为了进一步打击反对派，他还宣布“劳动俄罗斯”、“救国阵线”等20多个反对派政党为非法组织，禁止它们活动。在有力镇压反对派的基础上，叶利钦对制宪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草案作了修改，使新宪法草案充分体现“总统集权”的精神。1993年12月全民公决通过了该宪法。

新宪法虽然为“总统集权”营造了宪法空间，但叶利钦时期威权主义的治国模式并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寡头政治”局面。具体表现在：中央政府的实际行政能力低下，而且权力日益弱化；小党林立而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党，不少政党具有浓厚的“会党”、“朋党”的色彩^①；政权与财权之间的交换司空见惯、国家的决策职能基本上被寡头架空。

普京正是在俄罗斯政局动荡、地方分离主义蔓延、权利腐败严重、民众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开始进行深刻反思的情况下上任的。普京一上任就以强国、发展经济为己任，并将“可控民主”视为实现强国梦的重要手段。他说：“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②，为达到此目的“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③。

“可控民主”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混合体，它既含有民主的因素，又具有集权的特点，其实质是“社会赋予由全民选举产生的具有超凡能力的国家首脑以超出民主程序以外的最广泛的权力”^④。实际操作过程中，“可控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过程就是不断加强中央威权、强化总统权力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不断加强总统和中央政府对议会和地方政府的控制过程。在总统第一任期期间，普京着力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其具体措施是：（1）实行总统驻联邦区全权代表制度，确立中央对地方机构的监督；（2）规定地方长官不再兼任上院议员，从而削弱地方领导人在中央的决策权；（3）规定必要时中央有权解除地方长官的职务，有权解散地方议会；（4）改革预算制度，削减地方政府的财政基础。

与第一任期侧重控制地方政府不同，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在树立中央威权方面则是双管齐下。在控制地方政府方面，取消了“地方直选”制度。在叶利钦时期，地

① 例如“贫穷党”、“多数党”、“人民良心党”、“爱情党”、“性少数联盟”、“啤酒爱好者党”、“香蕉党”等党派不仅规模很小而且几乎都没有自己的执政纲领。

② 《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③ 《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④ 维·特列季雅科夫：“普京的选择就是俄罗斯的选择”，《俄罗斯报》，2004年9月16日。

方政府长官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这无形之中助长了地方分立势力。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中央集权，普京总统宣布废止“地方直选”制度。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的产生程序被修改为，首先由俄联邦总统提名，然后由地方议会确认，最后再由联邦总统任命。在控制议会方面，普京总统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取消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单席位选区制，改为全部按政党选举产生，减少民主反对派“入围”的可能性；第二，提高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门坎，把入围线从 5% 的得票率提高到 7%；第三，将政党注册资格从 1 万人增加到 5 万人。

取消“地方直选”和改变“杜马比例”的举措强化了以总统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舆论认为，这是普京“可控民主”政治体制形成的标志。伴随“可控民主”政治体制的逐步建立，俄罗斯不仅停止了经济衰退，进入了快速增长轨道，而且成为金砖四国之一。为什么在西方成功实施几百年的自由民主制度到了俄罗斯却使问题变得更糟？为什么被认为剥夺民主权力的“可控民主”制度的缔造者——普京，不但没有遭到被剥夺者的反对，反而受到被剥夺者（民众）的广泛支持？稍作修改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有利于我们认清上述问题！

二、“新比较经济学”视角的解析

（一）关于制度设计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

根据“新比较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的功能是控制无序和专制两个方面的危险。“所谓无序，是指个人以及财产遭受谋杀、盗窃、违约、民事侵权以及垄断定价等形式的私人侵占的危险。……所谓专制，是指个人及其财产被政府机构及其代理人通过谋杀、征税、财产侵害等形式来侵占的危险。”^①很明显，一个拥有更大权力来控制无序的政府必然会产生更强的专制来滥用职权。图 1 描述了可供一个社会选择的制度可能性边界（IPF）。横轴表示专制的规模；纵轴表示无序的规模。IPF 曲线反映了社会的制度可能性边界：随着政府权力的增加，有多大程度的无序可以被减少。IPF 曲线是凸向原点的，这符合标准的新古典假设，即专制规模的边际增加只能产生越来越小的无序规模的减少。图一描绘了四种不同的控制策略，依据相对于私人而言的官员权力的依次递增，它们分别是：私立秩序、独立执法、监管国家和国家所有制。

① S. 詹科夫、E. 格莱泽、R. 拉·波塔、F. 洛佩兹·德—西拉内斯、A. 施莱弗：“新比较经济学”，吴敬琏主编：《比较》（第十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年，第 1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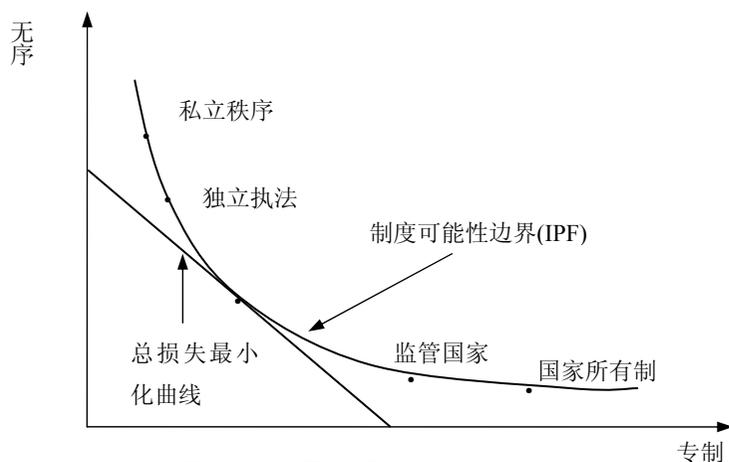


图 1 制度最优设计的分析框

IPF 曲线上的每一点，都意味着一定规模的专制和一定规模的无序，专制规模与无序规模此消彼长，由它们造成的损失同样此消彼长。制度设计的目标就是总损失最小化。在初始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我们假定单位专制损失（单位专制造成的损失）与单位无序损失都是不变的，即边际专制损失与边际无序损失都不随其自身规模的变化而改变。另外，假定单位专制损失与单位无序损失之间是不相等的。于是，可以得到社会总损失的表达式：

$$c = c_1 q_1 + c_2 q_2$$

其中， c 为社会总损失， c_1 为单位专制损失， c_2 为单位无序损失， q_1 为专制规模， q_2 为无序规模。不难看出，社会总损失曲线的斜率为 c_1/c_2 。

很明显，以社会总损失最小化为目标的制度设计现在变得很简单：只要从斜率等于 c_1/c_2 的一系列社会总损失曲线中，找到与 IPF 曲线相切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① 并根据“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与 IPF 曲线切点所对应的专制、无序规模进行制度设计就可以了^②。

（二）应用分析：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及其绩效解析

如前所述，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与 IPF 曲线的切点所对应的专制和无序规模，就是政府制度设计的最优选择。受现实条件和传统因素的影响，同样规模的专制（或无序）给不同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同的，所以不同国家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的斜率（ c_1/c_2 ）

① 社会总损失曲线中，只有那些与 IPF 曲线有交点的曲线才是有现实意义的，其中与 IPF 曲线相切的总损失曲线代表的总损失是最小，故称其为“总损失最小化曲线”，请参见图一。

② 在“新比较经济学”原文分析中，假定单位专制和无序造成的损失是相等的，所以总损失最小化曲线的斜率是固定的即为 45° 。本文放松了这一假定，并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斜率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与制度可能性边界的不同切点来证明不同国家的最优制度选择的差异性。

c_2) 是不同的, 进而由本国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与 IPF 曲线切点所决定的最优制度也是不同的。^①

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 它有着漫长的专制的传统。从沙俄到苏联时期, 俄罗斯一直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治。俄罗斯自 16 世纪中期伊凡四世自称沙皇起, 开始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18 世纪初经过彼得一世的改革, 俄罗斯的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沙皇专制制度在俄罗斯一直延续了 300 多年。十月革命后, 苏联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实践, 虽然成果丰硕, 但实施的仍然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受长期专制传统的影响, 俄罗斯人对专制形成了较强的适应能力, 甚至具有某种依赖, 这与美国情况正好相反, 所以同样的专制规模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比在美国要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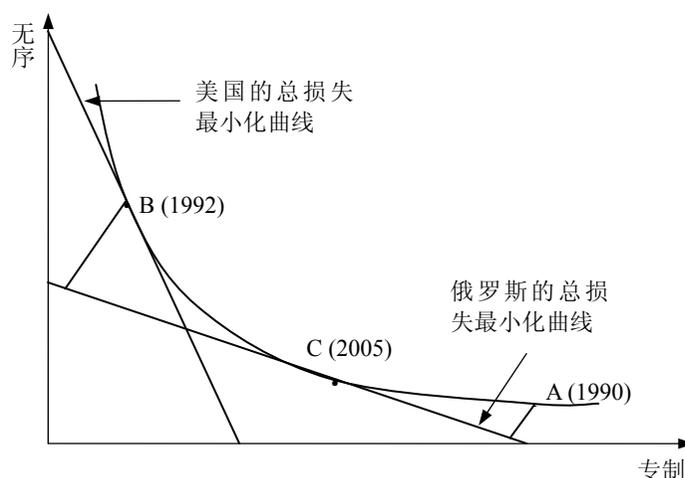
在无序方面, 俄美两国的情况恰好相反! 美国市场经济的自由化程度不仅高, 而且历史悠久。社会上存在各种被人们所熟识的市场约束手段。人们已经习惯于通过私人诉讼解决矛盾和冲突。受长期自由市场经济洗礼的美国人已经习惯于“政府呆在一边”, 这与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 所以同样的无序规模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比在俄罗斯要小。

总之, 由于俄美两国历史传统不同, 同样规模的专制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 同样规模的无序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大。在图形上意味着, 两国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的斜率 (c_1/ c_2) 相差较大, 美国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比俄罗斯的要陡峭得多 (如图二所示)。美国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与 IPF 曲线的切点即 B 点所对应的专制规模就是美国的最优专制规模。俄罗斯总损失最小化曲线与 IPF 曲线的切点即 C 点所对应的专制规模就是俄罗斯的最优专制规模。

转型之前, 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处于制度可能性边界的 A 点, 表现为过度专制。此时, 社会总损失比可以达到的最小总损失多, 多出的部分相当于 A 点到总损失最小化曲线的距离。通过实施休克疗法, 俄罗斯移植了美国式的西方民主制度, 这一举措使俄罗斯的专制规模迅速下降至 B 点。美国式西方民主制度的移植不但没有减少俄罗斯的总损失反而使其进一步增加, 增加额相当于 AB 两点与总损失最小化曲线的距离之差。由于总损失增加, 转型中的俄罗斯经济开始迅速下降, 整个 90 年代俄罗斯的 GDP 下降了 50% 左右, 其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普京上台之后, 对俄罗斯政治体制做出了及时而有效地调整, 使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沿着制度可能性边界从 B 点慢慢恢复至 C 点。在增加专制和国家威权主义的同

^① 当然, 不同国家的 IPF 曲线也不完全相同, 所以即使两个国家的“总损失最小化曲线”的斜率相同, 它们的最优制度设计也不尽相同。为了减少赘述, 在不影响结论的前提下, 本文假定各个国家的 IPF 曲线是相同的。

时，俄罗斯的 GDP 开始显著增长，最高增速超过了 10%。



图二 俄罗斯民主制度移植的偏差与修正

三、结论与启示

转型以来，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发人深思。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可控民主”制度？它是一种“过渡形式”，还是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们应该从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结论和启示。

1、“可控民主”制度在俄罗斯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关于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制度的原因，学界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俄罗斯政治动荡背景下的被迫选择，正所谓“乱世需重典，重典来自威权”；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向俄罗斯专制传统的主动回归。如果是因为“政治动荡”，那么“可控民主”政治体制在俄罗斯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形式”。如果是因为“专制传统”，那么“可控民主”政治体制在俄罗斯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本文赞同“专制传统”回归论，一方面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对该国制度选择的影响确实重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另一方，正如前文所述，转型初期俄罗斯的政治动荡，同样是由西方民主与俄罗斯专制传统之间的冲突所引发的。所以，即使“政治动荡”是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的原因，它也是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一个派生因素。

既然专制传统是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可控民主”制度在俄罗斯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2、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努力探寻自己的道路。受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影响，各国“总损失最小化曲线”（参见图二）的斜率是不相同的，所以不同国家的民主政治体制也应该有所区别。虽然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者不停地叫嚣：“民主无国界，民主没有修饰语”，但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制度也没有统一的模式：在“三权分立”方面，英国是议行调和，美国是三权并列，法国是行政主导；在政党制方面，有的国家一党独大，有的国家两党竞争，有的国家多党倾轧；在议会制方面，有的国家实行“立宪君主制”，如英国、荷兰、瑞典，有的国家实行总统制，如美国，有的国家实行半总统制，如法国。退一步，即使我们将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模式笼统地称为“自由民主”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稳定地、成功地实行该民主的国家也不超过30个。可见，“绝对的民主概念是不存在的”^①，以西方民主模式作为样本，将俄罗斯的“可控民主”作为“准民主”对待也是不够妥当的！

我们应该从俄罗斯移植西方民主制度所付出的沉痛代价中吸取教训，形式上完美的、在别的国家井然有序的民主制度未必适合我国。我们也应该从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制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吸取经验，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我们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Abstract】 From "free democracy" to the Russian democratic political reform of "controllable democracy" Have caused the extensive concern. This article is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winding course Russia's political structure reform, try hard to use relaxing and assuming that analyze the frame in "new comparative economics" of the condition, understand the causality between Russia's political structure reform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article thinks, a great deal of regarding Russia implements system reason of "controllable democracy" is while analyzing, it is correct that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returns to the theory. So "controllable democracy" will have lasting vitality in Russia.

【Key Words】 Free democracy, Controllable democracy, Russia, Political system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вобо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Управляем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Росс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责任编辑 姜睿）

① “普京答法国《巴黎竞赛画报》记者问”，[俄]《共青团真理报》，2004年3月13日。

中央—地区—地方自治： 当代俄罗斯的中央再集权政策

弗拉基米尔·格尔曼*

【内容提要】俄罗斯中央再集权政策的源头、基本观念和利益是什么？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了它的进程和结果？中央再集权对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前景如何？本文旨在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首先纵览俄罗斯1990-2000年变革背景下的地区化趋势；接着考察2000年以来中央再集权进程中各政治力量的理念和利益所在，及其对俄罗斯联邦改革政策的影响，该政策可以称之为“新中央集权”（区别于苏联时期的“旧”中央集权）。接下来分析“新中央集权”政策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俄罗斯国家改革进程的影响。在总结部分，就中央再集权对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意义加以总结。

【关键词】中央再集权 地区化 新中央集权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4-0069-(25)

2004年9月13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取消地方行政长官的普选制度^①。自2005年起，地方行政长官（除特殊说明外，以下简称“州长”）由地方立法机构按总统提名表表决确认。普京的这一决定产生于北奥塞梯小城别斯兰的人质悲剧之后，并被标榜为反恐举措。该决定招致不少观察家的尖锐批评，他们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破坏俄罗斯联邦制度的重要一步和民主制度在俄衰落的征兆。其实，俄罗斯从选举州长过渡（或回归）到实际上的任命制，是始于2000年的中央再集权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一

* 弗拉基米尔·格尔曼（Владимир Гельман），教授，圣彼得堡欧洲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系。

① 在写作本文中，笔者使用了此前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资料。Гельман В.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Левиафана? Политика р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Полис.2006.N2.С.90-109.; Гельман В., Рыженков С., Белокурова Е., Борисова Н. Реформа местной власти в городах России, 1991-2006. СПб: Норма., 2008.

政策在很多方面是对俄罗斯上世纪 90 年代自发、失控的去中央化过程的回应。它包括一整套极其广泛的措施，旨在恢复联邦权力机构（以下称“中央”）对国家最重要杠杆控制权的管理。中央的这些措施可归结为制度、资源与行政的重新集中。更确切地说，取消州长普选标志着俄罗斯中央再集权政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俄罗斯中央再集权政策的源头、基本观念和利益是什么？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了它的进程和结果？中央再集权对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前景如何？本文旨在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本文首先纵览俄罗斯 1990—2000 年变革背景下的地区化趋势；接着考察 2000 年以来中央再集权进程中各政治力量的理念和利益所在，及其对俄罗斯联邦改革政策的影响，该政策可以称之为“新中央集权”（区别于苏联时期的“旧”中央集权）。接下来分析“新中央集权”政策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俄罗斯国家改革进程的影响。在总结部分，就中央再集权对俄罗斯政治制度的意义加以总结。

一、联邦改革：钟摆式摇摆

1990 年代俄罗斯的政治与国家制度的去中央化，无论如何都不是联邦中央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整个国家大规模转型进程中的一种附带效应。在俄罗斯进行的包括政治制度民主化、市场经济建立和国家体制变迁在内的“三重转型”^①，同时伴随着社会精英间的激烈冲突、生产的深度和长期衰退、国家能力的严重下降。这些进程也反映在俄罗斯的地区和城市，但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趋势体现出来。

首先，俄罗斯在苏联时期（也包括苏联以前的时期）数十年的政治发展，在中央和地方相互关系以及地方自身发展层面，形成了制度“遗产”惯性。俄罗斯在历史上形成并发展了中央集权单一制的国家制度，中央政府对国家各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进程实行强有力的控制。这一传统形成于俄罗斯帝国时期，当时对地方的管理通过由君主任命省长的方式实现。在苏联时期，苏共的垄断控制，加上中央计划经济和国防动员政策，导致了地方管理的中央集权化。同时，苏联的民族政策、民族原则成为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制度的基础。根据民族原则，除区域化非常明显的地方治理单位（边疆区和州）以外，依照各民族代表原则建立不同级别的民族—区域体（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民族区）。尽管苏联时期联邦制在诸多方面流于形式，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过程中，在俄罗斯的区域单位和民族区域实体

^① Offe C., “Capitalism by Democratic Design? Democratic Theory Facing the Triple Transition in East Central Europe”, *Social Research*, 1991, vol.58, N4, pp. 865-892.

却转变成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主体。1990年代，在这些联邦主体中，很多提出了主权要求，主要表现为要求获取对经济资源最大限度的控制权（如鞑靼斯坦），甚至是国家独立（如车臣）。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开始与地方划清权力界线，体现为由俄罗斯总统、政府与几乎所有地方的领导人于1992年3月签署的《联邦条约》，以及1993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①

苏联地方管理模式的特点是权力和资源的等级制中央集权，支撑这种制度的是苏共、苏联行政部门、机关的垂直一体化结构，也包括强力部门（从军队到克格勃）。在地方，依托于行政地位（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社会经济现代化水平、居民组成、经济行业结构和一些其它历史因素，在后苏联时期，出现了形成某种新型的政治经济关系的条件。在地方层面上，苏共各地方委员会执行社会一体化和社会福利分配职能，此外，还扮演着向上级为地方利益进行游说的利益集团的角色。不同区域间的不对称性，使得在区域和地方治理中，产生了在后苏联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效应^②。但在苏联时代的最后几十年，由于中央控制成本的上升和效率的降低，地区和地方治理体系遭遇到了日益严重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中央所能使用的激励机制（从选择性惩戒到干部轮换），在1960—1980年代运用得很差；而中央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非正式的合同关系：“以忠诚换不干涉”^③。换句话说，国家分配能力在1960—1980年代逐步地转移到地方精英的控制之下，这些人靠与中央精英之间的特殊关系牟利。^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导致了地方管理干部大规模更迭，严重打击了原有的平衡。该政策在一些地方引发了利益集团间的冲突，并动摇了根深蒂固的保护—被保护关系^⑤。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实行的“垂直”和“平行”分权，以及1990年第一次实行的地区和地方苏维埃竞争性选举，动摇了苏联时期地区和地方治理的制度基础。然而，上世纪90年代的去中央化与2000年代的中央再集权的实践，都经历了路径依赖的问题。

① Петров Н. Федерализм по-российски// Pro et Contra. 2000.т.5.№1.С.7-33.; Митрохин С.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и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С.47-87.; Ross C., *Federal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Russ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Hough J., *The Soviet Prefects: The Local Party Organs in Industrial Decision-Mak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③ 这部分是地方第一书记参与1957、1964年国家领导层斗争的结果，此后，无论是地方领导人还是中央都不再愿意打破平衡。

④ 一个例子是萨拉托夫州，在这里曾经有过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内最大的土壤改良项目，增强了农业经营者利益集团在地区的影响力：1971-1991年间，中央投入了45亿多卢布。参见：Gel'man V., S.Ryzhenkov, M.Brie, *Making and Breaking Democratic Transitions: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Russia's Reg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⑤ McAuley M., *Russia's Politics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Gel'man V., S.Ryzhenkov, M.Brie, 2003.; Moses J.C., "Who Has Led Russia? Russian Regional Political Elites, 1954-2006",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60, N1, pp.1-24.

其次，俄罗斯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关键时刻”（*crucial junctures*），为联邦和地方政治人物打开了不同的“机会之窗”。这些人的力量对比和行为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遗产”设定了框架性限制、并确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界限，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时，这些变化向量的形成，并不是孤立的，还取决于俄罗斯政治家所采取的具体举措^①。

无论是路径依赖问题，还是政治人物对 90 年代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研究者们都进行了相当缜密的分析。他们指出了对中央再集权进程起影响作用的一些因素：

- 苏联时期形成的等级制民族联邦制的组织模式^②；
- 俄罗斯各地区不均衡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③；
- 各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对地方政治进程的影响^④；
- 苏联解体的非预谋后果，这些后果引发俄罗斯各地区的民族政治冲突^⑤，以及中央对地方行政能力的严重削弱^⑥。

同时，联邦和地方精英争夺资源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央在联邦竞选活动中吸引地方精英支持自己的努力^⑦，以及个别地区的精英群体^⑧，在这些进程中都留下了印记。总结归纳不同研究者的看法，1991-1998 年间俄罗斯中央与地方相互关系，有如下一些主要的趋势：

1、从中央向地方自发地转移最重要的行政权力杠杆，包括：

制度法规领域的一系列权力（地方法规制定权，其中一些与联邦法规相违背，

① 对这些因素的分析参阅，Гельман В., Рыженков С., Белокурова Е., Борисова Н. Реформа местной власти в городах России, 1991-2006. СПб: Норма, 2008.

② Treisman D., *After the Deluge: Regional Crises and Political Consolidation in Russia*; Stepan A., “Russian Feder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st-Soviet Affairs*, 2000, vol.16, N2, pp.133-176.

③ Дмитриева, О.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диагностика.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экономики и финансов, 1992.

④ Gel'man V., S.Ryzhenkov, M.Brie, 2003.

⑤ Gorenburg D., *Minority Ethnic Mobiliz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Lankina T., *Governing the Locals: Local Self-Government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4.

⑥ Stoner-Weiss K., “Central Weakness and Provincial Autonomy: Observations of the Devolution Process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1999, vol.15, N1, pp.87-106.; Solnick S., “Is the Center Too Weak or Too Strong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V.Sperling (ed.), *Building the Russian State. Institutional Crisis and the Ques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0, pp.137-156.; Ross C., *Federal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Russ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⑦ Treisman D., *After the Deluge: Regional Crises and Political Consolidation in Russia*; Likhtenshtein A., “Parties of Power: The Electoral Strategies of Russia's Elites”, in: V.Gel'man, G.V.Golosoov, E.Meleshkina (eds.), *The 1999-2000 National Elections in Russia: Analyses, Documents and Data*, Berlin: edition Sigma, 2005, pp.59-75.

⑧ Gel'man V., S.Ryzhenkov, M.Brie, 2003.; Golosoov G.V.,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Democracy Unclaimed*,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4.

甚至一些地方对联邦法律经常不执行)^①；

行政资源方面，地方不但独立地（没有中央参与）建立地区和地方权力机关，还影响联邦权力机关领导人的任命，包括强力部门（检察院、警察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联邦机关事实上从属于地方的政治金融（有时是犯罪性质的）集团^②。地方领导人既能够禁止本辖区内民众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又能够挑起受其操纵的抗议活动，从而向中央施压^③；

经济资源方面，包括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转到地方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他们在俄罗斯经济政策制订中扮演着“否决集团”的角色^④；也包括对预算资源的控制，1998年的俄罗斯财政预算中，地方份额占了近60%^⑤，同时中央控制的财政资源的份额缩减。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不对称性加大，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地位关系也出现了不对称性加大的问题，原因是：其一，由于中央和地方之间关于划分管辖对象和权力条约的签订（至1998年中央已与46个地方签订了此类条约）；其二，一些地方被给予特殊的权限，如获得民族共和国地位（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或集中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莫斯科）。

2、中央对地方政治进程的杠杆影响作用丧失。地方的政治进程，几乎完全由地方精英控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建立了封闭的“地方专制”，地方精英甚至还成为全俄政治进程中的重要角色，他们能够在联邦选举中发挥“否决集团”的作用，并借此迫使中央在去中央化过程中作出新的让步。

大多数观察家对这些趋势给予非常负面的评价，称之为“雪崩般的去中央化”^⑥

① Митрохин С.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и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 Г.Люхтерхандт-Михалева, С.Рыженков (ред.). Центр – регионы – местн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М. – СПб: Летний сад, 2001, С.47-87.; Mitchneck B., S.Solnick, K.Stoner-Weiss, “Federalization”, in: B.Ruble, J.Koehn, N.Popson (eds.), *Fragmented Space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1, pp.123-156; Stoner-Weiss K., *Resisting the State: Reform and Retrenchment in Post-Soviet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Volkov V., *Violent Entrepreneurs: The Role of Force in the Making of Russian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Robertson G., “Strikes and Labor Organizations in Hybrid Regim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7, vol.101, N4, pp.781-798.

④ Woodruff D., *Money Unmade: Barter and the Fate of Russian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Паппэ Я. Олигарх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хроника 1992-2000. М.: ГУ-ВШЭ, 2000.; Паппэ Я. Треугольник собственников 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В.Климанов, Н.Зубаревич (ред.). *Политик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измерении*. М.– СПб: Летний сад, 2000, С.109-120.

⑤ Treisman D., “Russia Renewed?”, *Foreign Affairs*, 2002, vol.81, N6, pp.58-72.

⑥ Митрохин С.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и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С.47-87.

和“有缺陷的”^①、“破坏市场的”^②和“谈判的”^③联邦制，威胁着俄罗斯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上的统一。1998年8月的金融危机全面凸显了中央和地方相互关系问题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形成了联邦精英对中央再集权的整体需求^④。这种需求得到了完全的满足：与1991-1998年相比，接下来的十年（1998-2008年）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中央再集权政策相当激烈的时期^⑤。这十年间新的中央再集权有以下结果：

- 制度法规重新向中央集中。通过了一系列对地方权力进行实质性限制的联邦法律，并根据中央通过的法律核查地方法规；

- 行政权的中央再集权。在这一框架内，联邦机关在地方的分支机构不再属于地方管辖，而由中央或联邦区管理，联邦区还代表中央对联邦和地方权力机构进行行政和政治监督（中央收回了对州长的实际任命权就显示了这一趋势）；

- 经济资源的中央再集权。削弱地方精英对当地经济的控制，使地方经济更依赖全俄的金融工业集团，他们是中央利益在地方的传导者^⑥，同时削减地方权力机关所控制的预算资金份额（自2006年起中央在全俄财政预算中的份额增加至66%，并保持在这一水平），从而提高财政资源在中央的集中度。这样，1990年代末的俄罗斯还是世界上中央化程度最高的联邦国家，而从2000年代中期起，根据联邦国家的标准，已经在财政分权水平上处于中游地位^⑦；

- 由于废除了中央和地方的双边关系条约，并不再给予某些地方以特权，各地与中央以及相互间的政治地位逐渐平衡^⑧；

- 在中央对地方政治进程影响力实质性提高的背景下，地方精英在全俄政治进

① Митрохин С. Дефективный федерализм: симптомы, диагноз, рецепты выздоровления// Федерализм. 1999. N2. С.61-74.

② Slider D., “Russia’s Market-Distorting Federalism”, *Post-Soviet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1997, vol.38, N8, pp.445-460.

③ Полищук Л.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федерализма»: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в: В.Климанов, Н.Зубаревич (ред.). Политик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измерении. М. – СПб: Летний сад, 2000, С.88-108.

④ Митрохин С.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и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С.74.

⑤ 详见：Reddaway P., R.Ortung (eds.), *The Dynamics of Russian Politics: Putin’s Reform of Federal-Regional Relations*, vol.1-2,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2004.

⑥ Зубаревич Н. Пришел, увидел, победил? Крупный бизнес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власть// Pro et Contra. 2002. т.7. N1. С.107-120.; Speckhard C., *The Tie That Binds: Big Business and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in Post-Soviet Russia*,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4.

⑦ 比较数据参见：Filippov M., P.Ordeshook, O.Shvetsova, *Designing Federalism: A Theory of Self-Sustainable Feder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⑧ 见，Stoner-Weiss K., *Resisting the State: Reform and Retrenchment in Post-Soviet Russia*, 2006.; 另外一种观点，参见：Chebankova E., “The Limitations of Central Authority in the Region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Federal System”, *Europe-Asia Studies*, 2005, vol.57, N7, pp.933-949; Chebankova E., “Putin’s Struggle for Federalism: Structure, Operation, and the Commitment Problem”, *Europe-Asia Studies*, 2007, vol.59, N2, pp.279-302.

程中的作用明显下降。这些成就的取得，不仅是中央的行政干预，同时还得益于制度性的调整，同时也在一些情况下导致了地方精英的更迭以及地方政治制度的进一步重构^①；

类似于 1990 年代的去中央化，2000 年代的中央再集权也是更广泛的俄罗斯转型进程的一部分。国家的巩固及其行政、分配权力的恢复，以原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垄断政治制度的形成等，同时伴随着精英间分化与分裂的降低，以及克里姆林宫与从属于自己的政治经济角色间达成的“强加的共识”^②——此处列举的只是这些进程中的一些方面，它们决定了 2000 年代俄罗斯变革的方向。俄罗斯“三重转型”的结果和理想模式相差甚远：类似钟摆的摇摆，从一个巩固的极点（苏维埃的政治经济体制）摆动到另一个极点（强化的垄断制度和国家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关系层面上，这只钟摆从国家治理的极端中央集权开始移动。1990 年代经过一系列曲折，在 1998 年经济危机时候达到去中央化的极点。紧接着出现了作为重要力量的中央政府完全消失的危险。然而，这只钟摆随后开始迅速向反方向摆动，绕过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并朝着 2000 年代中期达到的、并一直保持至今的中央再集权平衡（以“新中央集权”面貌出现）方向移动^③。

2000 年代所形成的新中央集权，只是部分取决于国家发展的客观进程，如全俄市场的形成和全国性经济力量在地方的扩张^④。在很大程度上，这还是联邦中央和地方在该领域政策的产物。而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取决于联邦和地方层面的政治力量团体，他们有着一定的理念、利益和实现其理念与利益的战略。这些因素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 2000 年代联邦改革的进程和政治后果。

二、联邦改革：理念和利益

为什么 1998 年后俄罗斯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关系会发生 180 度的大转弯？这个问题实际上分为两个方面：首先，为什么中央如此坚定地改变自己的方针，并且能够成功地将联邦改革的一整套措施付诸实施？其次，那些 1998 年之前还在与中央的“讨价还价”中积极寻求政治好处的地方精英，为何顺从地赞成了强加给他们的新

① Матцузато К. (ред.). Феномен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регионы: победа неожиданная или закономерная?. М.: Материк, 2004; Голосов Г. Электоральный авторитаризм в России// Pro et Contra. 2008.т.12.№1. С.22-35.

② Gel'man V., "Russia's Elites in Search of Consensus: What Kind of Consolidation?", in: A.Steen, V.Gel'man (eds.), *Elite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Russia*,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29-50.

③ Петров Н. Федерализм по-российски.С.7-33.; Петров Н. Корпоративизм vs регионализм// Pro et Contra. 2007.т.11.№4-5.С.75-89.

④ Зубаревич Н. Указ. Соч.С.107-120.

“游戏规则”？回答这两个问题，不能将中央和地方精英混为一谈。在联邦与地方层面，都有按各自共同利益（或理念）联合起来的力量同盟。这些同盟的成员组成及行为动机，在 2000 年代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变。

联邦中央在 1990 年代是一个由不同组织、派别和集团组成的五光十色的混合体，他们彼此之间、与地方精英之间，或发生冲突或结成同盟。在形势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制订涉及地方政策的时候，联邦中央的各种势力遵循的原则，不仅是自身的利益（资源最大化和责任最小化），同时还有他们的理念（在其理念的支配下，在制订地方政策时，他们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和理想的社会架构的认识，来理解问题）。联邦中央各种势力的利益和理念有实质的不同。利益的分歧在于，一些部门及其领导竭力寻求更大的中央集权管理权，试图将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首先是财政部）。同时，其他部门和政治家希望将那些他们单独无法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社会问题），分担在地方身上。在俄罗斯精英深刻分化的背景下，利益上的分歧妨碍了统一的中央政策的制定，并导致政治决策缺乏连贯性。

1998 年 8 月危机之后，情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首先，出于中央和地区应对国家经济危机的需要，以及地方精英在联邦层面上积极参加政治争斗（在 1999 年杜马选举前夕，以及选举过程中），地区政策问题开始具有优先地位。一方面，中央失去了管理俄罗斯各地方的能力，另一方面，地方领导人可能动摇联邦精英地位的前景，这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各种政治力量把“要求中央再集权”提上日程。换句话说，地区政策问题触及了所有联邦层面势力的利益，因此，即便是在十分不确定的背景下，虽然存在着相当大的理念分歧，也没有妨碍中央采取统一行动：中央在该领域的政策从被动反应变为主动应对。其次，参与地区和地方政策决策的联邦中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1991—1998 年，所有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都主张寻求与地方精英妥协，他们相继建立临时性的特别同盟并吸引其他势力站到自己一边来。1998 年 8 月之后，由于先前失败的经济政策，他们的地位发生动摇。因此，那些支持“自上而下”（“权力垂直”）等级制管理的力量，在中央制订地方政策时开始发挥关键作用，而其他观点在其中只发挥从属作用。其他所有势力，尽管他们影响中央政策制订的机会不大，但也愿意加入这个新联盟。这样，“权力垂直”的支持者依托于联邦精英的广泛支持^①，在 2000 年之后能够在地区和地方政策领域实现自身利益和理念，并且能够在不遭遇其他势力反抗的情况下执行中央再集权政策（这不同于 1990 年代）。此外，与 1990 年代不同，中央还拥有相当重要的资源，如民众对国家元首及其中央再集权政策的支持。

^① Steen A., *Political Elites and the New Russia: The Power Bases of Yeltsin's and Putin's Regimes*,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3, pp.95-117.

在这些条件下，大幅度改变中央的地方政策的“机会之窗”的敞开，也就不足为奇了。普京 2000 年 5 月正式就任国家元首后立刻宣布进行的联邦改革“注定成功”，因为这项改革：

- 是这位强力、受欢迎的国家元首日程表上的关键一项；
- 以联邦精英和民众的广泛（尽管是有条件的）共识为基础；
- 不但要提高俄罗斯国家的行政能力，还利用这一资源推行中央的政策。

与此同时，那些认为政权是一个统一体，而地方管理机构是权力体系的下级环节，持这种理念的支持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联邦改革的基本立场。他们认为，国家对各地区和城市的政策，应当具有或多或少中央集权管理的性质。按照这一理念，地区和地方自治只有在不妨碍中央集权管理时才被允许，因此需要对现行的管理方式进行修正。在实际运作中，这一理念在“权力垂直”的概念中得到体现，即各级权力机关从属于国家的最高执政者——无论是沙皇、总书记，还是总统。对这一理念的传导者而言，地区政策的基本内容是保持和加强中央对下级行为的行政控制。相当一部分高官充当了行政管理思想在联邦层面的表达者，他们通常来自强力部门，他们将苏联时期的“好的”管理实践（除了缺点之外）视为标准的理想管理模式（包括对地区的管理）。这些人在“新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同盟中居主导地位，这决定了中央再集权政策的性质，也就是凯瑟琳·斯托纳-魏斯（Stoner-Weiss）所说的，寻找“用苏联的方式解决后苏联问题”^①。

地方精英的立场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尽管他们在 90 年代曾为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和获得更多资源，都与联邦中央“讨价还价”，但这些不同地区的精英联合起来进行“讨价还价”并不多。每位州长首先关注的是单独解决当地问题和巩固自身权力，促使他们以实现地方权力和资源最大化为目标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动力并没有。地区间的不均衡，限定了在区域化进程中与中央最积极“讨价还价”的领导者角色的数量——俄罗斯的共和国（俄罗斯 88 个联邦主体中的 20 个，除车臣外）以及上缴联邦财政的地方——1990 年代它们的数目不超过 18 个，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地方拥有共和国地位^②。当地区数量很大的情况下，旨在保证各地区利益在中央代表的联邦委员会，其权力却很有限，总体上被认为是一个相当无效的机构^③。曾经出现过临时

① Stoner-Weiss K., *Resisting the State: Reform and Retrenchment in Post-Soviet Russia*, 2006.

② 参见：Treisman D., “Russia’s ‘Ethnic Revival’: The Separatist Activism of Regional Leaders in a Postcommunist Order”, *World Politics*, 1997, vol.49, N2, pp.212-249.; Stoner-Weiss K., *Resisting the State: Reform and Retrenchment in Post-Soviet Russia*, 2006.

③ Петров Н. Совет Федераци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интересов регионов в Центре, в: Н.Петров (ред.). Регионы России в 1998 г. М.: Гендальф, 1999, С.180-222.

性的跨地区联盟，但是十分不稳固^①。这些联盟的基调由少数有组织的地方领导人决定，如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Юрий Лужков）和鞑靼斯坦总统沙伊米耶夫（Минтимер Шаймиев）。对他们而言，参加此类联盟能够获得额外的好处。1999年杜马选举前夕，地方领导人积极参与创立的“祖国—全俄罗斯”联盟便是一例，他们在其中起了主导的作用^②。但是大多数州长没有类似的动因，只是为达到自身目的（获得政治好处）需要强大的盟友，他们也是受到了从众效应的影响。因此，对他们行为的影响因素，随着中央和地方关系“总路线”的摇摆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无论是1990年代的去中央化进程，还是2000年代的中央再集权，都影响着地方行政长官的行为。

不足为奇的是，在联邦政策制订过程中，州长们及其领导的跨地区同盟，是更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的小伙伴，就如在90年代经济决策中，地区精英扮演着寡头和国家杜马左翼集团盟友的角色^③。与此类似，从众效应也在1999—2000年的联邦选举中显现出来。随着“祖国—全俄罗斯”联盟开始在预选中落后于受克里姆林宫庇护的“统一”联盟，在1999年杜马选举前夕，地方精英迅速临阵脱逃，转投胜利者阵营。最终在2001年，“祖国—全俄罗斯”联盟被“统一”联盟不友好地吞并^④。因此，当中央放弃对地方的被动反应政策转而积极制订政治日程时，它能够轻而易举地执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甚至不需要采取特别措施。2000年2月，在普京当选总统之前，就广为流传着别尔哥罗德州、库尔干州和诺夫哥罗德州州长这样的言论：合并俄联邦主体将其数量减少至20—30个，此外不再举行州长选举以便中央任命^⑤。特别之处是，这些地区（以及他们的行政长官）都不处于区域化的最前列。同时，“祖国—全俄罗斯”联盟的领导人在1999年杜马选举失败后，丧失了维持地区同盟的必要资源。因此，地方精英在2000年后并没有过于妨碍中央的再集权政策。他们只是对总统的法案进行微不足道的修正，并且又像1990年代，倾向于就原来的地位和资源，与中央单独地“讨价还价”，但他们此时在这种“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已极大削弱。力量的天平向中央倾斜，中央获得了推行再集权政策的大好机遇。

① Gel'man V., "Why It is so Difficult to Form a Regional Coalition", *Russian Regional Report*, 1999, vol.4, N16, 29 April.

② Colton T., McFaul M., *Popular Choice and Managed Democracy: The Russian Elections of 1999 and 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Likhtenshtein A., pp.59-75.

③ Shleifer A., D.Treisman, *Without a Map: Political Tactic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chapter 4.

④ Colton T., McFaul M., 2003; Likhtenshtein A., pp.59-75.

⑤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2 февраля 2000.

三、联邦改革：目的和手段

这样，“新中央集权”成为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内（2000—2004年）最重要的政治方案。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改革——在俄罗斯政治词典中被称为“联邦改革”^①，它同时有以下一些目标：

- 巩固中央控制地方的行政杠杆，以恢复俄罗斯国家能力；
- 维护地方精英的忠诚，保证政治进程在全国和各地区取得中央需要的结果；
- 削弱地区精英的资源基础、打破地区市场封锁、借助全俄集团占领地方市场等，提高地方管理的效率^②。

在实际的措施方面，2000—2001年中央再集权政策的第一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③

1、俄罗斯总统2000年5月签署命令，建立7个联邦区并任命自己驻这些地区的全权代表，他们的权力包括监控联邦法律和总统命令在地区的执行，协调联邦主管机关地方机构的工作等。这一举措与联邦法律（如“警察法”）的几项修正案一起，使从税务机关到内政部在内的各个机构，摆脱了地方精英的实际控制（某些情况下，也包括法律上的控制），并恢复了它们作为中央政策传导者的职能。一些机构（如检察院和内务部），还在联邦区的层面上进行了重组。此外，总统全权代表还联合联邦区的检察长，在俄罗斯宪法法院的支持下，对地方法律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正，使之多方面（尽管不是完全地）地符合联邦标准^④。

2、改变联邦委员会的组建程序。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联邦主体在联邦委员会拥有两位代表。1993—1995年，联邦委员会委员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1996—2001年由地方行政和立法机关的长官担任。自2002年起，联邦委员会由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长官的代表组成，而地方行政长官进入隶属于国家元首的国务委员会，成为其成员，但这一机构是协商性的，并且只是临时在总统办公厅的监控下举行会议。实际上，2002年以后，联邦委员会委员对国家政治进程的影响微不足道，也很少代表地方利益，而且联邦委员会自身也没有得到民众的政治支持。这样，地方精英对中

① Reddaway P., R.Ortung (eds.), 2003-2004.

② Зубаревич Н. Указ. Соч. С.107-120.

③ 参见：Solnick S., “The New Federal Structure: More Centralized, or More the Same?”, *PONARS Policy Memos*, 2000, N161; Hyde M., “Putin’s Federal Reform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residential Power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01, vol.53, N5, pp.719-742; Reddaway P., R.Ortung (eds.), 2003-2004.

④ 详见：Chebankova E., “The Limitations of Central Authority in the Region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Federal System”... pp.933-949.

央政策的影响力明显降低。权限原本就非常小的联邦委员会，最终几乎完全丧失了对俄罗斯政治进程的影响力^①。

3、当出现违背联邦法律时，俄罗斯总统有权在得到法院确认的情况下，撤销地区民选的行政长官，解散地区立法机关。虽然这一制裁在实践中从未使用过，但威胁使用的本身，就起到了明显的遏制效果并迫使地区精英听命中央。

4、通过修改税法，实行财政预算收入的中央再集权^②，与地区和地方税相比，明显地提高了联邦税的数量与比重。结果是，与1990年代相比，地区和地方预算开始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的划拨，而中央则把地方执行社会经济政策的绩效与资金划拨挂钩。此外，中央还积极在地区推动所有权的重新分配，以便使一些与中央关系密切（包括私人关系）的全俄金融工业集团获利。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这些集团在地区的扩张，打破了地区精英在经济中树立的行政壁垒^③。只有为数不多在经济上有影响力、政治上对中央有重要意义的地区领导人，如鞑靼斯坦和巴什科尔托斯坦，能够保持对主要经济资产的控制，并阻止全俄经济势力入侵自己所辖区域。而在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地方，地区市场被各种集团占领，他们在地区和地方行政机关布满亲信，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④，促使“权力私有化”^⑤。总的来说，这些变化有助于经济关系的垂直融合并最终巩固统一的全国市场，但妨碍了地区间的经济竞争。

尽管在决策层面上，中央的方针看似是一套完整的建设高效法治国家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措施，但政策执行的最重要的机制，却是有选择性的执行和惩罚，同时，调整中央和地区冲突的机制也是非正式的。一方面，克里姆林宫不时地会选择性地惩罚一些州长，如库尔斯克州长亚历山大·鲁茨科依（Александр Руцкой），由法院裁定取消其竞选连任的权利（归咎于其违法行为，在很多地方行政长官身上都存在）^⑥。另一方面，2001年决定放宽大多数州长的任期限制，允许三连任甚至四连任，作

① 参见：Remington T., “Majorities without Mandates: The Federation Council since 2000”, *Europe-Asia Studies*, 2003, vol.55, N5, pp.667-691.

② 参见：Шевцов А. Системны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естных бюджетов//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01. N8. С. 142-157.; Федоров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в сфере местного 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Полис.2003.N4.С.71-81.; Чернявский А., К.Вартапетов. Финансовая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 и местн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2003.N10.С.94-107.

③ 参见：Зубаревич Н. С.107-120.

④ 如楚科奇自治区，实际上成了大企业家罗曼·阿布拉莫维奇（Роман Абрамович）的领地。他从2001年到2008年担任自治区行政长官。

⑤ Перегудов С., Лапина Н., Семенов И. Группы интересов и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1999.

⑥ Прибыловский В. Триумфальное шествие башкирск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технологии, в: А.Верховский, Е.Михайловская, В.Прибыловский. Россия Путина: пристрастный взгляд. М.: Панорама, 2003, С.160-163.

为对一些州长忠诚的奖赏^①。中央政策之所以发生如此转变是因为，尽管实行了中央再集权政策，但在 2000 年代初期，大多数州长通过吸收或者打压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仍保存甚至巩固了对本地区的政治控制^②。据格里戈里·戈洛索夫（Григорий Голосов）分析，在 1995—1999 年间，88 个地区中有 45 个地区的现任行政长官在选举中获得连任，而 1999—2003 年间他们则在 88 个地方选举中的 59 个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其中只在 16 个地方遭遇失败，另外 13 场地方选举则没有参加^③。

在一些情况下，由于无法单凭自身取得对地区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控制，克里姆林宫也会有选择地、个别地与有影响力的地方领导人进行“讨价还价”，这并不奇怪。如此“讨价还价”的结果，要么是保持地方领导层现状，以换取中央想要的联邦选举结果（像 2003 年发生在巴什科尔托斯坦的那样）^④，要么相反，不合中央心意的地方领导人到莫斯科高就，随后按克里姆林宫要求，对权力和/或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如，雅库特的领导人以放弃竞选连任换取联邦委员会副主席后，中央得以让自己的候选人竞选成功，并恢复了对该共和国金刚石资源的控制，而这一领域在 1990 年代几乎成为雅库特民族精英的“世袭领地”^⑤。与此类似，因执政不善饱受批评的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叶甫根尼·纳兹德拉坚科，Евгений Наздратенко）和圣彼得堡市市长（弗拉基米尔·亚科夫列夫，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离开现任职位获得升迁（担任联邦部长），而取而代之的是中央支持的候选人^⑥。在地方几乎全面违反联邦法律^⑦和管理效率低下的情况下，中央采取有选择地制裁并与州长单独“讨价还价”的管理方式是合理的，这些方式保证了中央成功地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并使控制

① Gel'man V., "The Rise and Fall of Federal Reform in Russia", *PONARS Policy Memos*, 2001, N238, https://gushare.georgetown.edu/eurasianstrategy/Memos/2001/pm_0238.pdf (access 15 August 2008).; Petrov N., "Regional Elections under Putin and Prospects for Russian Electoral Democracy", *PONARS Policy Memos*, 2003, N287.

② Перегудов С., Лапина Н., 1999.; Петров Н. Федерализм по-русски. С.7-33.; Gel'man V., S.Ryzenkov, M.Brie, 2003.

③ Голосов Г. С.22-35. 不管怎样，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州长的竞争性选举本身是行政长官向选民负责的政治机制，因此也起到了联系民众与精英的重要功能。参见：Konitzer A., *Voting for Russia's Governors: Regional Elec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under Yeltsin and Puti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5.

④ Прибыловский В. Управляемые выборы: деградац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ыборов при Путине, в: Г.Белонучкин (ред.). Россия Путина: история болезни. М.: Панорама, 2004, С.56-59.

⑤ Gel'man V., "The Rise and Fall of Federal Reform in Russia"; Прибыловский В. Триумфальное шествие башкирск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технологии. С.167-168.

⑥ Прибыловский В. Триумфальное шествие башкирской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технологии. С.164-165; Прибыловский В. Управляемые выборы: деградац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ыборов при Путине. С.21-26.

⑦ Chebankova E., "The Limitations of Central Authority in the Region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Federal System", pp.933-949.

成本最小化^①。这些措施得到了联邦精英的支持。总体而言，他们配合“法治专制”的战略（这一战略是在法律最高地位缺失的情况下，恢复国家的能力），法治专制涵盖了1990—2000年代俄罗斯所有的政策领域，也包括中央再集权政策^②。

联邦改革第一阶段的成就是恢复了中央对地区的控制，这一点在2001年前已显现出来，并为开始第二阶段建立中央新的地区管理机制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政府和总统办公厅准备并推行了一系列制度性变革，旨在：（1）巩固中央和地区关系的平衡：保持地区的忠诚和可控，同时避免发生新的“雪崩般的去中央化”；（2）保证地区和地方治理的效率。为此，中央采取了以下步骤：

首先，作为对行政机制的补充，中央利用政治制度——政党和选举——从国家政治生活中剔除地区主义，并实现俄罗斯各地区所有政治进程在中央控制下的垂直融合。2001年通过的《政党法》禁止注册地区性政党。而此前这些地区性政党大部分是地区精英的“政治机器”^③。从2003年开始，根据总统办公厅的提议，在地区立法机构的所有选举中，必须引入混合选举制度，旨在巩固联邦政党——主要是作为克里姆林宫重要工具的“统一俄罗斯”党——在地区的影响力^④。但是，从加强中央对地区和地方领导人控制的角度来看，该措施作用有限。相反，2003—2004年间“统一俄罗斯”党取得地区和地方选举胜利的地方，是其分支处于州长或市长控制的地区^⑤。这些地区领导人没有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动机，他们支持不同的政党和联盟（在他们控制下的、忠实于全国性政党的分支）^⑥。但是，“统一俄罗斯”党得以在一些地方的立法机构建立起有影响力的党团，这些党团能够决定议事日程

① 证据参阅：Панеях Э. Неформальные институты и формальные правила: закон действующий vs. закон применяем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2003.N1.C.35-52.

② Gel'man V., "The Unrule of Law in the Making: The Politics of Informal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Rus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04, vol.56, N7, pp.1021-1040.

③ Щербак А. Закон о партиях – элемент управляем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или стимул к развитию партий?, в: М.Горный (ред.). Выборы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Пб: Норма, 2002, С.307-313.; Golosov G.V.,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Russia: Democracy Unclaimed*, 2004; Golosov G.V., "What Went Wrong? Regional Electoral Politics and Impediments to State Centralization in Russia, 2003-2004", *PONARS Policy Memos*, 2004, N337.

④ Gel'man V., Lankina T., "Authoritarian versus Democratic Diffusions: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oices in Russia's Local Government", *Post-Soviet Affairs*, 2008, vol.24, N1, pp.40-62.; Reuter O.J., Remington T., "Dominant Party Regimes and the Commitment Problem: the Case of United Russi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8, forthcoming. 在俄罗斯的六个地区的立法机关选举中采取了比例选举制。混合制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在地方自治代表机构的选举中。

⑤ Кынев А. Переход к смешанным выборам в регионах: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Полис. 2004.N2.C.32-40.; Кынев 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ах: взгляд сквозь призму реформы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Полис.2006. N6.C.145-160.; Golosov G.V., "What Went Wrong? Regional Electoral Politics and Impediments to State Centralization in Russia, 2003-2004",

⑥ Голосов Г. Указ. Соч.С.28.

和决策制订过程^①。总的来说，这些改革对俄罗斯地区政治制度的影响，可以用彼得·帕诺夫的评论来描述：“霸道的地区更加霸道，有竞争力的地方更有竞争力”^②。不仅如此，对政党间竞争的推动，扩大了在地区层面的政治选择范围，正如戈洛索夫公正地指出，从长远来看，可能有助于打破州长的地区“政治机器”^③。然而，这一发展态势未必能被国家领导人列入计划，他们最关心的是在2007—2008年联邦选举中保住自己的政权。为此，需要将地方的“政治机器”纳入全国性政党的体系。因此，中央在2004年作出取消地方行政长官普选的决定，是其再集权政策的合理延续。

其次，中央将2000年提出的削减俄罗斯联邦主体数量的主张，逐步付诸实施。根据1993年俄罗斯宪法，2000年代初期之前俄罗斯联邦由89个联邦主体组成——21个共和国、49个州、6个边疆区、2个联邦直辖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1个犹太自治州和10个自治区。但是，偶尔公开讨论的将俄罗斯联邦主体合并至20—30个的极端计划，遭到总统办公厅的否决。中央的打算是合并某些实力过弱的地区，但绝不是想建立一批实力强大的地区。因此，俄罗斯联邦主体的合并进程只是“点对点”的，通过吞并（或者成为边疆区或州的一部分）那些1990年代独立出来的自治区的方式来进行缩减。彼尔姆州和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合并^④，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埃文基自治区、泰梅尔自治区合并，勘察加州和科里亚克自治区合并^⑤。2007—2008年乌斯季—奥尔登斯基自治区和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分别被伊尔库茨克州和赤塔州吞并^⑥。但是，中央否决了一些金融工业集团提出的将秋明州和汉特—曼西自治区和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合并的提议：此类“超级地区”的经济实力可以和莫斯科相提并论^⑦。中央也不得不否决其他触及一些民族共和国精英利益的方案（如否决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吞并阿迪格共和国的提议）。但总的来说，巩固地区的政策进行得相当成功，中央得以降低维持经济不独立地区的开销。截至2008年上半年，全国共有9个边疆区和46个州，4个自治区（之前为9个），联邦主体的数量减少至83个。

① Глубоцкий А., Кынев А. Партийн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собраний российских регионов// Полис. 2003. N6. С.71-87.

② Панов П. Реформ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х систем и развит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регионах России (кросс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Полис. 2005. N5. С.116.

③ Там же. С.29

④ 合并为彼尔姆边疆区。

⑤ 合并为勘察加边疆区。

⑥ 合并为外贝加尔边疆区。

⑦ 参见：Goode P., “The Push for Regional Enlargement in Putin’s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2004, vol.20, N3, pp.219-257.

第三，2001年根据总统办公厅提议，划分中央和地区在一些共同管辖领域内的权限。根据俄罗斯宪法第72条，共同管辖的领域涵盖从教育到生态共26个对象，但是中央和地区在90年代对此就有着严重分歧。从本质上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区，都想把决策和财政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但中央和地方又都没能制定出相互配合的政策：这里出现了所谓的“共同决策陷阱”（joint decision trap）^①。普京办公厅副主任德米特里·科扎克（Дмитрий Козак）所领导的委员会，提出并在国家杜马通过了一个十分详细的划分中央和地区、地方在所有共同管辖领域权限的计划，这一方案清楚地分配了所有责任范围，并明确了提供财政支持的级别。如，规定在教育领域，中央负责高等教育，地区负责中等教育，而儿童学前教育由市政府负责。然而，这套设想的改革方案，碰到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不平衡的问题。地区之间的这些差异，包括资源潜力、人力资本等，早在苏联时期就已形成^②，并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继续扩大，使得地区管理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③。尽管中央尝试过推行地区间财政均衡政策，但没有成功。于是在2000年代中期采取新的措施，意图促进那些经济最成功和最有前景的地区加速发展，希望通过它们的成就，保证对其他地区生产生活的支持。

俄罗斯地区政策的另一个问题是，联邦中央内部对政策的观点不一致：总统办公厅所提出的制度调整与财政部立场相左。后者希望将财政资源集中到中央，并部分恢复苏联时期“自上而下”的通过中央划拨、为地区和地方预算提供财政支持的“扇形”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部门在2000年代的冲突，无论在体制性方面，还是参与者的动机，都与1864—1905年财政部和内政部在土地改革问题上的对立如出一辙^④。在政府对类似冲突不进行政治问责的情况下，最终发言权在国家元首，但总统出面解决，也只限于当冲突达到其关键政治日程的时候。然而，在2002—2003年，划分中央和地区管辖范围的问题，就其重要性而言，还没有达到克里姆林宫日程表的关键点。因此，完全实现科扎克计划所必须的对税法和预算法的修正，进而改革预算关系，在财政部的阻力下，只在局部方面进行，且效果有限。

① 对该问题的理论分析，参见：Sharp F., “The Joint Decision Trap: Lessons from German Federal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88, vol.66, N3, pp.277-304.

② Дмитриева, О.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диагностика.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экономики и финансов, 1992.

③ Григорьев Л. «Глобус России»: экономик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2005 // www.polit.ru/lectures/2005/06/28/grigoriev.html. (доступ 15 августа 2008); Хэнсон Ф. Федерализм с российским лицом: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неравенство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бюджеты, в: Н.Петров (ред.).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2000-2004. т.2. Стратегии, институты, проблемы. М.: МОНФ, 2005, С.436-464.

④ 参见：Pearson T., “Ministerial Conflict and the Politics of Zemstvo Reform, 1864-1905”, in: A.Evans, V.Gel'man (eds.), *The Politic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Russi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4, pp.45-67.

但是，国家杜马在 2004 年通过了实施科扎克计划所必需的法律修正案，改变了国家承担的一系列社会责任拨款，并将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到地区和城市身上。正是这一揽子著名的联邦法 122 号修正案，把给予俄罗斯公民（退伍军人、残疾人及其他人）的社会补贴货币化。然而，由于错误地计算了补偿金的数目，以及效率低下的支付程序，这个修正案自 2005 年初生效以后，在一些地区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抗议。中央在向地区划拨大量的资金之后才将抗议平息。本文不能对该领域政策详加叙述，但应该指出，中央和地区权限划分的失误，是政策失败的部分原因，而这方面的改革在 2005 年之后也被冻结。

第四，尽管受到了右翼力量联盟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党团的抗议^①，国家杜马还是在 2003 年通过了科扎克委员会所提出的新联邦法案《地方自治法》。该法体现了 1890—1892 年反地方自治改革（Земская Конгрессреформа）的精神，对地方自治实行事实上的国有化。地方自治法不仅改变了市镇权力的组建程序，将市镇机构划分为几个级别，并改变了市镇的界限。该法还极大地提高了市镇的数量，每个市镇有自己的预算、财产和权力。至 2005 年年底，俄罗斯共有 24079 个市镇机构，而 2000 年只有 12215 个——几乎翻了一番。根据新法，俄罗斯的市镇包括拥有不同地位和权限的几类：19769 个农村居住点（人口不少于 1000 人的居民点）、1773 个城市居住点（中小城市）、1780 个市镇区（包括城市和农村居住点）和 521 个城市区（大城市）。此外，在两个联邦直辖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建立了 236 个市内的市镇机构。^②

新法列举了由不同市镇机构负责管理的问题清单（从托管和监护到垃圾清理）。同时，一些最费钱的任务，从地方自治机构身上卸下来，如对学校和医院的财政支持。然而，在一些专家看来，这样的规定，会使地方自治中的最重要政治和经济问题变得更加严重^③。地方财政政策依赖于地方自治收入，而收入又直接取决于市镇的支出义务规模。这里的重点没有放在加强市镇的收入基础和保证其经济自治上面，而是放在恢复苏联时期既已存在的“自上而下”的预算分配体系上，在这种体系中，地方预算的平衡几乎完全靠上级权力机关的资助和补贴来实现。这一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国家整个中央财政集权政策的结果。其他的调节地方财政的政策工具是，市镇间的预算对齐：人均收入相对较高（所在地区平均水平两倍以上）的市镇的资金，被归公用来资助同地区收入更低的市镇。

① 详见：Либоракина М. Атрибут вертикали власти или основа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е право: Восточ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3. N3. С.144-151.; Макаркин А. Мэры: борьба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Pro et Contra. 2007. т.11, N1. С.19-29.

② 数据引自：Муниципальная власть. 2005. N3.

③ Пузанов А., Рагозина Л. Отчуждение местной власти// Pro et Contra. 2007. т.11. N1. С.72-84.

在地方权力组建方面，联邦法清楚地规定了市镇议员的数量和地位，同时把决定地方政权组建机制的权力留给了地区自己。这涉及到区一级的代表机关，其组成不仅是由全民选举产生，同时还应吸纳该区的市镇领导人和议员。该法还规定了地方自治行政机关的组建程序。法律规定全民选举市长，同时规定通过与地方自治代表机关签署协议的方式，聘任区和市的管理者（“城市管理者”）。这些管理者的候选人应该由地区政府推荐，这降低了市镇的政治和经济自治水平。

2006年，国家杜马曾积极讨论过将地方自治的部分职能移交地区政权并取消城市区的地方自治权的法案（地方自治应当在市内的区一级实行，而城市的管理整体移交给地区政府）^①。但是这些提议没有得到支持，主要是遭到了市长们的反对，他们得到了欧委会地方和地区权力大会的支持。^②同样，“统一俄罗斯”党多次提出完全取消市长全民选举的建议^③，但最终中央采取任命城市管理者的方式，来取代选举出的市长。到2007年上半年，这一政策在俄罗斯近三分之一的市镇实行，但在大多数地区没有获得全面推广，而在某些情况下还遭遇了极力的反抗^④。

实际上，地方自治法旨在将解决地方层面上问题的责任推到市镇机构身上，而不是创造条件来使问题得到解决。在执行这一法律的过程中，既发生了高额的实施费用（涉及到建立新的市镇机构，改变它们的边界，改革地方财政等），也出现了上面提到的财政部和地区之间没有解决的预算关系问题。新法的生效时间首先被推迟到2006年初，然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领导人，都不关心它的全面实施。最终，国家杜马在2005年年底允许地区独自确定所辖市镇改革的期限（最后期限延长到2009年年初）^⑤。这一延搁只是加重了俄罗斯市镇的问题：地方自治机关仍然承担一系列任务的重负，并执行一部分国家职权，但在财政上依靠预算拨款，没有足够的资源^⑥。结果造成地方自治机构在居民中间的威信（与联邦和地区权力机关相比）和重要性，直到今天也不高。目前，几乎所有的观察家一致对俄罗斯地方自治的现状给予负面的评价。

总的来说，第二阶段的联邦改革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中央的政策没有得到全面连贯的执行^⑦。2000年形成的支持中央再集权政策的意识形态联盟也已经瓦解。虽然

① Макаркин А. Мэры: борьба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Pro et Contra.2007. т.11.№1.С.19-29.

② Gel'man V., Lankina T., pp.40-62.

③ Макаркин А. Мэры: борьба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Pro et Contra.2007. т.11.№1. С.19-29.

④ Пузанов А., Рагозина Л. Указ. Соч.С.72-84.; Gel'man V., Lankina T., pp.40-62.

⑤ Lankina T., "New System Weakens Municipalities", *Russian Regional Report*, 2005, vol.10, N17, 18 October.

⑥ Пузанов А., Рагозина Л. Указ. Соч.С.72-84.

⑦ 批评性分析参见: Chebankova E., "Putin's Struggle for Federalism: Structure, Operation, and the Commitment Problem", pp.279-302.

中央成功实现了第一阶段联邦改革的大部分目标，但是对中央再集权的社会需求消失了。社会各界对执行这一政策的呼声已不明显，而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则将它视为对 90 年代民主成就的威胁。对中央而言，地区政策也不再具有首要的意义，中央更关心的是保持现状而不是进行新的改革。这里的悖论是，中央再集权政策起初的成功，却妨碍了进一步的有效推行。

在这一背景下，有关废除地区行政长官全民选举的决定，于 2004 年秋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被通过，成为中央再集权政策的合理结局。虽然从管理效率角度来看，这一结局没有带来什么变化，但其政治后果却是完全可预见的。首先，中央可以将地区政治的不确定性（由不可预知的竞争性选举结果所引发的）降至最低，因此降低了自己的成本。在提高地区立法机构政治分量的同时，削弱被任命的行政长官，从而巩固了“统一俄罗斯”党在地区的地位。这方面的例证是 2005 年秋通过了一项决定，规定由赢得地区选举的政党提名地区领导人候选人。这样，“统一俄罗斯”党在 2007 年前就占据了几乎全部地区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①。但中央和地区人事方面的关系并没有大的改变，多数地区的行政首脑仍被任命留任^②。采取这样的政策，不仅是因为中央缺少管理地方的人才储备，最主要的是中央想回避风险，因此需要保持与地方关系的现状，同时让被任命的行政长官承担所辖地区事务的全部责任。最终，俄罗斯的中央再集权政策在 2005 年前完成。除了联邦对北高加索各民族共和国政策中没有解决的问题^③，俄罗斯其他地区在政治、经济和行政上完全听命中央。但是“新中央集权”究竟给俄罗斯政治带来了什么？

四、“新中央集权”：成本和收益

乍一看来，中央再集权政策的结果，是实现了“垂直政权”支持者们建立（重建）“好的”苏联的梦想。地区和地方自治被控制取而代之；选举竞争的不确定性也消失了，这不仅是因为地区选举的不公正，还与行政长官选举制的取消有关；地区权力机关被纳入全俄等级管理体制中，而地区市场在很多方面成为由政府管理的、以天然气工业公司为首的集团公司的一部分。2000 年代中期，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管理职能，俄罗斯地区行政长官更类似于苏联时期的苏共州委第一书记。

可以将俄罗斯现今的区域政策与苏联时期的地区和地方自治实践^④进行平行比较。像 30—40 年前一样，俄罗斯地区和城市由中央任命的官员管理，但在形式上得

① Голосов Г. Указ. Соч. С.22-35.

② Титков А. Кризис назначений// Pro et Contra. 2007.т.11.№4-5.С.90-103.

③ 对于这些问题需要单独分析，不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之内。

④ Hough J., 1969.

到了地方精英的支持。和以前一样，这些官员们解决的最重要的经济任务是，保证区域发展和从外部吸引资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正式游说中央的能力。他们在地区内外政治回旋的能力，受到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团体结构、以及地区和城市层面的“地方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的影响。研究人员所指出的，按照“国家社团主义”模式，建立地区（地方）权力机关与经济活动者之间关系^①的趋势，距离杰里·哈夫在 1960 年代的所描绘的图景并不遥远^②。虽然“统一俄罗斯”不是苏共统治的化身^③，以天然气工业公司为首的集团也很少使人想起苏联主管机关的蛮横，而州长和市长也不是（至少现在不是）“后苏联省长”，但是联邦和地区制度的非竞争性、经济的垄断性（如今不是建立在中央计划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资源的获取上），从中可以看出很多重要的（与苏联时期）相似之处。此外，今天俄罗斯的地区威权制度，也受到委托—代理关系问题的影响，他们的先辈在苏联时期也有这样的问题。像在苏联时期一样，中央也试图最大限度地降低控制地方精英的成本，采取相对便宜，但并不十分有效的手段，如在地方游说集团间重新分配好处，以及有选择地寻找“替罪羊”进行惩罚，而这样角色越来越经常地由市长承担^④。目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占据优势地位的“统一俄罗斯”党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将资源分给那些效忠于它的地方领导人来控制（在北高加索的民族自治共和国尤其如此，主要是车臣和印古什），使得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一政策的经济基础，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央和地区（地方）权力机关之间政治性的资源互换，这种互换在“政治商业周期”模式中进行，其显著的特点是，联邦中央拨款的对象不是公民，而是地区和地方精英^⑤。

中央取消州长选举制的决定，不仅仅是当时形势的结果（如，宣布将联邦改革作为中央对 1990 年代危机的应对）。相反，这是为了巩固全国和各地区正在形成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战略性的一步。中央在政治和经济中建立（重建）非竞争性制度

① Петров Н. Корпоративизм vs регионализм. С.75-89.; Яковлев А., Фрай Т. Реформы в России глазами бизнеса // Pro et Contra. 2007. т.11. N4-5. С.118-134.

② Hough J., 1969.

③ Gel'man V., "Party Politics in Russia: From Competition to Hierarchy",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60, N6, pp.913-930.

④ 参见：Медведев Ю. Люди оп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ии. 3 апреля. 2008 // <http://www.5-tv.ru/news/story/print.php?newsId=9549>. (доступ 15 августа 2008). 仅仅在 2006-2007 年，在俄罗斯对十个地区首府城市的市长提起了刑事诉讼，而在这一期间对数十个城市地方自治机关的一百多名领导人追究了刑事责任。大多数罪名是在所有权和金融方面滥下命令，惩罚的结果是象征性的或者刑事处罚，停止国家或者市镇的公务职务（Медведев Ю. 2008）。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旦发生了针对“统一俄罗斯”党成员的刑事事件，他们也同时被公开开除出党。

⑤ Стародубцев А. Модели реализац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России (1992-2006 гг.), рукопись.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2008.

环境的举措，使得垄断性的地区政治制度和地区“封闭市场”保留原状，而这些在竞争的环境下很难存在（如在 20 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城市中的地方“政治机器”）^①。相反，所有这些都成功地纳入“新中央集权”体系：在中央再集权政策（被称为是俄罗斯地区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方针）的背后，是对保护—被保护关系的加深，这种关系在 1990 年代的俄罗斯地区和城市红极一时^②。实行地区行政长官的事实任命制度，实际上意味着中央和地方领导人新一轮的“讨价还价”。这一轮的任务是解决精英间相互义务的问题，这个问题曾阻碍“统一俄罗斯”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主导性政党^③。制度的变化也对地方领导人的行为产生了新的影响，迫使他们效忠“统一俄罗斯”党，同时又剥夺了他们先前向不同政党和非政党组织进行多样化政治投资的能力^④。因此，无需对 2007 年杜马选举时 85 位地区行政长官中 65 人进入“统一俄罗斯”党名单感到惊讶^⑤，虽然在 2003 年杜马选举时还只有不到一半的地区领导人进入这一名单^⑥。从中央方面来看，中央尽最大努力留用原来的地区领导人^⑦，也仅仅是为了换得他们在联邦选举中为中央争取选票的能力。因此，尚不能肯定“取消州长选举将导致地区选举机器效率降低和衰败”的预测^⑧。在 2007—2008 年的联邦选举中，使用了各种手段控制地方选举过程，有时甚至以损害地区和地方管理的效率为代价，保证了中央先前任命的地区领导人存活下来。^⑨ 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按照“留任换选票的原则”^⑩达成的政治妥协，成为俄罗斯政治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① Brie M., “The Moscow Political Regime: The Emergence of a New Urban Political Machine”, in: A.Evans, V.Gel'man (eds.), *The Politics of Local Government in Russi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4, pp.203-234.

② Афанасьев М. Клиентелизм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М.: МОНФ, 2000.

③ Reuter O.J., Remington T., “Dominant Party Regimes and the Commitment Problem: the Case of United Russia”.

④ Голосов Г. Указ. Соч. С.22-35.

⑤ Gel'man V., “Party Politics in Russia: From Competition to Hierarchy”, pp.913-930.

⑥ 详见：В.Гельман.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артийной системы: от конкуренции – к иерархии, 2008 年 9 月提交给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会议的报告。

⑦ Титков А.. Указ. Соч.С.90-103.

⑧ Лихтенштейн А. Федерализм и «парти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е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электораль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в: В.Гельман (ред.). Третий электоральный цикл в России, 2003-2004.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2007, С.242.

⑨ 代表性的例证是，在中央看来，在 2007 年杜马选举前夕的萨马拉州和在 2008 年总统选举之后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和梁赞州，在选举上不够忠诚，所以出现了行政长官的更换。

⑩ Голосов Г. Указ. Соч.С.33.

尽管俄罗斯目前经济的持续增长^①似乎会在客观上助长大规模的地方分权（包括财政领域）^②，但实际上，国内发生的进程却与之相反。更确切地说，是对 2000 年代后半期中央再集权趋势的继续加强。关于这一点，有许多方面的表现。首先，中央试图统一调整公共服务定价而不把这些问题交由地区解决。其次，中央还提出实行地区间预算平衡制度（“回拨”），将财政资源从“富裕”地区分流向“贫困”地区。再次，中央对高度依赖补贴的地区进行临时财政管理。最后，通过新的《矿产资源法》，明确矿产资源只归联邦所有，并取消地方政府批准和监管自然资源产地开发的权力。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步骤。^③ 这些措施部分是由俄罗斯“政治商业周期”的形势所决定的。在 2007—2008 年联邦选举前夕，中央希望扮演地区及其选民福祉主要提供者的角色，借此保证投票结果如己所愿^④，而不受选民倾向左右的州长们却没有这样的动力。但是，除此类短期效果外，也应该指出俄罗斯中央再集权政策中的一些长期因素。这些因素与国家发展中日益突出的“资源诅咒”问题密切相关。随着俄罗斯对能源出口的依赖不断增强，俄罗斯的精英们越来越希望集中能源收益，这样，又进一步增强了中央集权。因此，有理由认为，俄罗斯管理的中央再集权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继续。

“新中央集权”对俄罗斯政治转型有什么后果呢？大体而言，能够带来了一些直接的好处（降低地区内部管理的交易成本），但同时提高了中央的监控费用。地区制度设计的统一，明显地减少了地区政治制度和管理体系的多样化。如果说在 1990 年代，按照一位分析家的说法，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是“从无拘无束的汗国到可汗大本营”^⑤，那么在 2000 年代中期，各地区（按照韦伯的官僚制合理性的说法）达到了规则与程序的统一。但这种整齐划一，不是靠提高一些名誉不佳的地区（如巴什科尔托斯坦或卡尔梅克）的政策和管理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实现的，而是将新的“游戏规则”无一例外地强加给所有地区，不管结果如何^⑥。据莫斯科卡耐基中心的专家评估，2001—2005 年俄罗斯地区民主进程的质量下降（首先是选举质量），就是由

① 编者注：金融危机之前的俄罗斯经济形势。

② Davey K., *Fiscal Autonomy and Efficiency: Reform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Budapest: Local Government and Public Service Reform Initiative, 2002.

③ 但是在实践中，这些规定的相当大的部分只是部分地实现了，或者停留在纸面上。

④ Щербак 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и итоги думских выборов 2003 года, в: В.Гельман (ред.). Третий электоральный цикл в России, 2003-2004.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2007, С.196-216.

⑤ Афанасьев М. От вольных орд до ханской ставки// Pro et Contra. 1998.т.3.№3. С.5.

⑥ 部分参阅：Кынев А. Переход к смешанным выборам в регионах: «принудитель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32-40.

于那些此前最公开和最有竞争力的地区的平均指标下降造成的^①。毫无疑问，地区政治进程对选民倾向的依赖，也无法保证地区管理的效率^②——相反，政治商业周期、竞选中的平民主义和经济利益集团^③对政府的“俘获”^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俄罗斯地区的固有现象。但州长对选民的独立，使其对提高地区管理效率更加缺乏动力，因为是联邦政府，而不是选民对地区政府实施监控。所以，中央的此类举措遭到市场改革的支持者们相当严厉的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⑤。

与此同时，中央自身在新条件下找不到集中管理地方的有效方式。中央既不能评价地区管理的绩效（正如经验所示，无论是总统全权代表还是地区发展部都无法完成这些任务），也缺少改善局势的有效工具（除人事任命以外）。因此，摆在中央面前有两条路：或者采取投入大回报小的措施，以保证最麻烦地区的可控性；或者被歪曲的信息所左右（地区权力机构和联邦部委地区机构，为了自身利益，扭曲信息）。这导致大规模地滥用权力，并使得很多地区重新变回由州长擅自管理的“领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中央通过刺激地区间（代理人间）的竞争，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另外，经济发展也能促使地区间相互竞争以吸引包括外资在内的投资^⑥。然而，如果不考虑地区经济的结构特点和它们的地理位置，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中央仍是地区各种经济福利的主要来源，而中央的决定（像在苏联时期一样）经常由政治利益决定，而不是出于对有效性的考虑。^⑦

从更广的意义上讲，非竞争性的政经环境促使地区精英和中央进行非正式的“讨价还价”，由此，信息的不对称性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得到加强。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其他机制——主要是“政权党”“统一俄罗斯”，通过渗透到所有管理层级来实现——目前还没有给中央的地区政策和管理带来大的收益。克里姆林宫基本上是想依靠政党机制而不是人员机制来维护在全国和地区的统治，这是一个完全合

① Петров Н. Демократичность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Брифинг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центра Карнеги.2005.г.7. N9.

② Konitzer A., *Voting for Russia's Governors: Regional Elections and Accountability under Yeltsin and Puti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5.

③ Афанасьев М. От вольных орд до ханской ставки.С.5-20.; Зубаревич Н. Указ. Соч. С.107-120.; Петров Н. Корпоративизм vs регионализм. С.75-89.

④ Hellmann J.,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World Politics*, 1998, vol.50, N2, pp.203-234.

⑤ Полищук Л. Реформа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в региона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в: Л.Лимонов (ред.). Актуаль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России. СПб: Леонтьевский центр, 2005, С.166-179.

⑥ Там же. С.175-176.

⑦ 如，1970年代在一个落后的城市乌里扬诺夫斯克大规模发展汽车和航天工业，主要是出于苏联想在列宁的家乡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窗口”的考虑。参见，Gel'man V., S.Ryzhenkov, M.Brie, 2003. 同样，在2000年代中期，俄罗斯建立丰田汽车组装生产企业，不是在下诺夫哥罗德（最初计划在这里，因为这里有大型的果戈理汽车厂生产基地），而是在圣彼得堡城郊的空地上建立，这成为普京家乡的“市场窗口”。

理的、很可能成功的战略。^①但“新中央集权”成本和利益之间的平衡至今仍不明朗。

五、结论：刚跳出火坑，又掉入滚汤？

作为总结，应该指出的是，2000年以来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转型，可以用“刚跳出火坑，又掉入滚汤”来加以描述。俄罗斯中央再集权政策的进程与结果，是由“新中央集权”和重建“垂直权力”的思想决定的。在苏联解体后的1990年代，俄罗斯国家遭受了严重的裂变，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些趋势，用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来评价毫不为过^②。2000年代的俄罗斯形势又使人想起了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由于恢复了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和分配能力，国家的裂变得以停止并有所好转^③。丧失监控杠杆长达十年的中央，得以恢复对地区的统治，站到了地区的上方并把它们全部吸收，就像那个著名插图上的利维坦。但是，与霍布斯模式不同的是，这里说的不是在社会条约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代表国家主权，而是执政的克里姆林宫集团在“零和游戏”中的胜利，并由此巩固了“自上而下”的体系，其基础是精英间、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强加的共识”^④。1990年代那个支离破碎和孱弱的中央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2000年代一个拥有足够的行政能力、并足以为地区制定“游戏规则”的中央。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家较低的自治程度、法权至上的缺失，以及俄精英处心积虑获取资源收益的倾向，正在把俄罗斯变成一个掠夺型国家（predatory state）^⑤，这样的国家，不过是执政集团的政治工具。俄罗斯国家的所有这些特征，对俄罗斯政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新挑战，包括地方政策在内。中央成功地把地区自治最小化，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中央能否利用这一资源更成功地发展国家，或者仅仅是为了私人的利益重新分配权力和所有权。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我们也无法知道，其他可能的“新中央集权”形式在1990—2000年之交，能否给俄罗斯政治发展带来更好的结果。假如在1999年的杜马选举中，地区联盟“祖国—全俄罗斯”战胜“统一俄罗斯”党，那么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可能会继续地朝着去中央化的趋势发展，中央的行政能力也未必会像今天这样。那样的发展模式对俄罗斯来说，可能比“新中央集权”潜在的危险要更

① Gel'man V., "Party Politics in Russia: From Competition to Hierarchy", pp.913-930.

② Volkov V., 2002.

③ Taylor B., "Putin's State Building Project: Issues for the Second Term", *PONARS Policy Memos*, 2003, N323. https://gushare.georgetown.edu/eurasianstrategy/Memos/2003/pm_0323.pdf (access 15 August 2008).

④ Gel'man V., "Russia's Elites in Search of Consensus: What Kind of Consolidation?", pp.29-50.

⑤ North D.,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W.Norton, 1981.

大^①。但也不应据此认为，中央在 2000 年代在中央再集权道路上的政治决定（特别是对联邦委员会的改革、《地方自治法》的通过、州长选举制的废除等方面），完全是由 1990 年代的事件发展决定的。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用苏联的方式解决后苏联问题”^②之所以成为可能，一方面是由于联邦精英间竞争的消除，使得克里姆林宫垄断了政策的制订；另一方面，也是国家领导人的理想和政治理念的结果。因此，只要这两个条件没有改变，同时外在因素（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也无法迫使中央去改变自己的方针，那么俄罗斯的中央再集权政策就很难发生根本改变。

俄罗斯上世纪 90 年代的去中央化，是俄罗斯国家及其地区对苏联解体和市场经济改革这样大规模进程的病态反应，其症候是新俄罗斯国家长期的“发展病”。2000 年代的俄罗斯似乎痊愈，但是药剂有时比病症本身还糟糕，它可能成为潜伏慢性病的原因，而且威胁更大。对于俄罗斯来说，这种威胁来自于克里姆林宫的总体政策，也包括中央再集权政策。未来几年将会证明，俄罗斯中央这一“新利维坦”，是会成为俄地区稳定有效发展的源泉呢，抑或只不过是带来了需要下相当大力气去解决的新问题。

（郝薇薇 译）

【Abstract】 What are the source, basic concepts and interests of Russia's re-centralization policy? How do these factors affect its process and results? What is the meaning of Central re-centralization policy for Russi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o what extent? What are the prospect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first giv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regional trends under the context of Russian reform from 1990 till 2000; then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concept and interests of each political force during the re-centralization process since 2000 and its influences o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reform policies, which can be called as "new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different from "old" centralization during the Soviet-era). Then,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new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Russian State reform process.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meaning of central re-centralization to Russian political system.

【Key Words】 The Policy of Recentr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New Centralization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регионализация, Новый централизм

（责任编辑 肖辉忠、郑润宇）

① Голосов Г. Указ. Соч.С.22-35.

② Stoner-Weiss K., Resisting the State: Reform and Retrenchment in Post-Soviet Russia, 2006.

中俄关系

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的合作与中俄关系

黄立菲*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合作的历史、合作规模、合作模式以及对中俄关系发展的影响。考察了20世纪初旅俄华侨组织的维权活动,20—40年代哈尔滨、上海等地俄侨的文化教育活动,民国时期诸种苏联研究会的研究宣传活动,新中国时期中苏友协对苏联全方位的宣传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中、俄民间组织在两国经贸、文化、教育、学术等诸多领域的活动。认为,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合作大体上有“民间组织合作”和“民间组织+官方”两种基本的合作模式。就合作规模而言,世纪初可谓涓涓细流,50年代掀起大潮,60年代跌入低谷,90年代以后呈现多领域、多层次稳定合作的发展态势。20世纪中俄民间合作内容异彩纷呈,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补充——在政治领域,发动群众实施国家大政方针,延长了国家的手臂;在经贸领域,依靠民间力量排除一些国家暂无力顾及的障碍因素,成为国家的帮手;在文化、科学、教育等领域,利用民间组织决策及活动灵活的优点,成为两国交往穿针引线的巧手。20世纪中俄民间组织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民间组织合作潜力巨大,可以大有作为。

【关键词】中俄民间组织 合作历史 合作规模 合作模式 中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4-0094-(13)

本文研究的民间组织,是指正式的、合法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自愿参加、自主活动的组织。^①在学术界亦称“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或“非商业组织”、

* 黄立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副会长。

① [美]莱斯特·萨拉蒙等著:《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陈一梅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第三部门”（第一部门指国家，第二部门指市场）、“公民社会”组织等^①。由于目前中国对这类组织使用“民间组织”的称谓，因此本文采用“民间组织”这一概念。

由于中国东北边疆与俄有绵延数千公里接壤，俄西伯利亚与中国边境阡陌相连，两国居民很早就有了密切的交往。进入 20 世纪以来，中俄民间组织之间的活动，成为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交往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百年，参与中俄/苏民间组织合作的主要有四类社会团体：第一，中国国内以俄罗斯/苏联为对象的社会团体；第二，旅俄华人团体；第三，在中国的俄侨团体；第四、俄罗斯/苏联国内以中国为对象的社会团体。由于资料有限，本文仅考察前三类民间组织的活动，第四类民间团体的活动及其对中俄/苏关系的影响，则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与研究。

一、20 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中俄民间组织合作的历史概述

（一）世纪初：旅俄华人团体维权活动

从 20 世纪初起，由于中俄两国经济、政治发生重大变迁，两国民间交往有了新的发展，并出现了适应这种发展的民间团体。20 世纪初，已有华人到俄经商、留学，而中国东北边陲地区出现了“闯崴子（指‘海参崴’）”。身体强壮的华人劳工在俄筑路、开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俄资本家剥削和压榨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 20 万华工被征募到欧洲战场充当炮灰，其中有数万人留居俄国，成为旅俄华侨的基础。其中部分华侨参加了十月革命，有的华侨成为列宁的卫兵。^②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在俄罗斯彼得堡综合大学等高校留学的华侨刘泽荣联络留学生和华侨成立“中华旅俄华侨联合会”，被选为会长；十月革命后，由旅俄华侨联合会负责，共遣送数千名华侨归国。1918 年底，“中华旅俄华侨联合会”改名为“驻俄华工联合会”，刘泽荣仍任会长，还曾创办《驻俄华工大同报》，送给参加苏联红军的中国战士和华工阅读。^③1919 至 1920 年期间，刘泽荣受到列宁的三次接见，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教诲并向列宁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为共产国际和从未到过中国的列宁指导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帮助。^④除驻俄华工联合会以外，苏俄新经济政策时期建立了旨在维护旅俄华人权益的团体“华人协会”。^⑤

① 俞可平主编：《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7 页。

② 倪迅、翟伟：“搭起共产国际与中共建党的桥梁”，《光明日报》，2001 年 7 月 8 日。

③ 《黑龙江历史名人——明清至建国前》，www.univ.cn/newweb/univ/hljit/test/SYYJ/2006-04-20/597348.html - 24k.

④ 倪迅、翟伟：“搭起共产国际与中共建党的桥梁”。

⑤ И.Н.Ильи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в 1920-е годы. М., 1999., С.114.

（二）20-40 年代：哈尔滨俄侨团体活动促进了哈尔滨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上海俄侨团体活动——上海国际艺坛的半壁江山

20 世纪 20-40 年代，在中国的俄侨社会组织与中国民间的交往，在中俄民间组织合作中占有显要位置。

19 世纪末以后，受到俄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大量俄罗斯移民来到中国。

哈尔滨俄侨与中国民间交往最为活跃。根据 1896 年签订的“中俄密约”，俄获得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受政府派遣，俄技术人员携家眷大量迁入中国。日俄战争爆发后，一批发战争财的俄商涌入中国。十月革命后和苏俄国内战争时期，俄旧贵族、工商业主、官员、知识分子、白匪等逃亡到中国。1920 年代，在哈的俄侨数达到顶峰，约有 20 万人，哈尔滨亦被称为俄侨的“首都”。在哈的俄侨主要有三种移民类型：政府派遣型迁移、谋求生路自愿型迁移，逃避打击流亡型迁移。主要职业类型有：文职人员、经营人员、医护人员、私营业主、工人、店员杂役及雇佣人员、神职人员以及其他谋生者。出于谋生和交往的需要，这些俄侨成立了众多社会团体。主要的非政治性社会团体有：史学考古专业学术团体、苏联侨民会、东北红十字及半月协会、自然科学及人类学爱好者协会、苏联青年联盟、东北渔猎公会等。^①

俄侨到哈以后，在文化教育领域活动积极。创办俄文杂志 224 种，出版书籍 512 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历史、考古等。俄侨兴办俄人教育，其中一些学校，“亦招收与俄国学生享受平等待遇的中国孩童”^②，如当时俄侨的男子、女子中学，男女商务学校，华俄工业学校等都招收中国学生。这些中国学生在俄侨学校接受了体现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精神以及学以致用西方教育，很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佼佼者。^③“俄侨文化活动促进了哈尔滨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俄侨从事的文化教育活动，使西方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音乐、戏剧、美术等得以在哈广泛传播。同时一些俄侨运用西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宗教、艺术等方面进行研究，有些人后来成了著名的汉学家，面向世界发表了一些论文，有助于西方国家了解中国。”^④

早在 1860 年代，就有零星俄茶商在上海居留。19 世纪末起，上海俄侨人数开始增加，但到 1895 年亦只有 28 人。1922 白俄在俄远东地区反对苏维埃政权彻底失败后，一支败兵南下溃逃，侨居上海，加上其它原因，上海俄侨人数迅速增加。不过，

① 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586 页。

② 李兴耕等著：《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年，第 344 页。

③ 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第 585—586 页。

④ 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第 605 页。

上海俄侨总人数不多，据 1947 年的统计，共有 16000 人。

俄侨在上海的生活稳定以后，展开了文化、教育、学术诸多方面的活动。据研究上海俄侨史的专家汪之成先生不完全统计，上海俄侨创办报刊 24 种，杂志 27 种，开设书店、图书馆 18 种，成立文艺团体 12 个。俄侨在绘画、音乐、戏剧、芭蕾舞、造型艺术等领域积极活动。以俄国歌剧为例，1934-1940 年在上海共演出 235 场。1930 年代中期，俄罗斯文化在上海文艺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进入了极盛时期，俄罗斯文化活动成为上海国际艺坛的半壁江山。^①上海俄侨在社会领域亦积极活动，成立了慈善组织 25 个^②、青年、学生、妇女组织 5 个，同乡会 10 个，学术团体 5 个、俱乐部 8 个。上海俄侨团体虽然大多是面向俄侨活动的，但是其文艺团体在上海社会公开演出，时常出现一票难求的盛况，对在上海传播俄罗斯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0 年代，上海俄侨与中国人进行交往，中俄文化、学术研究产生了互动和合作。例如，随着大批哈尔滨俄侨学者移居上海，越来越多的俄侨对认真研究东方学产生了兴趣。从哈尔滨东方学研究所毕业的一批学生，1935 年 12 月初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俄国东方学者协会”。该会的主要宗旨，是研究东方学，在远东俄侨中传播东方学知识。^③

（三）民国时期：对苏民间团体的研究与宣传

民国时期，中国国内成立了多个具有官方色彩，以研究苏联和加强沟通为宗旨的民间学术团体。1932 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以后，为了得到苏联对抗日战争的支援和借助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力量压服中国共产党放弃推翻国民党政府^④的目标，也很重视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其间，由国民党政府出面或由政府要人、著名学者出面，组织了关于俄罗斯问题的研究会，创办了专门刊物，并出版丛书。重要的研究会和刊物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所建学会专门介绍苏联问题及中苏关系，全面阐述国民党政府的对苏政策。如于 1930 年在南京成立的俄事研究会，同年 2 月 25 日创办了《俄罗斯研究》月刊。《俄罗斯研究》杂志是国内唯一一份专门介绍苏联问题及中苏关系的刊物，其中一些文章对苏持批判态度^⑤。第二类，以俄罗斯地区和边疆为对象，进行介绍并研究，为战事服务。如 1930 年创刊的《新亚细亚月刊》以及 1932 年由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主持成立的新亚细亚学会，其宗旨之一

① 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年，第 603-604 页。

② 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第 487 页。

③ 汪之成：《上海俄侨史》，第 527-528 页。1947 年 6 月苏联政府发布召侨公告，大批俄侨开始回国，或相继去美国、巴西、欧洲等国移民。在华俄侨人数迅速下降。以哈尔滨为例，至 20 世纪 80 年代，苏侨和无国籍者（未加入苏联国籍的俄侨）仅有 57 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独特的俄侨篇章结束。参见：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第 95-98 页。

④ 1931 年“9.18 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0 月成立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并于 1932 年 4 月发布抗日和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宣言。

⑤ 徐景学、王晓菊：《西伯利亚学与中国》，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72-273 页。

就是加强对亚细亚的研究。该月刊发表的文章、资料中，许多涉及苏联、中苏关系、苏联东部地区。1941年2月成立了中国边疆学会，其重要宗旨之一，是研究中国北部边疆的变迁及同俄国的复杂关系。学会出版《边疆周刊》并编辑《中国边疆学会边疆丛书》，丛书的许多内容涉及俄西伯利亚地区。

民国时期中苏民间组织合作活动中，最典型的是1935年由张西曼与一些留苏学生在南京创办的民间团体——中苏文化协会。该协会具有官方性：该会会长为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时任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Dmitri Bogomolov）任名誉会长，张西曼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任常务理事。1937年12月中苏文化协会迁移至重庆，并于1938年12月召开第二届年会及理事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会长、吴玉章等25人为常务理事，在全国各省城（国民党统治区）及延安等地设有分会。^①会员有5万人。^②1946年中苏文化协会迁回南京。

中苏文化协会的宗旨是“研究及宣传中苏文化并促进两国国民之友谊”。

1936年初中苏文化协会于南京主办中苏文化杂志社，出版《中苏文化》月刊，王昆仑、侯外庐等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一些文化名人和官员，如张友渔、阳翰笙、曹靖华、戈宝权等，为该刊撰稿。杂志社还出版研究丛书，如1935年出版顾谷宜著《俄国史纲要》，便是丛书之一。中苏文化协会还编辑出版了《中苏论丛》、《苏联纪行》、《亚洲苏联》、《中苏关系的现在和未来》等研究丛书。^③同时以举办一系列中苏关系问题的座谈会、研究会、展览会、俄语讲习班、讲演会、音乐会、与苏联友人通讯等方式介绍苏联抵抗德国法西斯战争的情况，交流文化信息，鼓舞人民抗战。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应邀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庆祝中苏友好同盟签订大会，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④在中苏文化协会的活动中，作为会长孙科的活动特别突出，他“始终把握团结友邦的立场，以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和《中苏文化》杂志主编的身份全面而及时地介绍了苏联各领域的状况和中苏外交动态，通过协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为促进两国友好邦交而做出了积极的努力。”^⑤协会创办者张西曼以中苏文化协会为阵地，做了大量宣传苏联，促进中苏友好的工作。1936年张西曼翻译出版了《苏联新宪法草案》，1937年又翻译了《苏联宪法》，并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宪法翻译介绍到中国。1939年张西曼与王

① www.xzqjw.gov.cn/xzqjw/News_View.asp?NewsID=2569

② 同上。

③ 徐景学、王晓菊著：《西伯利亚学与中国》，第272-273页。

④ www.xzqjw.gov.cn/xzqjw/News_View.asp?NewsID=2569

⑤ 李玉贞：“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侧面——孙科与中苏文化协会”，《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1期。

昆仑共同主持了中国艺术品送苏展览。^①

俄罗斯官方与民间高度评价中苏文化协会在沟通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友谊合作方面的贡献。俄罗斯前驻华大使罗高寿（Igor Rogachev）在1995年6月致该会创办人张西曼诞辰百周年纪念座谈会的贺信中说：“多年来张西曼以从事加强中国与俄罗斯友谊的事业而在俄罗斯享有盛名。”^②

（四）新中国：中苏民间组织合作的高峰与低谷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最大、对苏友好合作大一统的群众团体“中苏友协”将中苏民间组织的合作推向了高峰。

1950年代，参与中苏民间组织合作的团体主要是中苏友协。1950年代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其中规模较大的群众团体，如工会、妇联等参加了中苏友协，因而，友协成为大一统的对苏友好合作团体。中苏友协是由民间倡议成立的群众性团体，其前身便是1935年建立的中苏文化协会。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沫若等一大批进步民主人士来到北平，积极宣传中苏文化协会的作用，倡议成立中苏友协。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协”正式成立。友协同时又是高度行政化的团体。第一任会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宋庆龄、吴玉章、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黄炎培为副会长。章程规定，友协组织机构设五级：全国总会；大区总分会；省、市、自治区分会；县市支会；乡村支分会。各省市自治区分会会长由当地党委一、二把手担任。195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今后各地友协的工作由当地党委宣传部直接管理，中苏友协总会的工作除对外工作外，均由中宣部直接管理。”中苏友协总会是中宣部的一个直属机构。

截至1955年，成立中苏友协65处，支会119900个，俄文夜校78处。为了全面推动学习苏联，1953年起，启动了发展团体会员的工作，如解放军、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等都以团体会员的身份加入了中苏友协，使“中苏友协成为全国最大的群众团体”。^③

1950年代，中苏民间组织合作掀起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与当时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直接相关。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集中论述了这一方针：“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④中苏友协作为全国最大的群众团体，根据这一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

① 张小曼：“张西曼与中苏文化协会”，《纵横》，1999年第7期。

② 同上。

③ 李文、叶张瑜：“感慨话悠长 人散曲未终——原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张再访谈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④ 1953年2月毛泽东在政协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参见《新华月报》，1955年第3期。

首先，在全国全面介绍和宣传苏联，主要做了六项工作。第一、出版了大量报刊和文字资料介绍苏联、宣传苏联。主办《中苏友好》、《苏联介绍》、《苏联知识》等70多种报刊，编印1820多种，计4600余万册小册子单行本发送到农村和厂矿。1952年《中苏友好》更名为《中苏友好报》，中央批准向国外发行。第二、举办各类介绍苏联的展览会。1954年10月在莫斯科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举办的苏联经济及文化成就展，规模大、样品多，影响深远。展览后来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巡展，一直持续到1956年7月，参观者达到1125万人次。第三、放映苏联电影。截至文革前，共放映四五百部，全国67个大中城市共放映46000多场，观众达4000多万人次。当时放映的影片大多是苏联革命时期、卫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品，如《列宁在十月》、《青年近卫军》、《乡村女教师》等。这些影片给了一代中国青年以深刻的影响。第四、举办俄文夜校，培养俄语人才。第五、广泛举办报告会、座谈会宣传苏联。其中突出的是举办访苏代表团回国后的报告会。截至文革前，全国共举办各种报告会20多万次，听众达1.5亿人次。第六、编印宣传材料，推动基层学习苏联。

其次，是组织一系列重大友好庆祝活动。每逢十月革命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日（2月14日）等，举行庆祝活动。

再次，向苏联介绍中国。解放前，郭沫若在“中苏文化交流”一文中，将两国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比喻为“洪流与溪涧”。为了扩大中国对苏联的影响，中苏友协经常向苏联对外文协和有关文化团体寄赠资料、图书、期刊、照片、唱片、电影拷贝等，1955年创办了俄文《友好报》，在莫斯科发行，每期7万份；多次在苏联举办工农业展览会，组织代表团访问苏联。从1957年起每年与苏联对外文协签订合作计划。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进入冷冻期，友协的境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友协甚至演变为同苏联论战的工具。^①期间，停办了所编印的报刊。

在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的形势下，中苏友协的宗旨和工作方针已经不适应需要。陈毅副总理批示：中苏友协不是党的宣传机构，而是对外文化交流部门，划归对外文委领导。同时，对双方交往进行调整，只谈友好，不提分歧。1966年中苏协会更名为中苏人民友好协会。

文革期间，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友协活动举步维艰，濒临半瘫痪状态。文革后期，总会全体人员下放干校劳动，机关摘掉牌子，名存实亡。1980年代后期，随着

① 李文、叶张瑜：“感慨话悠长 人散曲未终——原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张再访谈录”。

中苏关系正常化，友协恢复了活动，但此时的友协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组织。1992 年更名为中俄友协，成为对外友协的一个分支协会。^①

（五）世纪初至改革开放以前中俄民间组织合作分析

合作团体种类：从世纪初至改革开放以前，参与中俄/苏民间组织合作的主要有三类社会团体：第一，旅俄华人团体；第二，在华俄侨团体；第三，中国国内以俄罗斯/苏联为对象的社会团体。

关于合作模式：由于相关研究尚未受到重视，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有限资料，似可以认为，主要合作模式有两种：民间合作模式——民间组织直接面对对象国的合作，如哈尔滨和上海俄侨团体的活动；民间组织+官方合作模式，如中苏文化协会和中苏友协的活动等。其中，中苏文化协会活动的民间色彩较多，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友协的活动，将民间组织+官方合作模式推向了极致。

关于合作规模：上世纪初旅俄华人团体和上世纪 20 至 40 年代在华俄侨的合作活动大多是自发的，没有行政资源参与，可谓涓涓细流。民国时期，对苏各种协会有行政力量参与，中苏文化协会等在大城市有一定的分支机构，中苏民间组织合作逐渐发展为“时而奔腾的溪涧”；新中国成立后，高度行政化的中苏友协在全国设有行政化的分支机构，调动行政资源，运用多种手段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活动，中苏民间组织合作发展为“汹涌澎湃的大潮”。1960 年代，由于两国关系恶化，中苏民间组织合作嘎然而止。

二、改革开放以后中俄民间组织合作的现状

（一）中俄民间组织合作的背景

1980 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逐渐正常化，为两国民间组织发展合作扫除了制度障碍。在改革大潮的推动下，中国各行各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行业的发展也需要建立行业群众组织。新世纪前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日益严峻，在经济、科技、文化、学术等方面开展国际交往变得愈来愈迫切，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出现了高潮：2005 年，中国拥有各类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合计 279973 个。水涨船高，参与中俄合作的民间组织数量和种类大大增加。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俄民间组织合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只有中苏友协一家，只有民间+官方一种层次参与合作的局面，有更多类型的民间团体，在更多层面上参与两国合作。这些民间团体按自治程度划分主要有

^① 李文、叶张瑜：“感慨话悠长 人散曲未终——原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张再访谈录”。

四类：一是高度行政化团体，如中国对外友协、中俄友协、中青联、中妇联等；二是相当行政化的行业协会，如中国科协、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中国作协、中国外交协会等；三是基本民间化的学术性团体，如欧美同学会、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等。第四类，新的旅俄华人民间团体。改革开放以后，在俄罗斯开始形成有别于此前旅俄老移民群体的新移民群体。至 2007 年，在俄罗斯已经成立了华人、华裔、企业家和同乡会等几十个华人社团，如莫斯科中俄文化交流中心（1992 年成立）、莫斯科华侨华人联合会（1993 年成立）和莫斯科中华总商会（1993 年成立），莫斯科华人联合总会（2000 年成立）等，这些华侨华人团体以文化宣传、社会公益等方式积极参与了两国民间组织的合作活动。

（二）新的合作模式与规模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民间团体数量稀少，参与中苏民间合作的团体更少——中苏友协成为两国民间组织合作活动的绝对主体，因此，两国民间组织合作的模式单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俄两国社会团体种类大为丰富，参与两国民间合作的团体多姿多彩，因此两国民间组织合作的层面增加，形成了**四种合作模式**：

1. 两国民间组织直接合作模式，即两国民间组织之间直接进行合作，但是这种合作的数量很少。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网站根据外交部网站资料制作的“中俄文化、科技与教育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1991—2007”辑入了这些年间两国文化、科技与教育合作的重要事件。从中可以看到，两国民间组织之间直接进行合作的事件非常少，如“1996 年 7 月 1 日至 5 日，应俄罗斯对外政策协会会长别斯梅尔特内赫（Aleksandr Bessmertnykh）的邀请，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刘述卿访俄”。此外，2008 年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俄罗斯红十字会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援助，亦属于两国民间组织之间直接进行合作模式。

2. 两国民间组织+官方合作模式，即民间组织与国家机关、政府机构共同组织活动的模式。这种合作模式占中俄民间组织合作的大多数。参与这种合作模式的多为两国国家级友好协会，如中俄友协、中俄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中国对外友协、俄中友好协会等。两国的友好协会每年配合国家间友好合作的重大活动和事件，单独或与其他民间团体、有关机构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如友好互访、接待来访、到对象国组织展览、文艺演出、电影周、科技周、经贸洽谈会、学术论坛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新的民间组织形式：由中国官方批准，在俄罗斯注册，由中资企业代表组成的民间组织，在促进两国经贸合作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俄罗斯中国总商会是这种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2006 年 4 月 15 日，经商务部批准成立的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Союз Китайских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в России”（简称“СКП”）^①，是由中国企业驻外机构组成的民间团体。总商会的工作接受商务部和中国驻俄使馆的领导。至 2007 年底，总商会共有 89 名会员，绝大多数为“中国”命名的国资大型企业派出单位。总商会与俄罗斯民间组织建立了联系，是莫斯科国际商业协会高级会员；与首都（莫斯科）投资者协会、俄罗斯北方商会、俄罗斯南方商会有联系；与俄罗斯其他华商团体，如闽南商会、浙江华人华侨联合会等建立了联系。

总商会充分运用双边高层会晤机制、研讨和调研机制、中俄互访、参展和动员机制、援助和慈善机制、领导交办机制，完成商务部、驻俄使馆交办的各项工作，为在俄华商排忧解难，“维护中资企业的正当权益”，努力充当中俄国家间经贸发展、中俄企业间交流的“桥梁和纽带”。^②总商会的一系列工作赢得了俄商界和莫斯科市政府部门，以及旅俄华商的信任。

此外，在教育领域，中俄民间组织+官方的合作逐渐增多。中国的官方学术机构“俄罗斯教育研究中心（2007 年 4 月由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沈阳师大联合成立）”，与俄罗斯民间组织“新欧亚基金会”（Фонд “Новая Евразия”）就“中俄职业教育比较”课题进行合作研究，由双方各自出资。2007 年 7 月，中国教育研究中心与库尔斯克师范大学联合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 年俄罗斯“中国年”活动期间，举行了“20-21 世纪中俄教育改革比较”研讨会。

3. 中国民间团体单边友好活动或交往模式，中国一些学术团体大多采取这种合作模式。如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自 2000 年以后，几乎每年邀请俄罗斯学者参加研究会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 年 7 月 11 日至 12 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组派演出团在莫斯科举办两场“中俄友好之夜”大型歌舞晚会，支持北京申奥。^③

4. 旅俄华人民间团体模式。民间化的旅俄华人团体，主要活动领域是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在中俄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和社会公益等。如 2000 年组织了莫斯科华人文化周、代表旅俄华人参与庆祝莫斯科建城 850 周年的大型活动；2000 年 8 月，在莫斯科地铁爆炸案发生后主动组织华人为俄国伤员献血等。^④

① 章程第二条规定：“本会系全俄各地中资企业、中资企业商会、协会、联谊会的联合组织，为非盈利性的社团”。www.cgccru.org

② 总商会在第二章宗旨与任务第三条中规定，“总商会的宗旨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的直接领导下，在俄罗斯法律的框架下，为在俄罗斯注册的中资企业服务，维护中资企业的正当权益；为促进中俄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和企业间的交流，发挥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www.cgccru.org

③ “中俄文化、科技与教育等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网站资料，<http://euroasia.cass.cn/Chinese/Data/Org/4306269.htm>

④ 温锦华：“俄罗斯华人社团的形成与发展”，《莫斯科华人报》电子版，<http://www.renmin-hotel.com/huaren/eluosi/eluosih02.htm>

合作规模：改革开放以后，中俄关系正常化，1995 年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民间组织合作走出低谷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中俄民间组织合作向着多层次、多领域、多种模式的方向稳定发展。在 2006 和 2007 年两国互办国家年的活动中，以及在申奥、迎奥、国家间庆典、中国汶川地震救灾期间，因有较大行政资源参与，中俄民间组织的合作达到较大规模。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后未组建全国大一统、行政资源过度参与的对俄友好团体，民间组织合作规模再也没有达到上世纪 50 年代那样的高峰。

三、20 世纪中俄/苏民间组织合作与中俄关系

20 世纪百年以来，中俄民间组织无不将传播本国历史、文化作为重要任务，两国民间组织合作异彩纷呈，成为中俄两国了解、沟通、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载体，两国关系发展重要的补充。

1. 政治领域：延长了国家的手臂。20 世纪以来，两国民间组织合作在政治领域大多采取了民间+官方的合作模式，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建立民间组织，发动群众积极配合实施国家大政方针，推动了国策的实施——例如，抗日战争期间组织的对苏研究会和相关活动，在配合国民党政府争取得到苏联对抗日战争的支援方面产生了独特的影响。新中国时期，中苏友协对苏联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大规模宣传活动，推动了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各行各业学习苏联建制和汲取苏联建设经验这一国策的实施。

2. 经贸领域：国家的帮手。依靠民间组织自身力量，排除了中俄关系中一些国家暂无力顾及，或由国家出面解决时机不成熟的障碍因素。

改革开放以后旅俄华商组织在推动中俄民间经贸关系中的活动，充分体现了国家帮手的作用。1991 年苏联解体以后，中俄民间贸易额占了两国全部贸易相当的比重。据俄罗斯经济贸易发展部 2004 年发布的统计数字，2003 年中俄民间贸易额突破了 100 亿美元，几乎与官方之间的贸易额相当。但是，由于 2000 年以前俄处于经济转型初期，中俄民间贸易很不规范，灰色清关盛行，一些华商遭遇俄警察非法查抄或扣压货物，生活陷入绝境。由于受侵害华商只涉及部分群体利益，且有些华商身份特殊——属于在中国已失去户籍、又无俄国籍的“飞人”，加上俄罗斯处于转型期，情况复杂，中国官方机构应对华商与俄相关机构冲突的时机不成熟，中国官方暂未有明确对策，两国民间贸易关系出现诸多障碍因素。这时，在俄成立的同乡会和华商联合会，通过捐款捐物，帮助落难的同胞解决生活困难，使两国民间经贸得以继续进行。同时，这些同乡会出面与俄相关部门斡旋，要求归还被扣压货物，或

者向驻俄中国使领馆反映情况，有利于中俄两国官方机构掌握相关信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相关决策的制定，使两国民间贸易驶入正常化、规范化的轨道。

3. 文化、科学、技术、教育领域：穿针引线的巧手。利用民间资金、智慧和决策灵活的优点，在民间组织与社会之间、民间组织之间，民间组织与官方机构之间进行联络，推动了两国文化宣传、学术交流与合作。

上世纪 20—40 年代哈尔滨和上海俄侨组织直接面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活动，开创了完全利用民间资源促进中俄文化了解与交流的先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专业学术民间组织在文化、学术交流方面更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例如，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 2002 年在民间筹集资金邀请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戈连科娃（З.Т. Голенкова）参加学会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之后，学会穿针引线，戈连科娃代表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与中国学术界开展了多项学术合作：主要有 2002 年学会协助联络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等与戈连科娃签订翻译版权授权书，2004 年出版了戈连科娃主编的著作《俄罗斯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分层》（宋竹音、王育民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年。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 стратифика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1998.）。戈连科娃联络俄友谊大学社会学系、中国苏东学会联络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所属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二者于 2004—2006 合作进行中俄两国大学生价值观比较研究，研究结果已经于 2007 年发表，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上述具有民间色彩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官方合作的基础。在戈连科娃和学会成员的参与下，2009 年 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与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签署了进行“中俄两国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

总之，上面的个案说明，中俄民间组织之间具有友谊、合作的巨大愿望，蕴藏着巨大的合作潜力，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民间组织的优点是群众积极性高，决策、活动灵活，缺点是物质资源不足。因此，调动民间组织的积极性和智慧进行合作，争取搭上官方的大船，上升到民间+官方，或者官方合作的层面，中俄民间合作，中俄国家友好关系发展的内涵将更丰富，更精彩。

20 世纪中俄民间组织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民间组织在发展中俄关系方面大有作为。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y, scale, pattern of NGOs' cooper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the rights protecting activities of organizations for Overseas Chinese in Russia in early 20th century;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Overseas Russians in Harbin and Shanghai from 1920s till 1940s; activities in publicizing

and researches of various research communities for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ll-around publicity by the Sino-Soviet Friendship Association during the new China period; a full range of bilateral trade and economic, cultural, educational, academic and other activities by Chinese and Russian NGO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ere are two basic modes of cooperation for Chinese and Russian NGOs in the 20th century, namely, "NGO Cooperation" and "NGO plus 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Regarding the cooperation scale, it was small like a trick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ided up in the 1950s, sunk to a low ebb in the 1960s; developed in multiple fields and at multiple levels since the 1990s. The content of the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was various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to bilateral relations---in the political field, launched the masses, implemented national policies and extended the country's arms; in the economic and trade field, it depended on the mass power and temporarily excluded some barriers which the countries can not afford to take into account, becoming a great help to the country; in the cultural, science, and educational fields, it made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NGOs' flexibility in decision-making and has become a go-betwee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cooperation of NGO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the 20th centu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The cooperation potential between Chinese and Russian NGOs is great and can thus accomplish a lot.

【Key Words】 Chinese and Russian NGOs, History of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Scale, Cooperation Pattern, Sino-Russian Relations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н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стор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асштаб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одел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困境与协调：探析中俄能源合作的博弈 ——以俄远东输油项目为例

朱光强*

【内容提要】2009年2月17日，被称为“贷款换石油”的中俄大型输油项目终于敲定。这标志着两国间长达15年的石油博弈终于突破了重重困境，有了一个较为完满的结局。回首中俄两国15年间围绕远东石油资源所进行的一系列博弈，每一轮谈判都是一场事关国家利益的针锋相对，每一份协议的签订都体现了双方寻求双赢的妥协。本文将从博弈论的视角，以俄远东输油项目为例，从输油管线之争及石油定价机制谈判等几个方面，对中俄能源合作进行系统的梳理，提炼双方博弈策略的精髓，发掘竞争背后蕴藏的合作因素。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今后中俄能源合作的走向依旧是“博弈—困境—协调”模式。

【关键词】能源合作 输油管线 博弈 中俄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4-0107-(14)

2009年2月17日，在中俄两国高层领导人的见证下，中国最大的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分别签署了开展长期原油贸易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俄罗斯在从中方获得250亿美元贷款的基础上，将在未来20年中向中国输出3亿吨原油。^①这项新的“贷款换石油”协议是对中俄能源合作形式的新探索，它不仅冲破了两国能源合作的僵局，更为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打开了新的窗口。回顾近15年来中俄能源合作的风风雨雨，从最初的远东输油管线之争，到后来的石油定价机制谈判，中俄能源合作的每一次

* 朱光强，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① “中俄‘贷款换石油’协议达成将进一步推进双方能源合作”，新华网，2009年2月18日。

竞合都牵动双方权力和利益的博弈，中俄两国关系也在一次次能源博弈中变得更加成熟。本文将从博弈论的视角对中俄能源竞争与合作作一代表性分析。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鉴于严峻的世界能源形势，国内学界、政界都对我国能源安全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担忧。以《全球能源大棋局》^①、《能源安全与能源发展战略研究》^②为代表的一大批论著，从不同的角度，以调研或讨论的形式对我国能源安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阐述了各自的看法。特别是近年来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剧烈动荡，愈发引起了学界对于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关注。从降低我国石油安全风险的角度来看，除了提高石油自给率之外，如何开拓多元化的石油市场已成为当务之急。俄罗斯与我国东北地区接壤，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输出国之一，与我国保持着良好的石油合作基础。一批学者据此从俄罗斯能源外交战略入着眼，对中俄能源合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③特别是针对中俄输油管道项目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④纵观上述三类研究文献，多采用地缘政治学、国际政治学、能源经济学等理论方法对中俄两国能源合作进行分析，鲜有论文以博弈论的方法对俄远东输油管线之争的整个具体过程进行全面的分析。笔者在认清中俄两国远东输油项目中的共同利益和相互分歧的基础上，从双方国家利益的理性选择出发，以博弈论的视角，对远东输油项目的一波三折逐一进行了分析。在分析模型的选择上，作者秉承恰当展示事物本质的原则，选取了 5 个博弈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在确定支付矩阵的过程中，兼取了基数支付和序数支付两种方式，力求准确、直观地表现中俄两国的博弈收益。

二、中俄远东输油管道线路的由来——偏好性博弈

众所周知，能源安全牵涉到每个国家的利益，尤其是石油管道，因其投资巨大、涉及利益范围广泛，所以更加引人注目，各方冲突也更加明显。在石油管道的决策

① 经济安全研究中心编：《全球能源大棋局》，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 年。

② 陈元主编：《能源安全与能源发展战略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年。

③ 如袁新华：《俄罗斯的能源战略与外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姜琦主编：《俄罗斯重新崛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年；戚文海：《中俄能源合作战略与对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④ 如陈支农：“‘泰纳线’考验中国能源战略”，《中国石化》，2005 年第 2 期；徐世刚：“从中俄石油管道项目‘安大线’的夭折看中日能源战略竞争”，《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石磊：“透视一次石油外交之伤——评‘安大线’出局的深刻原因”，《沂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

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莫过于线路的选择。早在 1994 年，俄石油企业就向中国石油公司提出铺设输油管线的设想，建议该管线过境蒙古直接通往中国，这也是一条最近、最安全的线路，而中方则出于保住大庆这个因石油枯竭而逐渐衰落的资源型城市的考虑，提出了从满洲里绕道贝加尔湖的“安大线”方案。双方在线路问题上争执不下，一场谈判桌上的博弈就此开始。

摆在中俄两国面前的选择都有两个——向对方妥协或者强硬地争取。如果单从经济获益上看，双方都选择“争取”才合乎理性。因为即便不修建通往中国的输油管道，俄罗斯的石油依然可以在欧洲卖个好价钱；而当时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与通过管道从俄罗斯购进石油的成本是接近的。那么博弈的结局将是双方僵持在互不相让的境地，谈判最终也将走向破裂。

但事实上，中俄双方看重的并不仅仅是经济获益。经济获益只是双方整个考量体系的一部分。作为以实现本国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理性人，真正决定中俄两国战略和行动的根本因素只能是国家利益。那么，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国家利益究竟是什么？从俄方来看，政府希望通过远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能源建设吸引外来投资，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而站在能源和经济安全的角度，占领中国这个大市场，不仅能够实现自身能源出口的多样性，还可以降低本国经济对西方过分依赖的风险。况且当时俄罗斯国力较弱，亟需以能源出口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最优的策略组合莫过于自己选择争取而让中方选择妥协，次优的选择则是俄方妥协，但无论哪个方案都将促成中俄输油管线成型，而这将有助于俄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从中方来看，自己选择争取让俄方妥协也是最优的策略组合，次优策略是己方妥协。应避免出现双方同时选择争取或妥协，造成最差的结果。^①因为中国自 1993 年起已由石油出口国转变为石油净进口国，必须依靠进口来弥补国内石油的缺口，如何获取足够的石油已经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头等大事。相对于从中东以海运的方式进口石油，取自俄罗斯从陆路进口的石油无疑更加安全。

如果我们以此重新计算中俄双方就石油管道线路问题的博弈支付，并按照序数排列的规则从 1 到 4 表示出来，可以得到以下支付矩阵（图 1）：

^① 双方都选择“争取”最终将导致谈判破裂，这无疑是个糟糕的结果。双方若同时选择妥协，中方放弃“安大线”，俄方放弃输油管线取道蒙古，同样使得谈判无法达成一致。现实中发生这样的情况也基本不可能，所以我将其作为最差的结果，都是双方的第 4 选择。

		俄罗斯	
		妥协	争取
中国	争取	2	3
	妥协	4	1

图 1 中俄双方就石油管道线路问题的支付矩阵

很明显，在上述博弈中存在两个纳什均衡（1，2）和（2，1），形成一个偏好性博弈。而协调偏好的关键在于双方对选择的价值评估。从俄方看，虽然“安大线”的造价要比直接取道蒙古的线路高一些，但对于俄罗斯来说，能够占领中国这个市场是最重要的，管线的走向处于次要的位置。另外俄所制定的远东西伯利亚发展规划也希望得到中国的参与和支持。而对于中国而言，输油管线取道蒙古则增加了一个过境国，也就增大了风险，这与中国所追求的安全价值背道而驰。况且它距离中国最需要石油的东部较远，在当时海、陆进口石油成本大抵相当的情况下，中国对于取道蒙古的输油管线评价不高。但若输油管线通往大庆情况则完全不同，不仅解决了石油进口的风险问题，还使这个石油城市重新焕发青春，省去了新建石油加工基地的费用，可谓一举多得。基于两国对输油管道线路的价值评估，双方通过一系列谈判最终达成一致，“安大线”出炉。

三、“安大线”久拖——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与破解

“安大线”从提出到基本论证通过经历了 10 年之久。固然线路的实地考察和技术论证耗费了大量时间，但更难以解决的分歧在于如何分担建设费用。按照国际惯例，两国应各自承建本国境内的线路。“安大线”在中国境内 795 公里，而在俄境内的管线长达 1450 公里，按照管线长度估算，中国境内需 8 亿美元建设费用，俄境内则需要大约 17 亿美元，是中方投资的两倍还多。^①俄罗斯希望中国能够提供建设融资，为此双方进行了新一轮谈判，一个新的博弈对局由此展开。

摆在中俄双方面前都有两个选择，承担这笔建设费用或者拒绝。在这个博弈对

^① <http://finance.sina.com.cn/nz/zrjze/>.

局中，共有 2×2 个策略组合：如果只由一方承担，则需单方支付 17 亿美元；或者双方共同承担，各自承担 8.5 亿美元^①；假如双方都拒绝承担建设费用，那么“安大线”就将夭折，前期 3000 万美元的科研经费也将浪费，双方已各自分摊 1500 万美元。于是这场博弈陷入了一个“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谁也不愿意独自承担这笔建设费用，相较四个策略组合，只有 $(-0.15, -0.15)$ 才是该博弈的纳什均衡，即无论对方采取什么行动，拒绝承担建设费用永远是自己的最优选择。

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这也是中俄双方在资金问题上僵持了长达 10 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但最终的结果却和预想的支付矩阵相反——中俄输油管线合作并没有走向破裂。其关键在于 $(-0.15, -0.15)$ 并不是真正的支付。因为在这场博弈中，中俄输油管线合作一旦破裂，损失的将不仅仅是 3000 万美元的前期科研经费，一并失去的还可能有中俄两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与之相关的利益，这个损失是不可估量的，用 $(-\infty, -\infty)$ 来表示一点也不为过。基于上述原因，中俄之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可以重新表示为（图 2）：

		俄罗斯	
		承担	不承担
中国	承担	-8.5	0
	不承担	-17	-0.15 $(-\infty)$
		0	-0.15 $(-\infty)$

图 2 中俄双方就“安大线”俄境内线路资金承担问题的支付矩阵

在新的支付矩阵中，我们很容易找到新的纳什均衡是 $(-8.5, -8.5)$ ，即双方各自承担建设费用的一半，而实际也和支付矩阵显示的一样，中方承诺提供俄方 17 亿美元中 50% 的借贷资金援助（将来用石油款抵扣）。

^① 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只取了 1:1 的比例。事实上双方达成的协议也是按 1:1 的比例分担——“俄方负责的 1600 公里管线建设费用（17 亿美元）仍然可以获得中方 50% 的借贷资金（将来用石油款抵扣）援助。” <http://info.news.hc360.com/html/001/002/003/013/15702.htm>

四、要不要修建“安大线”——囚徒困境

在解决了线路和资金两个重要问题之后，中俄双方对“安大线”项目的合作意向已经十分明确。1996年，两国政府签署《中俄关于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议》，输油管道项目赫然在列。到2001年9月，输油管线的规划已经大致完成。同年12月，中国政府批准了中石油与俄罗斯尤科斯公司的合作协议。按照惯例，这一协议只待俄罗斯总统签字批准后即可生效。但就在等待总统签字的过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2002年底，承担“安大线”管道技术经济论证的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突然声称要放弃“安大线”，提出改修一条从东西伯利亚经过远东地区到太平洋港口纳霍德卡的输油管道的新方案（即“安纳线”）。这一方案得到了日本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不仅承诺将每天从俄进口100万桶石油，还准备提供50亿美元贷款协助俄罗斯开发油田及建设输油管道，致使俄罗斯方面对修建“安大线”的态度急转直下。2003年10月下旬，支持“安大线”的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被捕，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要不要修建“安大线”已经成为中俄石油合作新的冲突点，中俄之间的博弈关系呈现出囚徒困境的特点。

俄罗斯可以选择继续同中国合作修建“安大线”，或是选择背叛，转而修建“安纳线”。与此相对应，中国方面拥有同样的选择：合作或背叛^①。如果我们以序数的规则从1到4分别表示中俄双方在是否修建“安大线”问题上的偏好和收益，可以得到以下支付矩阵（图3）：

		俄罗斯	
		合作	背叛
中国	合作	3	1
	背叛	4	2

图3 中俄双方就要不要修建“安大线”的支付矩阵

^① 这里的“背叛”并不是说中国不要修建“安大线”，而是指对两人合作共赢的背叛。

站在俄方的角度，无论中方选择合作还是背叛，其选择背叛所获得的收益总是比选择合作的收益大。修建“安大线”确实不是实现俄罗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首先，“安大线”的终端客户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石油价格有可能受到中方的控制。如果改建终端在俄境内的“安纳线”，就没有类似的烦恼，还能增加俄罗斯的主动权，石油出口的范围也变得更大——不仅辐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北亚地区，甚至可以远达美国。其次，和“安大线”相比，“安纳线”全线都在俄罗斯境内，经过整个远东地区，有利于带动输油管线沿途地区的相关产业，从长远看更有利于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再次，修建“安大线”俄方需自己负担 17 亿美元（50% 由中国融资）的俄境内输油管线建设费用。而修建“安纳线”则无需自筹资金，日本提供的 50 亿美元即可完成整个“安纳线”油气管道的铺设，这让俄罗斯在输油管线的问题上更加偏向于“安纳线”。最后，由于“安大线”经过图宁斯基国家公园，距离贝加尔湖仅 20 公里，其可能造成的生态污染也是俄放弃“安大线”的原因之一。另外，俄国内利益集团和地方政府围绕着远东输油管线的利益冲突，也使得的“安大线”的前途越发暗淡。综上所述，单就这一次博弈来说“安大线”的出局是不可避免的。

站在中方的角度看，假如俄方选择合作，中方也选择合作策略，这将是一次双赢。但我们还应看到，其实背叛策略也能够给中国带来最大的收益——如果中国背叛了双方的合作，单方面控制“安大线”的终端，那么也就控制了俄罗斯远东石油的出口权，正如俄罗斯担心的那样，中国在油价方面的发言权增大，将影响俄方的利益。但事实上俄方只有一个纯策略，即背叛——放弃安大线。中方在此情况下几乎没有选择权，博弈在（3，2）达到均衡。2004 年 6 月，俄工业和能源部长宣布俄未能通过安加尔斯克——大庆输油项目，“安大线”夭折。

五、“泰纳线”——霍特林模型、可信性威胁与囚徒困境的破解

基于对石油综合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俄罗斯越来越倾向于报价更高的“安纳线”方案。国际舆论也普遍看好“安纳线”的胜出，并预测中俄两国经贸关系也将随之步入低谷。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安大线”的出局给中俄能源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但并未破坏两国关于石油问题业已达成的协议，俄仍继续扩大对中国石油出口的规模，并于 2004 年初启动了利用铁路向中国输油的方案。而在远东输油管线的具体抉

择上，俄罗斯最终并没有同意叫价最高的 150 亿美元^①“安纳线”合同，而是重新规划了一条“安大线”与“安纳线”的折中路线——“泰纳线”，并承诺将优先修建一条通往中国的支线（由斯科沃罗季诺到大庆的输油管线），第二阶段再考虑修建至东部太平洋港口的输油管道。^②



图片来源：田原：“俄远东石油管道最终选择‘泰纳线’，中国支线谈判有望率先启动”，《资源市场》，2005 年第 1 期。

图 4 俄罗斯远东输油管线示意图

探究俄方态度的转变，不妨先从“泰纳线”的线路说起（图 4）。“泰纳线”从距离安加尔斯克不远的泰舍特出发，连接远东和东西伯利亚所有重要的油气产区，终点是俄罗斯东部太平洋港口纳霍德卡。相对于“安大线”而言，它的线路和终端都在俄境内，俄罗斯可以全程控制，同时利用太平洋港口纳霍德卡出口到更多的国家，降低了自身石油出口的风险。对比“安纳线”，“泰纳线”沿途经过了更多不发达地区，能更好地带动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另外“泰纳线”较前两个方案距离贝加尔湖地区更远，降低了因石油泄漏造成生态破坏的风险。可以这么说，“泰纳线”既是两条线路的“折中”，更是两者优势的“综合”。至于“泰纳线”中国支线的确定，这一方面是俄罗斯出于安抚中方的考虑，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开辟中亚能源市场，特别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中哈输油管线协议，给俄方带来了一定压力，也加速了中国支线的成形。如果我们以经济学上的霍特林模型(Hotelling model)，用线段图的方式表示远东石油输出管道，或许更容易理解为何俄最终选择“泰纳线”，并优

① 日本承诺 50 亿美元石油管线建设费用+80 亿美元购买石油价款+20 亿美元沿线地区社会保障基金资助=150 亿美元，<http://www.cctv.com/program/jjbx/20030927/100465.shtml>。

② 周永生：“俄国决定修筑‘泰纳线’的启示”，《国际论坛》，2006 年第 1 期。

先建立中国支线的决定。

假设中、日、韩等石油需求国均匀排列在一条线性的市场上，而输油管线则看作是销售石油的店铺（◆为“安大线”，◇为“安纳线”，▲为“泰纳线”，△为“泰纳线”中国支线，▽为中哈石油管线），且销售石油的成本和价格相同。石油需求国购进石油的成本和意愿直接取决于距离输油管线的远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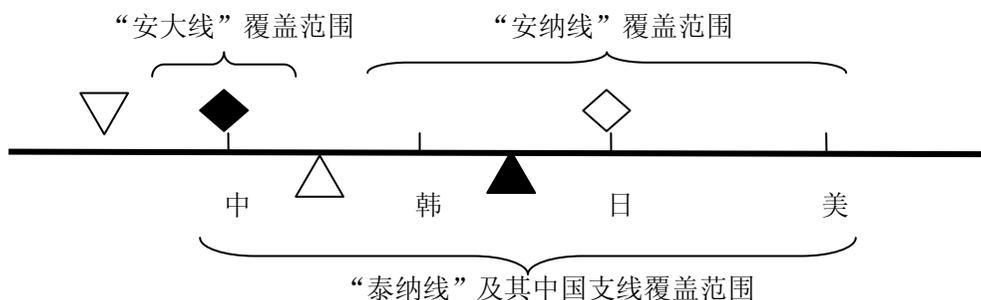


图 5 远东输油管线的霍特林模型示意图

从上述示意图（图 5）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安大线”仅能提供中国所需的石油，“安纳线”虽然覆盖了韩、日等东北亚国家，甚至可以向美国输出原油，但其距离大庆太远，实际上失去了中国的市场。中国完全可以转向距离更近的中哈石油管线，而事实也和示意图反映的一样——2004 年 5 月中哈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共同修建总长 1240 公里、年原油输送量 1000 万吨的输油管线协议。而到 2011 年，输油量将提高到每年 2000 万吨，将有效地缓解中国的能源紧张。^①它迫使俄国重新考虑远东输油管线的走向——毕竟俄罗斯也不想失去中国这个大市场，更不必说两国间业已存在的伙伴关系。2004 年 12 月 31 日，俄政府宣布放弃“安纳线”，修建“泰纳线”，其一期工程的终点斯科沃罗季诺距离中俄边境只有 60 公里，为以后中国支线的建设埋下了伏笔。2005 年 4 月 5 日，俄罗斯总统助理伊万诺夫明确表示，俄罗斯政府已基本决定建设“泰纳线”的中国支线。同年 7 月 8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 8 国集团首脑会议的苏格兰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俄罗斯将优先铺设西伯利亚通往中国的输油管道，然后才会兴建供应日本的远东港口路线。^②

这场博弈从表面上看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争夺中国市场的博弈，但事实上，它的背后依旧是中俄两国在输油项目上的又一次角力。由于历史的原因，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一直存在着经济上的非对称依赖关系^③，这种关系决定了哈萨克斯坦根本

① 丁晓红编译：“美国专家评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能源关系——中、俄能源合作关系濒临崩溃，中国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国土资源情报》，2005 年第 1 期。

② 周永生：“俄国决定修筑‘泰纳线’的启示”。

③ 杨雷：《俄哈关系论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年，第 149-170 页。

无力、也不想和俄罗斯就石油出口展开针锋相对的竞争。换句话说，中俄两国这对买卖双方才是博弈的主角。

这次博弈同时也是中方对于俄方在囚徒困境中选择背叛的回应。中国借中哈输油管线向俄方传递“中国并不完全依赖进口俄罗斯的石油”的信息，或是看作一次可信性背叛威胁——如果俄罗斯不考虑中方的利益，那么中国将放弃与俄方的合作。从结果看，俄方固然获取了一定的背叛收益，但中方依然通过“泰纳线”的中国支线获得了俄远东石油，双方重新回到偏好性博弈的对局。

六、石油定价机制谈判——“分冰淇淋蛋糕”的博弈

俄远东输油项目管道走向的波折还未平息，而石油价格的博弈已然开始。2004年，中国和俄罗斯曾达成一项“贷款换石油”的长期合作协议。协议规定，中石油一次性支付60亿美元贷款，换取俄罗斯石油公司在2004-2010年间向中国提供总计约4840万吨石油。^①按照协议，俄罗斯向中国供油的价格约合17美元一桶，而当时的国际油价已经升至每桶50美元左右，远高于协议价格。俄罗斯之所以愿意做这种“亏本”的买卖，是因为当时俄罗斯石油公司急需一大笔资金用以收购尤甘斯克石油公司，而中石油也因“安大线”的天折，迫切需要在俄罗斯找到新的石油进口渠道。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在当时看来可谓双赢。

但随着国际油价的节节攀升，俄罗斯越来越觉得不平衡，要求与中国就输华石油价格重新进行谈判。2005年，俄罗斯先是借口“泰纳线”污染贝加尔湖水源，以“环保原因”暂停了输油管线建设工程，之后又剑指中俄长期输油合同，威胁中国如果不提高购油价格，将在2010年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签。受此影响，中俄石油贸易额逐年下降。到2007年底，国际油价已逼近一百美元，俄罗斯在谈判桌上的态度也变得更加强硬，中俄两国在石油价格的谈判上陷入了僵局。

这一僵局直到2008年才得以缓解。由于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大幅下滑，俄各大能源巨头也陷入了流动性危机，其在谈判桌上的强硬立场也随之软化。俄罗斯不再一味要求提高石油价格，而是更加关注向中国输送石油的战略意义和市场价值；中国方面也不会继续寻求低价，而是要在一个合理的价格范围内保证石油的持续、稳定供应。双方不再试图以一个较高或者较低的价格签订长期供油合同。讨价还价博弈对双方的影响不可忽视。

中俄作为博弈的局中人，其谈判结果是集合S，谈判破裂当然是集合S的备选方

^① <http://news.qq.com/a/20081129/000148.htm>.

案之一，而且局中人在结果 S 上定义的效用函数 $u_i: S \rightarrow R$ ，满足（1）谈判破裂结果给两个人局中人带来的效用都是最低的，即对于任意结果 $s \in S$ ， $u_1(s) \geq u_1(d)$ ， $u_2(s) \geq u_2(d)$ ；（2）至少有一个结果给两个局中人带来的效用，要大于谈判破裂的效用，即至少存在一个 $s \in S$ ，使得 $u_1(s) > u_1(d)$ ， $u_2(s) > u_2(d)$ ，我们将此讨价还价问题记为 $B=(S, d; u_1, u_2)$ ，其中 $d \in S$ 。它的效用配置记为 $U(B)=\{u_1(s), u_2(s): s \in S\}$ 。两人讨价还价问题 B 确定解集 $\sigma^N(B)=\{s \in \arg \max_{s \in S} [u_1(s)-u_1(d)][u_2(s)-u_2(d)]\}$ 的对应，就是讨价还价问题的纳什解法。^①

中俄双方就好像在进行着这样一场分冰淇淋蛋糕的博弈，价格不断缩水的石油就是那块融化中的冰淇淋蛋糕。博弈的规则很简单，一人先提出分法，另一人有权选择接受或拒绝。如果拒绝，则由此人提出新的分法，而选择权转换到第一人的手中，直至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或者蛋糕全部融化，游戏结束。如果蛋糕只需两轮就会融化完毕，那么最明智的选择是一开始就提出“对半分”的方法，两人各得一半蛋糕；如果是三轮的话，则先提出建议的人得到 $2/3$ ，后者得到 $1/3$ ，是为最优解；四轮的话则又变成五五分，五轮则以六四分……依次类推，则轮数为偶数时，理性博弈的双方各得一半，当轮数为奇数时，双方各得 $(n+1)/2n$ ； $(n-1)/2n$ 。乍一看，最后一个提出条件的人可以得到全部，但由于冰淇淋蛋糕在讨价还价中不断融化，拖延到最后恐怕什么也得不到，而在一个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中，谁首先提出条件也并不重要，妥协平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②

深陷流动性危机的俄罗斯石油公司不希望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中石油也不可能从破产的俄石油公司获得任何好处。只有双方同时预见到妥协平分结局的不可避免，那么中俄两国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谈判中才能达成互惠互利、平分共享的协议。

七、破解困境的新方法——从“上游换下游”到“贷款换石油”

其实，谈判桌上的中俄双方早就参透了讨价还价博弈的玄机，在双方核心利益一致的条件下，协调彼此的偏好收益是达成合作的关键。而要达成双方协调妥协，顺畅且高效的沟通渠道必不可少——中俄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互访提供了这样的平台。

2006年3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石油集团和俄罗斯石油公司达成了在年底前组建合资公司的协议，分别经营上游和下游业务。中俄能源合作的新

① 王则柯、李杰：《博弈论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2-360页。

② 王则柯：《新编博弈论平话》，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202-207页。

形式“上游换下游”就此诞生。协议确定，中石油以入股的方式与俄石油公司在俄共同组建“东方能源公司”，俄方持股 51%，中方持股 49%，主要业务是在俄罗斯进行地质勘探及能源项目融资，并联合开发俄罗斯万科尔油田。同时，中国开放能源下游市场，在中国建立中俄合资的炼油厂——中俄东方石化(天津)有限公司，中石油集团占股 51%，俄罗斯石油公司则占股 49%。^①这种新型的合作方式满足了双方对各自核心利益的追求，以交换的形式促成了互利合作。中方以入股的形式获得了俄罗斯石油的共同开发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的石油供给，并且在石油定价机制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而俄方不仅获得了足够的资金启动新的油田开发项目，还解决了此前一直担心的石油出口权被控制的问题，并深入到俄石油深加工领域，最大限度地开发了俄远东石油资源。

2008 年 10 月 28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俄期间，中俄双方又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石油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为两国另一项石油合作计划——“贷款换石油”计划奠定了基础。中国将向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分别提供 150 亿美元和 100 亿美元的贷款，俄罗斯将在未来的 20 年内每年向中国输出 1500 万吨原油，同时将在俄罗斯远东原油管道中国支线原则协议的基础上，共同建设和运营从俄罗斯远东城市斯科沃罗季诺经中国边境城市漠河到中国大庆的中俄原油管道。^②

这两项合作协议的签订将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逐步引向深入和制度化，建立起一套以市场为原则的多领域长期合作，将双方合作由单纯的能源领域逐步扩大到整个经贸乃至国防科技等国家重要部门。这不仅解决了中俄能源合作的困局，也为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八、未来的博弈——中俄能源合作的明天

回首 15 年来中俄输油管线项目的曲折进程，从输油管线之争的一波三折，到石油定价机制的艰难谈判，每一次都是两国为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博弈。虽然由于双方利益上的分歧造成了两国相持不下的局面，形成了种种难于解决的困境，但基于中俄在能源问题上的利益一致性和互补性，两国始终没有放弃合作的可能性，并且本着双赢的态度，在不伤及本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了合理的协调与妥协，最终一一破解了重重困境。这种“博弈—困境—协调”的过程不仅是这 15 年来中

^① http://www.cpmec.com.cn/pub/syzbzx/yjdt/t20080509_81015.htm.

^② 2009 年 4 月 27 日，中俄输油管道俄境内段正式开工，中国境内段 5 月中旬开建，2010 年建成。
<http://hy.gzntax.gov.cn/k/2009-5/1358089.html>.

俄远东输油项目的真实写照，也为两国能源合作的明天定下了基调。

不管明天中俄能源问题的博弈对局怎样变化，局中人的目标却始终如一，那就是——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2004年10月，普京访华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曾强调：“把输油管道修到哪里，是由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决定的。”^①只要我们抓住国家利益这个核心，在准确定位俄罗斯国家利益诉求和博弈心理的基础上，从战略的高度对博弈对局进行充分的研究，就不难理解局中人制订各项策略的真实意图，并可以据此预测对方可能采取的行动，进而在现实博弈中占据主动。

同样，中国也必须明确地向俄方表达自身国家利益所在，努力减少对方的偏离激励，增加其背叛成本，传达可信性背叛威胁，同时综合运用多种外交手段和博弈策略，使俄方不轻易地背离双方的合作。例如，中哈石油管线的建设就对中俄能源合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②我们应广泛地利用如提供贷款和投资、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经济手段，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在反恐、军事合作等方面的作用等，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另外，必须加强中俄两国能源合作的交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沟通渠道和高效的沟通机制，并且使其定期化和长期化。这将是中俄能源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径。中俄两国的对话不能仅靠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更需要双方平和的沟通。特别是促进双方高层领导人的对话，往往能对中俄能源合作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这方面，欧洲和俄罗斯的能源对话机制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借鉴。^③

总之，中俄两国在今后的能源合作博弈中，其诉求依旧是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必然会造成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冲突，甚至是尖锐的对立，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对中俄能源合作抱悲观的态度，毕竟两国在能源等经贸领域以及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和利益结合点。这就决定了中俄两国的能源合作不会破裂，而是将逐步深入和扩大化。

【 Abstract 】 On February 17, 2009, known as “loans-for-oil” large-scale Sino-Russian pipeline project has been determined. This marks the 15-year petroleum game has finally broken through various difficulties and has gained a good result. Looking back to the Sino-Russian games for petroleum resources during the past 15 years, each

① 宋国华：“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峰回路转幕后”，<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5/May/874690.htm>。

② 张忆南、相征：“解析俄罗斯石油管线泰纳线的定局”，《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1期。

③ 罗英杰：“俄罗斯与欧盟的能源合作——兼论对中俄能源合作的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4期。

round negotiation is an issue of national interests against each other, each agreement reflects the negotiation of the two sides to seek win-win compromise. This article will collate the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systematically from a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and make a case study of Russia's Pipeline Project in the Far East. The main content includes dispute over oil pipelines, oil pricing mechanisms and other aspects of negotiat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tract the essence of game strategy and explore cooperative factors behind competition. Meanwhile,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has pointed ou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ino-Russian energy cooperation is still a "game - dilemma - coordination" mode.

【Key Words】 Energy Cooperation, Pipeline, Games, Sino-Russian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энергетики, трубопровод, игры,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责任编辑 姜睿)

苏联·苏共

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 ——再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朱秀芳*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之后，学界围绕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功过的争论一直存在。一般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公开性、民主化、构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理论观点的提出，扰乱了苏联原有的主流意识形态，瓦解了共产党队伍，在此理论指导下提出的急于求成的改革，造成了苏联的最终解体。但事实远没有这样简单，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肥沃的生长土壤。本文试图从历史角度来诠释这一现象，揭示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现象 苏联解体 历史诠释

【中图分类号】K512.6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9)04-0121-(16)

迄今为止，苏联解体已过去整整十八个年头了，但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谁应该为苏联解体承担责任的争论仍不绝于耳，有关戈尔巴乔夫功过的争论也仍在继续。时至今日，戈尔巴乔夫在西方依然口碑甚佳，通常认为结束冷战的功劳非他莫属。而在俄国国内，对他的指责声至今未停息，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把他视为瓦解苏联的罪魁祸首。在中国，戈尔巴乔夫更是遭到了口诛笔伐，很多学者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归咎于其脱离实际、又急于求成的改革。

其实，在政治层面，戈尔巴乔夫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代人的代表。本文所说的戈尔巴乔夫现象指的就是这一代人的思维及行为模式所呈现出来的情景。恩格斯说过，历史现象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的合力的

* 朱秀芳，浙江教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产物。^①戈尔巴乔夫现象就是许多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现象是个谜的话，那么“解开这个谜的钥匙在过去的改革年代之外。”^②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切涅夫的话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戈尔巴乔夫现象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出现戈尔巴乔夫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和历史根源的现象，把它放在苏联历史的长时段里通盘加以考察，对于厘清事情的本源大有裨益。

—

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是历史的选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是社会的需要。对此，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深信不疑。作为苏联历史上真正的第四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11日接替去世的契尔年科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又兼任国防会议主席，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之所以说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是苏联历史的选择，是因为此前老人政治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老人政治”已成苏联的严重危机之一。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直到老死任上，他的前后两位继任者虽任期不长，仍是旧戏重演。老人执政，又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全国之命运系于斯，达20年之久。

接二连三最高领导人老死任上之后，不能不警醒全党：必须从年轻者中遴选最高领导人。当时，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是70岁，60岁以下者唯有戈尔巴乔夫一人。老化的苏联官僚机器急需注入新的活力。在这样的局面下，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被推举出来，并非偶然。几年后，戈尔巴乔夫描述他当时的心情说：“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那个体制本身濒临死亡，那个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再具有生命力。我了解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这对我乃是最大的精神负担。”^③“实际上，在我被推到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子上时，就已注定我别无选择，因为整个国家正期待‘改革’的到来。”^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已经处于严重的经济、社会、精神道德和政治危机之中。政权的威信下降，越来越多的居民阶层以及相当一部分精英对政府表示不满。正因为如此，20年前在苏联开始的改革被社会上很多人视为期盼已久的事情，视为实际没有忘记1950—1960年代‘解冻’（后来被1970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8页。

② [苏]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切涅夫原著：《“戈尔巴乔夫现象”的背后》，田永祥等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序言第3页。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④ [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孙立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

代末的所谓“停滞”所取代)的几代人愿望的机会。”^①总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稳定已经变成了停滞，整个社会处于僵化状态。阿尔巴托夫指出：“在这些年内（这毕竟是 18 年），我国没有出现过沿着使我们的社会得到总的改善的道路前进的任何不可忘却的历史性里程碑。”^②“到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在斯大林专制的艰难年代中得以保存下来的向前发展的潜力看来已经耗尽。而苏共 20 大所激发的，在随后的岁月中被保守主义的灭火队竭力加以扑灭的那股新的热情也已逐渐泯灭。1964 年上台的领导人甚至不想去使国内政策恢复活力。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短命的，很快被我国历史上最盛行的无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作风和管理方法所代替”。^③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罗波夫虽有雄心壮志却难以励精图治，而同样重病的契尔年科更是抱残守缺和不思进取。这样，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所积累的难题成为戈尔巴乔夫这一代领导人的历史重负，苏联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不进行改革就难以为继的历史关头。“改革已成为一种生存需要，没有别的办法能使国家摆脱这种魔圈”。^④于是，戈尔巴乔夫借鉴和吸取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经验和教训，以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为蓝本，开始对苏联社会进行一场艰难而又雄心勃勃的改革。正如坚信联盟的神圣性一样，他对于改革之预先注定、不可逆转同样坚信不疑。他坚信，假如不是他，那么另外一个担任他的职务的人也不得不开始改革。戈尔巴乔夫至今还坚持认为，“改革并不是 1985 年上台执政的那些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发明”，“改革的需求具有客观的性质。我们当时发现，从历史的角度我们输掉了……通过布尔维克模式我们实质上将苏联和俄国都排除在普遍文明过程之外……我想再次强调，没有人将改革的想法‘悄悄塞给’我们，它诞生于那个体制、那个党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改革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发明，他是表达了社会的需要。”^⑤

总之，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多数人认为苏联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只是谁也不曾料到苏联彻底改革的结果是苏共下台，苏联解体。我国学者张玉良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苏东剧变绝不是戈尔巴乔夫的初衷。苏联社会内外矛盾的长期积累决定了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扮演这些重大社会矛盾解脱者的历史角

① 米哈伊尔·戈尔什科夫、弗拉基米尔·佩图霍夫：“俄罗斯人 20 年后看改革”，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年，第 344 页。

②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 190 页。

③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第 266 页。

④ [苏]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切涅夫原著：《“戈尔巴乔夫现象”的背后》，田永祥等编译，第 269 页。

⑤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366-367 页。

色，而当代苏联的社会历史特性则导致戈尔巴乔夫进行历史性解脱的最终结局是苏联解体。”^①

二

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苏联经济改革的主题就已拟定（安德罗波夫已开了个头，契尔年科也没有表示反对）”^②。戈尔巴乔夫曾多次强调，“由党的第 26 次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制定的战略方针的继承性”“永远都不改变”^③。在这种继承性下，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的发展描绘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美好蓝图，这体现在他的“加速战略”中。1985 年 4 月 24 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经济增长速度是该战略的核心问题。它规定，到 20 世纪末，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要翻一番。为达到此目标，年平均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 4.7%。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仍然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规定优先发展机床、仪表、电子、机电等工业部门。加速战略提出了两大必须完成的任务，其一是尽快赶上西方国家；其二是（在追赶西方国家时）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在执政后的短短一年内，他就相信需要对经济实行更深入的改革。1986 年 2 月苏共第 27 次代表大会制定了《1986—1990 年和 2000 年前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纲要》。戈尔巴乔夫进一步阐述了“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并宣布：“现在的情况是，不可能再把我们的措施束缚在局部的发展上——需要的一次彻底的改革。”^④ 根据该纲要，经过 15 年发展拟达到的经济潜力规模，将相当于苏维埃政权各个时期的总和，届时苏联人民的生活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无论加速战略还是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目的都是改变过去旧的、僵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强调的都是发展速度和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解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因而在改革的头三年，虽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在增长，但国内市场供应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况下，苏共领导人本应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找出问题的症结，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继续把经济改革坚定不移地深入下去。但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之所以出师不利，就是因为旧的政治体制在起阻碍作用。于

① 张玉良：“戈尔巴乔夫的悲剧”，《国际共运史研究》，1993 年第 4 期。

②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67 页。

③ 参阅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498、500 页。

④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 68 页。

是，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匆匆把政治改革提上了日程，试图以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内容就是他所倡导的公开性和民主化。他要求“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性”，“彻底恢复列宁的公开性原则、社会监督、批评与自我批评”^①。打破“批评禁区”，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表批评意见；废止报刊保密检查制度；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希望如实地恢复人们所经历过的一切历史的本来面目。^②

与此同时，在外交事务上，他也上演了配套戏。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没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想进行“经济生活方式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不可能的”。^③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改革与新思维》。书中强调：“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最充分地展现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并说“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即承认人类的生存”。^④同年12月，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个《核裁军条约》，标志着新思维外交政策的启动与走出“冷战”的开端，使苏联从曾被卷入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糜费财力的军备竞赛而造成的沉重压力下解脱出来，为改革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与经济体制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步子越迈越大，甚至超出了其原先的预想。即从只是想改变共产党的职能演变为取消一党制，取消社会主义，最终到苏共失去执政地位、苏联解体，大大出乎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意料。

自从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若干重大措施后，戈尔巴乔夫就一再宣布，“要根本改变我们的政治体制”，实行“社会主义多元化”和“舆论多元化”，要改变共产党的职能，把国家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把权力从高度集中在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改革者认为，“通过党内改革，能够使苏共适应变化了的现实情况，或者减少苏共与社会民主化的程

①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述弢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1、385页。

③ М. С. Горбачев.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2:7 参阅：Vladislav M.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7.P280.

④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岑鼎山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24、126页。

度、进程和速度的差距。”^①希望“被赶下‘奥林波斯山’的苏共有可能转型为一个‘正常的议会党’。”^②在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从头至尾可以感受到这位总书记始终对苏共改革，对将苏共变为现代政治力量、变成苏联社会民主更新强大工具的可能性抱有希望。^③于是，苏联在创纪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的一种自信，但现实没有为这种自信提供太多的条件。

苏共曾是苏联的基础，也是苏联的大脑、心脏和骨骼。^④如何将这样一支唯一拥有全联盟范围组织规模的、且与国家同生同在、在许多方面官僚习气十足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改变为按民主作风组织起来的左派力量的政党，成了摆在苏联共产党内每一个党员面前必须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一场自发的全党范围内的大辩论，不但把斗争矛头直接针对上层领导，而且出现了大量党员退党的现象。据戈尔巴乔夫1991年7月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从1990年到1991年中，一年半的时间里苏共党员人数减少了420万，即将近1/4。^⑤不管他们退党出于何种动机，这一事实本身表明，苏共已失去党内群众的信任，苏共的执政基础发生了动摇。对此，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仍然沉迷于抛出所谓的社会主义新理论。他也清楚多党制不是“灵丹妙药”，但又自信不必像“魔鬼怕神香”那样害怕它。^⑥1990年2月5日至7日，中央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28次代表大会讨论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全盘否定苏联历史。

1990年苏联第3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苏联宪法第6条，取消苏共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其实，从苏联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苏共一直是维系联盟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苏共取得了对国家的全面控制，党包揽了国家几乎一切大小事务，成为一个全能型、官僚型、行政化的党，苏共“名义上是政党，实质上是国家政权组织”^⑦。虽然，从法理上说，苏维埃才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唯一的立法机构，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党的决议对于苏维埃政权机关来说，却是

① [苏]瓦季姆·阿列克谢耶维奇·佩切涅夫原著：《“戈尔巴乔夫现象”的背后》，田永祥等编译，第186页。

② 维克多·库瓦林金：“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第88页。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506、510、511、515、519、520、540、541、542、574页。

④ 张歆：“俄罗斯人怀念苏联共产党”，《环球时报》，2006年8月30日，第2版。

⑤ 肖德甫：《世纪悲歌：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前后后》，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党员退党”部分。参见读书频道—凤凰网，http://book.ifeng.com/section.php?book_id=1083&id=75102。

⑥ [苏]《真理报》，1990年1月15日。

⑦ 转引自郝宇青：《苏联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最高的律令，具有巨大的约束力，并要求无条件地得到执行。从列宁时期开始，党的决议“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的。”^①斯大林更是明确指出：“党要检查各管理机关的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纠正那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缺点，帮助这些机关执行政府的决议，竭力保证它们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它们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非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②因此，这一无所不能的党的领导地位的动摇，带来的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英国《独立报》当时以《共产主义信念彻底破灭》为题发表评论说，苏共“正在经历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过程”，戈尔巴乔夫“正在设法通过放弃马列主义的中心原则来说服共产党员放弃初衷和开具正式死亡证。”^③而1991年8月公布主权国家联盟条约，修改国名，取消原国名中社会主义一词，更给了已经千疮百孔的苏联以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不但使维系联盟的纽带完全断裂，而且连凝聚人心的信仰也取消了。

确实，戈尔巴乔夫自担任苏联一把手以后，曾开创性地做过一些尝试，提出过一些新的观点，如对历史实行公开性、民主化，主张建立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外交领域的新思维、更新联盟等等。虽然纯粹就为政的方针政策而言，这些做法无可厚非，但众所周知，苏联是一个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国家，作为一个靠“硬扩张”^④建立起来的联邦制国家，苏联在建立的过程中就充满着曲折和障碍，而戈尔巴乔夫却要一次性抖落这一历史包袱，这无异于不自量力战风车的唐吉珂德，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

纵观戈尔巴乔夫执政近7年的所作所为，人们会发现，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他都主张激进，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和脱离实际的急于求成的做法。他一味强调“加速”，以主观想象代替政策，对不切实际的方案和目标盲目乐观，并频繁变动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成员。在第27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之时，60%的部长已经被撤换，1986—1989年，州委书记、区委书记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换了82.2%^⑤。西方学者阿斯卢德曾评论说：“戈尔巴乔夫时期干部的撤换是1937年以来最为频繁的时期。”^⑥任何现象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评价。在解释和论证不成功的反“酗酒”运动的突击速度时，戈尔巴乔夫写道：“我们力求战胜这一场可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5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93页。

③ [英]《独立报》，1991年7月26日。

④ 硬扩张：指的是一个国家利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强制从别国获取资源或领土，这种扩张关注国家领土与版图的扩大，它是一种有形的扩张。

⑤ 张盛发：“苏联解体原因再探”，转引自冷战中国网，http://www.coldwarchina.net/zwxz/zgxz/zse/001782_6.html。

⑥ [澳大利亚]利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 马细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38页。

怕的祸害灾难的愿望太急切了。”^①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经济领域另一个不成功的试验，即所谓的国家验收中。当时正在向民用企业推广军用工厂实行的产品质量监督体系。后来戈尔巴乔夫对那些考虑不够成熟的措施也作出了同样的解释：“希望用各种手段来更快地提高产品质量……时不我待”^②。这反映了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迫切的甚至过大的历史时代感。在经过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期后，“‘改革者’迫不及待地想要换回失去的（速度）”^③。“他们仓促上阵，即兴发挥，……人们期待出现奇迹”^④。其结果，“欲速则不达”，不但加剧了局势的动荡，而且使改革陷入泥潭。

最终，戈尔巴乔夫当初所提出的所有改革目标几乎都没有实现：既没有能使苏联在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等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也没有能改造苏联管理体制，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正如《戈尔巴乔夫之谜》的作者所点评的：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天真的政治家、自称未来人和地球主席的政治上的赫列布尼科夫^⑤，他是一个托马斯·莫尔类型的空想主义者。^⑥对此，戈尔巴乔夫自己有过较深刻的反省：在丧失权力10年后，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讨论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改革行动中有“很多幼稚性和乌托邦主义”。^⑦

三

人们不禁要问，戈尔巴乔夫到底错在哪里？他所提出的“加速战略”，公开性、民主化，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思维以及关于苏联新联邦的设想，就其本身而言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加速战略”的提出，就是要改变苏联经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滞不前的局面；而公开性和民主化是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填补历史的空白点；新思维外交，是为了减轻苏联承受的外部压力，缓和美苏关系及与其他国的关系，为苏联改革赢得更加宽松的国际环境；而关于新联邦的设想，是为了弥补苏联宪法存在的法理缺憾，解决苏联存在的民族矛盾。为什么这些设想在实施过程中会事与愿违？也许列宁曾经说过的一句哲理性颇深的话可解释此现象：“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403页。

②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404页。

③ 维克多·库瓦林金：“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三个分水岭”，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第80页。

④ 述弢：《梦醒莫斯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⑤ 维·赫列布尼科夫（1882—1922）俄罗斯诗人，尝试用未来主义手法写诗；在晚期作品中，诗人力图创造未来自由人类的“新童话”和寓言。

⑥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戈尔巴乔夫之谜》，第170页。

⑦ Vladislav M. 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p. 314.

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跑进了那间房子。”^①戈尔巴乔夫就是那个跑错房间的人。当时作家尤·邦达列夫把苏联的改革比作一架已经升空却没有确定着陆地点的飞机。作家的这个比喻当时引起改革派的强烈指责，今天很清楚，作家的讽刺是正确的，“因为在改革之初只对所期望的未来虚幻有一个大致轮廓，这个形象在后来不断得到修正，但最终显然降落到不是我们想去的地方”^②。为什么会这样？追根溯源，与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有关，与其所受的改革思想的启迪不完整、对苏联历史和国情的认识有偏差有关，更主要的是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苏联体制有关。

众所周知，历史赋予每一代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而每一代人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表明了它已经完成、同时也只能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历史发展有其必然的进程。对此，俾斯麦曾说过：“我们既不能忽视已往的历史，也不能创造未来。有人常将自己的表针拨前一些，以为这样就能把时间加快，但这实在是一种错误……我们把灯火放在果子下面，决不会使果子的成熟加速，而如果我们把尚未成熟的果子摘下来，只会妨碍果子成长并使其腐坏。”^③据此我们再来分析戈尔巴乔夫现象出现的原因也许会容易些。

戈尔巴乔夫出生于1931年，二战结束时年满14岁，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他22岁，赫鲁晓夫下台时已33岁。其童年是伴随着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完成，苏联模式逐步形成，苏联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而度过的，因此，戈尔巴乔夫的同龄人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感受尤其深刻。儿时的戈尔巴乔夫免不了会听到一些有关农村遭到大量破坏的传闻。他曾在回忆录中讲到自己的本源，他说：“为了下定决心进行改革，就必须经历我所经历过的生活，必须目睹我所目睹的一切。必须来自一个经历过集体化和（19）37年大清洗悲剧的家庭。必须上莫斯科大学——她应该用黑体字标出。”^④

显然，作为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骨子里也有斯大林体制的不少基因。“斯大林不仅代表一代人，同时也代表着影响深远的时代，一种根深蒂固的体制。后来的苏联领导者在保留他的长处时，又无法摆脱他的错误。作为在斯大林时代成长起来的赫鲁晓夫，不但没有真正超越斯大林，而且最终将自己演化为一个新版的斯大林。这是赫鲁晓夫的悲剧，更是苏联的悲剧。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5页。

② 亚历山大·涅基佩洛夫：“在黑屋子里逮住黑猫容易吗？”，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20年后的评说》，第165页。

③ 俾斯麦：“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讲话”，转引自《马列著作选读·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7页。

④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10页。

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在长达 40 多年的冷战中，我们发现，赫鲁晓夫悲剧仍在苏联继续重演，直至苏联解体。”^① “事实上，只要可能，人们都企图与过去恰当的历史建立起连续性。”^② 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他自称自己是苏共 20 大的产儿，但他最终成了这场悲剧的终结者。2001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视台采访时承认：“我们是苏共 20 大的孩子，苏联 60 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 20 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③ 他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他有强烈的变革斯大林体制的愿望，另一方面他对特权也十分迷恋，过分追求个人权力，极力维持官位等级制等等，这些都不免打上了斯大林体制的烙印。他自身的矛盾，无疑给他执政时期的政治实践和改革造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的确，赫鲁晓夫和苏共 20 大对戈尔巴乔夫有重大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在继承和推进赫鲁晓夫启动但行之不远的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他把赫鲁晓夫看作改革的先驱。他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使斯大林主义名誉扫地，勃列日涅夫时期翻本的试图破产了。已经无法恢复斯大林主义的秩序。这是开始改革的前提和条件。所以，我承认改革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情有一定的联系。总之，我高度评价他的历史作用。”^④ 在俄罗斯曾有人把赫鲁晓夫称为苏联的改革之父，如是，那他也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父。赫鲁晓夫是以“非斯大林化”而载入史册的，他也对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文化教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赫鲁晓夫终究是斯大林时代提拔和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在他身上深印着历史烙印，他并没有摆脱斯大林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体制框架，改革中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操之过急、朝令夕改的现象随处可见^⑤。布尔拉茨基在评价赫鲁晓夫时指出：“他（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但是没有触及专横的政权机构；他批驳个人迷信，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生育他的体制。”^⑥ 因而，赫鲁晓夫的改革思想和实践给予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第四代领导人的启迪却是不成熟的。急躁冒进情绪始终支配着他们，渴望一步到位或一次性抖落历史包袱轻装前进的心理造成现实生活中的盲动和偏激，致使改革失误不断，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这还不是最深的历史根源。苏联的历史，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历史、

① 祝彦：“赫鲁晓夫与他的政治原子弹”，《文史天地》，2004 年第 4 期。

② Eric Hobsbawm, Terence Rang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2.

③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年，第 215 页。

④ 张盛发：“苏联解体原因再探”，转引自冷战中国网。

⑤ 参阅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28 卷，第 567—591 页。

⑥ [苏]费·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年，第 106 页。

斯大林体制是产生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土壤，没有这一历史土壤，同赫鲁晓夫现象一样，戈尔巴乔夫现象之树是生长不起来的。

从总体上看，如果把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看作是极端型的苏联模式的话，那么，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等领导人执政时期（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则可以看作是改良型的苏联模式^①。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改革只是去掉了极端型苏联模式中的一些极端的東西，苏联模式的框架和精神实质基本上保留了下来。^②无论是对待经济改革问题、民族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还是外交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烙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困难和失败，与苏联的历史演进中累积的问题，特别是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各个时期苏联沉积下来的社会弊病有关。只有从这一有机统一的历史联系中才能找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和苏联剧变的根源。任何割断历史、只取其一而不及其余的片面观点，都不足以令人信服地说明戈尔巴乔夫现象和苏联的剧变。

此外，将苏联解体放到苏联历史的长时段里去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悲剧的发生还有更深远的原因。靠硬扩张与强权建立和维系的苏联存在着严重的民族矛盾，特别是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这一矛盾在统一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一定的控制。正如斯大林所坚信的“统一的党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毕竟只要党的凝聚作用在，它就会避免国家发生瓦解。”^③因此，苏联官方一直拒不承认苏联存在所谓的民族问题和民族纠纷。早在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在苏联不存在民族问题了。斯大林以后的领导人，基本上沿袭这一说法。但民族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长期困扰苏联并对其稳定构成很大威胁的严重问题。俄罗斯学者鲍里索夫等人认为，“在苏联政权期间，列宁在20年代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纲领的许多原则实际上没有实现。各共和国没有实际的主权，它们的权力和全权掌握在中央部门手里。”“自治的纲领没有实行……没有能够保障民族文化和语言发展的正常条件，一些民族处于丧失民族特性的境地。”^④科特则指出，“对于非俄罗斯民族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过是苏维埃新瓶里装的俄罗斯旧酒。……从列宁到斯大林的希望就是苏联的非俄罗斯人将会逐渐地接受俄罗斯的语言。

① 邢广程：“目标偏移和结构缺陷——从系统的观点研究苏联模式”，《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美]史蒂夫·D·伯拉德：“吹口哨的小虾米：俄罗斯——半路杀出的民主”，载[美]霍华德·威亚达尔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③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218页。

④ В. М. Борисов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1998, с. 377. 参见张盛发：“苏联解体的原因再探”，《俄罗斯研究》，2001年第4期。

言和文化并且早晚会融入新苏联民族里。在一些地方这种情况发生了，而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发生。”^①戈尔巴乔夫在执政初期，全面承袭了民族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的观点”，即使在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以及1987年6月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大规模示威活动后，已经坐在苏联民族问题火山口上的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讲话还宣布：“我们公正地说，我们的民族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②当共产党的纽带作用失去，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不再存在时，民族分裂主义就得以迅速蔓延和发展起来。正如述弢在《梦醒莫斯科》一书中所指出的“在一个多民族的封闭帝国里，民族主义是一把万能的政治钥匙，是廉价的普及燃料，可用来点燃人民激情的篝火，给任何混乱火上加油”。^③后来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切：许多共和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和宣布独立。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幻想通过新联盟条约，巩固各民族合作友好的紧密关系，共同努力发掘每个民族整个社会的潜力，使国家进入先进国家的行列，给社会带来安定和信心，解决刻不容缓的问题。^④他先后三次提出的新联盟条约草案，所作的让步一次比一次多，不仅在国名中删去了“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突出了各共和国的“主权”，而且规定未来的国家是邦联而不是联邦。由此可知，“他对整个民族向心力量的非理性本质估计不足”。^⑤苏联仍然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与此同时，苏联宪法存在的法理缺陷也是不应忽视的。苏联1924年、1936年和1977年宪法中都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有自己的国籍和宪法，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这种宪法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宣言性的，其目的与其说是保证各共和国的实际主权，不如说是满足各民族渴望独立自主的民族心理。列宁把联邦制视为向集中单一制国家过渡的形式，这一过渡在他逝世后不久便由斯大林完成了。苏联变成了名义上联邦制、实际上单一制的国家。这种名义与实质的脱节，特别是宪法有关加盟共和国享有主权和退盟权的规定，为以后各加盟共和国争取国家主权、脱离联盟中央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加上党和国家历任领导人都未能完全摆脱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的影响，这就直接影响了他们客观地认识和解决苏联的民族问题。宪法存在的法理缺陷，更令苏联领导人难以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来解决这种民族冲突。这也是各加盟共和国依据宪法的规定提出退出联邦时，戈尔巴乔夫束手无策、陷入

① Michael Kort, *The Soviet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SSR*, 3d ed,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1993, p. 286.

② [苏]《真理报》，1987年11月3日。

③ 述弢：《梦醒莫斯科》，第152页。

④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张达楠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571页。

⑤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第590页。

尴尬境地的最主要的原因。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务之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不仅成为政治上的事实，而且也是法律上的事实。

四

随着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和改革的向前推进，苏联社会到了一个紧要关头。怎样克服党政双驾马车体制的弊端？多个民族实体的国家体制如何继续有效运作？这是摆在戈尔巴乔夫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针对党政双轨制党政并设、党领导政的实际，戈尔巴乔夫企图逐步降低党在政权结构中的能量，将其控制权转给苏维埃，即人民代表大会，而党以人民代表身份参与国家管理。在1990年的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自信地宣布：“苏共对权力和管理的垄断已经结束。”“非垄断化过程还消除了苏联制度的一个陈旧特点——虚假的民主政治，从前被赶入地下的广泛的、多种声音的政治声谱现在几乎已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组织起来的反对派，几十个潜在的政党，大规模的游行、罢工，不受检查的出版物——这一切在70年中受到压制和禁止的事物都已合法化并迅速向全国扩展。”戈尔巴乔夫得意地认为自己已经离真理不远了，因为他骄傲地看到，苏联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政治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社会”。^①对于管理多民族实体的国家体制（联盟中央）的有效运作，戈尔巴乔夫采用列宁曾经设想的建议，准备达成“主权国家联盟协议”。

但由于苏联长期不实行多党制，当“党的领导体系在瞬间便被从上到下地拆除”时，“各级苏维埃却缺乏单独行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干部和经验，政权的瘫痪无力很快就遍及全国”。^②加上地方行政权的膨胀，地方独立野心应运而生，苏联中央政府成了一推就倒的空架子。而太过书生气的戈尔巴乔夫在坚定地打碎了苏联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之后，却不能给苏联一个凝聚人心的新的意识形态，不能给国家的改革开出符合实际的新体制的良方，因而导致局面的失控与混乱。科诺托普在就民主化与公开性问题致戈尔巴乔夫的信中（1989年6月15日）反映：“现代形式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正如你们所了解的那样，现在军队、行政机关，包括克格勃在内，普遍遭到公开的、恶意的非难和攻击。青年人的处境尤为窘迫，他们不断地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一部肮脏的历史，没有任何人性、任何英雄和卓越人物。”^③苏联的历史被全盘否定。在改革与公开性初期，普遍认为

^① 史蒂文·科恩：“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20年后的评说》，第23页。

^② 薛小荣、王哲：“原苏联政要眼中的戈尔巴乔夫、苏联改革与剧变”，《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2期。

^③ 参阅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519—520页。

公开性意味着自行出版物的结束。许多人都以为，随着苏联报刊上出现批评列宁、批评布尔什维克、批评马列主义的文章，自行出版物将会冻结。但事实是，“在 1989 年 7 月，全国出现了 323 种自行出版物。1988 年 7 月共有 100 种自行出版的杂志。1987 年约有 30 种，1986 年约有 10 种。……自行出版的杂志在增加。甚至还出现了自行出版的报纸。”^①美国评论家迈克尔·达维多对当时苏联舆论状况的描述值得反思：“由于片面地、完全否定地把党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说成极权政治，从而为反共提供了和继续提供着肥沃的土壤，党和国家的历史被这一种颜色涂染……目前许多主要苏联报纸和杂志上的反共内容比美国报刊多，某些电视也是如此。此外，这种反共要巧妙得多，因为它建立在对党和苏维埃历史“内部”了解的基础上。从这一点看，苏联目前是反社会主义、反苏、反共宣传的最‘权威’的发源地。”^②戈尔巴乔夫放手把意识形态的重建交给形形色色的宗教和极端思潮，把新体制的解决寄托于命悬一线的政治改革。他天真地认为总书记这个职务并不适合领导一个国家，只有总统才是名正言顺的国家领导人应有的称呼。因此他决定以总统这个职务来实现他对整个苏联国家的重新控制。1990 年他坐上了苏联总统这个位子。然而，出乎他的意料但符合他所构建的新思维逻辑的是，1990 年 6 月，依照苏联民族政策和宪法，苏联的几个主要加盟共和国先后发表了主权宣言。苏联的解体已成定局。对此，弗朗索瓦·密特朗可谓有先见之明。他曾认真关注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联马戏团圆屋顶下面不系保险绳表演的“致命节目”，并曾经对自己的亲密朋友罗兰说过：“戈尔巴乔夫使我想起决定用油漆盖住自己家墙上污点的人。但是在开始刷墙的时候看到一块砖在晃动，他试图把它换下来却弄塌了整堵墙，在重新砌墙的时候，又发现整个房基都腐烂了。”“于是最主要的建设者的方案发生了改变。……结果，他不得不放弃最初所宣布的目标。”^③细细分析，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实也是体现了一种历史趋势。这也是苏联体制长期不健全、不完善，人治大于法治、民主发挥不够的逻辑结果。其实，苏联至勃列日涅夫时代，准确地说，苏联已经不能称为没有法制的国家了，但却完全有理由认为它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而没有法治化，民主化就只能停留在理论和逻辑的层面上。^④因此，即使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虽然就日常行事而言，苏联社会是以法治为准，可是行政当局的权力，即任意逮捕、下

① 参阅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0 卷，第 530 页。

② 周新城、张旭编著：《苏联演变的原因与教训——一颗灿烂红星的陨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160—161 页。

③ 安德烈·格拉乔夫：“与历史争论到底”，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第 255、256 页。

④ Donald.D.Barry,ed.,*Toward the Rule Law in Russia ?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Armonk, New York & London: M.E.Sharpe, 1992, p. 3-60.

狱及境内流放的情况却依然存在”^①，也就不足为怪了。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戈尔巴乔夫曾有过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说“我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儿，我们身上编好的是当年工作方法的程序”。“我们在往前看时，仿佛是将头伸到了窗外，身子却依然留在‘老房子’里。”^②

综上所述，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对一个缺少民主传统、集权制根深蒂固、且背负着沉重历史重负的国家，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改革必须从这一历史实际出发。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幻想通过对苏共的自我否定，对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来建立一个全新的议会党和全新的苏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自信。遗憾的是，现实却没有给戈尔巴乔夫提供这种自信的力量源泉和基础条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但失去了党内外群众的支持，还最终否定了苏共和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戈尔巴乔夫也因此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对于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于改革的主要内容、改革的进程、改革的方式、方法均缺乏通盘的战略考虑，特别是制度建设的缺失，致使改革手忙脚乱，既无章法，又无制度，最终使改革失去了保驾护航的必要保障，导致局面的失控与混乱。但通过对戈尔巴乔夫现象的历史诠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苏联解体并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结果，它是苏联体制，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体制僵化的结果，也是苏联历史各阶段累积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戈尔巴乔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则进一步加速了人们抛弃这种体制的进程。在美国学者福山看来，正是“由于苏联体制合法性在公民眼中的丧失，导致了它的崩溃。”^③其实从苏联解体的教训来看，苏联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党组织已演变为实际的国家机构，在这样的国家如何永久性地保持执政的合法性，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多元化，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苏共下台留给世人的最深刻的教训。当然，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使多个民族实体的国家体制有效运转且不导致民族分裂也是一个不容小视的问题。

【Abstrac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there have always been controversies ov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Gorbachev's merit among different scholar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Gorbachev's new thinking, openness, democratization, building a humane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other doctrines disrupted

① [英]霍布斯鲍姆著：《极端年代》，郑明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8—589页。

②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214页。

③ 转引自[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1页。

the mainstream of the original Soviet ideology, disintegrated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form of impatience for success proposed under this theoretical guidance resulted in the ultimat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But the reality is not so simple, the emergence of Gorbachev's phenomenon has deep historical origi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o reveal the deep-seated reasons fo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Key Words】 Gorbachev, Gorbachev's Phenomenon, Collapse of the USSR, Historical Explanation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Горбачев, явление Горбачева, распад СССР,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ъяснение

(责任编辑 李敏涛)

(上接封3)

- 4日 Gazprom 总裁米勒 (Alexei Miller) 呼吁俄罗斯、欧盟和乌克兰三方就解决乌克兰天然气债务问题尽快达成一致。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 俄罗斯希望能源安全规章能做出改变。
- 6日 俄财长库德林表示, 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暂不可被替代。
- 8日 吉尔吉斯斯坦意愿加入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同盟。
- 9日 Gazprom 表示希望在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投入生产后, 至 2020 年满足美国天然气市场 10% 的消费需求。
- 10日 俄罗斯与塞尔维亚签署价值 5400 万美元的核废料处理协议。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 集体安全条约国组织应调用兵力打击毒品交易。
- 11日 俄罗斯认为新的欧洲安全条约应考虑未来北极地区的发展。
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切尔诺梅尔金 (Viktor Chernomyrdin) 被改派为总统顾问。
- 15日 俄罗斯外交部敦促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展开直接对话。
- 16日 俄罗斯和伊朗在上合组织峰会上表示将继续开展经济和人道主义合作。
俄中经贸合作论坛在莫斯科举行, 与会者呼吁两国合作应对危机。
格鲁吉亚外交部指责俄罗斯否决延长联合国在阿布哈兹的观察员行动。
- 17日 中俄庆祝建交 60 周年。
Gazprom 要求 Beltransgas 归还天然气欠款。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向国家杜马提交有关促进 NGO 发展的提案。
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就关税同盟入世形式问题在日内瓦与世贸组织成员国协商。
- 18日 俄罗斯与阿布哈兹签署一系列经济协议。
俄总统经济顾问德沃科维奇 (Arkadi Dvorkovich) 宣布, 为实现俄罗斯经济现代化, 成立五个总统委员会工作小组。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联合会敦促和平解决与白俄罗斯争端, 以免给俄商业带来负面影响。
- 19日 俄总理普京宣布与白俄罗斯协议实施共同农业政策。
- 20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 荷兰可能参与 Gazprom 亚马尔半岛项目。
- 25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 俄对跨撒哈拉沙漠天然气管道项目很感兴趣。
- 26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非洲四国。
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俄罗斯协议合作打击毒品交易, 维护地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 27日 俄罗斯与北约同意恢复军事合作和政治对话。
- 29日 莫斯科无限期关闭切尔基佐夫斯基市场。

(于璐 辑)

俄罗斯大事记

(2009年5-6月)

5月

- 1日 俄罗斯约200万人参加了“五一”庆祝活动。
- 5日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拒绝参加将与5月19日举行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以此抗议北约对两名俄罗斯外交官的驱逐。
- 9日 胜利日(Victory Day)游行在莫斯科举行。
- 10日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西南部的一处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
- 12日 俄罗斯总理普京(Vladimir Putin)到访日本,呼吁两国深入合作对抗危机;双方签署首个核能源合作协议。
- 14日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表示,俄希望阿富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有关反恐和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的合作。
阿布哈兹总统巴加普什(Sergei Bagapsh)表示,既然俄罗斯已承认阿布哈兹的独立国家身份,阿在近期不会加入俄罗斯。
- 15日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表示,他并非坚决要求修改乌俄间的天然气协议,只是强调“协议内容有必要进行改善”。
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与意大利、保加利亚、希腊和塞尔维亚国家天然气公司签署“南流”天然气管道建设新协议;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与俄罗斯总理普京出席了Gazprom-ENI谅解备忘录第二份补充协议的签署。
- 18日 Gazprom董事会提议削减红利86%。
中俄石油管道中国部分开建。
俄罗斯开建世界首个漂浮核电站。
- 19日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与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就欧洲安全和能源问题、开展北极合作问题等展开磋商。
Gazprom认为,欧盟应像重视纳布科项目那样重视南流项目;并宣布计划在2015年前提高欧洲天然气市场占有率至30%。
- 21日 俄总理普京到访哈萨克斯坦,两国签署太空、能源和军事技术合作协议。
- 22日 俄罗斯在欧俄哈巴罗夫斯克峰会上要求欧盟敦促罗马尼亚停止“干涉摩尔多瓦事务”。
- 24日 俄外长拉夫罗夫呼吁哈马斯领导人尽全力维护地区稳定。
- 25日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朝鲜核试验威胁地区安全,朝鲜核问题只能在六方会谈框架内解决。
- 26日 罗马尼亚经济部长维迪亚努(Adriean Videanu)表示,俄罗斯Gazprom公司和罗马尼亚天然气公司(Romgaz)计划成立一家合资公司来扩大天然气储量并生产电力。
- 27日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正严密观察俄罗斯—朝鲜边界,但并未增兵。
- 29日 白俄罗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统一关税区将与2011年7月开始运行。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接见金砖四国安全事务代表。
- 30日 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与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一致认为联合国安理会需通过朝鲜问题新决议,增加对其制裁。

6月

- 1日 俄罗斯财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表示,俄罗斯储蓄银行(Sberbank)收购美国GM的德国子公司Opel有利于俄汽车工业发展,但Sberbank不会因此得到政府资金资助。
- 2日 Gazprom与波兰石油和天然气公司(PGNiG)签署短期天然气运输协议。
俄罗斯国有银行VEB放宽对持有外国债务的大公司的贷款期限。
- 3日 俄总理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俄仍将继续为加入世贸组织和欧安组织做出努力。
(下转第136页)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09 年第 4 期

(总第 158 期)

《俄罗斯研究》刊期变更启事

经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沪新出报[2007]33号),从2007年起,《俄罗斯研究》的刊期由此前的季刊变更为双月刊,逢双月23日出刊,其他项目保持不变。

改为双月刊以后,《俄罗斯研究》杂志社将进一步注重刊物的刊发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以期为关心国际关系及俄罗斯问题的各界人士提供更切实有效的服务。

《俄罗斯研究》以研究和介绍俄罗斯现状问题与信息为重点,反映国内外研究的最新成果,兼及历史、文化等领域和相关的东欧中亚研究,目前设有“专论”、“政治·社会”、“经济”、“国际关系”、“斯拉夫欧亚”、“苏联时期·苏共”、“历史·文化”、“书评”和“学术动态”等栏目。

本刊热忱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得到广大作者、读者和专家的帮助与支持。同时,提请各位投稿者关注本刊的有关规范,可登录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rus.org.cn>, 查阅“最新期刊”栏目中的“《俄罗斯研究》投稿须知”。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

编辑部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3816 021-62232113

排版: 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发行: 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9-721X

电子信箱: russiastudies@163.net

网络电子版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址: www.qikan.com www.qikan.com.cn

ISSN 1009-721X

CN31-1843/D

定价: 8.00 元